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周小川 陈 元 张 平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炳华	王洛林	宁吉喆	毕井泉	江小涓	刘元春
刘世锦	刘 伟	刘遵义	许宪春	朱之鑫	朱 民	朱光耀
杜 鹰	谷源洋	李 扬	李毅中	杨伟民	张大卫	张卓元
张 勇	张晓强	林兆木	林毅夫	郑新立	姜增伟	高培勇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常振明	黄奇帆	隆国强	程永华
韩永文	谢伏瞻	解振华	楼继伟	蔡 昉	樊 纲	薛 澜
戴相龙	魏礼群	魏建国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王一鸣
副主任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晓河	王昌林	王 战	叶辅靖	陈文玲	迟福林	陈宗胜
李 平	李向阳	张宇燕	张 琦	张燕生	张蕴岭	范恒山
冼国明	郑京平	施子海	姚 洋	顾学明	贾 康	徐 林
黄志凌	黄群慧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王一鸣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副主任 李 蕊

· 本刊专论 ·

加快金融创新与监管创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

宋 海 张红地 (005)

· 国际经济 ·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思考

张生玲 郝 宇 (014)

日本介护保险支持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张 瑾 潘 林 (023)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指标构建和跨国比较

倪淑慧 刘东民 (032)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数字贸易的中介效应分析

杨鸿岳 (043)

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商业模式研究

——基于核心能力建设的技术路径

王立鹤 宋丽妮 韩媛媛 (056)

· 宏观经济 ·

我国居民收入对文化消费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

刘 慧 夏杰长 (064)

· 产业发展 ·

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李 锋 韩燕妮 马晓玲 王 婷 (077)

推动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的政策建议 綦鲁明 (085)

加快推动我国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探讨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黎智威 胡 雨 (093)

· 数字经济 ·

加快农业数字化探索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04—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数字化”内容解读

李 钰 韩一军 刘乃郗 郑天月 (102)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模式与路径研究 肖 宇 史 楠 (113)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4)

CONTENTS

Accelerat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regulatory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ong Hai, Zhang Hongdi (005)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Zhang Shengling, Hao Yu (014)

The influ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Japan’s nursing care insuranc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industry
Zhang Jin, Pan Lin (023)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ompetitiveness: indicator construction and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Ni Shuhui, Liu Dongmin (032)

The impact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on China’s export structure upgrade
——Analysis of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digital trade
Yang Hongyue (043)

Research on the business model of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overseas warehouse”
——Technical path based on core capability building
Wang Lihe, Song Lini, Han Yuanyuan (056)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residents’ income o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onsumption
Liu Hui, Xia Jiechang (064)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w-orbit satellite internet in China
Li Feng, Han Yanni, Ma Xiaoling, Wang Ting (077)

Policy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Qi Luming (085)

Discussion on the counter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clothing industry——Taking Pany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Li Zhiwei, Hu Yu (093)

Accelerate the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to help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Interpretation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Central Document
No. 1 in 2022
Li Yu, Han Yijun, Liu Naixi, Zheng Tianyue (102)

Research on the main modes and path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Xiao Yu, Shi Nan (113)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4)

加快金融创新与监管创新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

宋 海 张红地

摘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其经济发展成为拉动国家经济新的增长点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与其他经济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金融创新基础，其金融创新的重点在于建设开放式银行体系，做到资源共享，进行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制度改革先行先试，建设一个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与产业及科技服务的完整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为了避免先行先试带来的风险，必须在做好几项基础工作的前提下，开展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创新。通过监管创新，规范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也为全国其他地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更多改革与发展的经验。

关键词：金融创新 监管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

作者简介：宋 海，全国政协常委；

张红地，北京语言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已经在珠三角和港澳地区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金融产业云集的世界级经济区和巨型城市群，正在成为拉动中国及全球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力源。我们应该思考下一步如何通过提升大湾区的竞争力，聚集大湾区的金融资源、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优势，推动金融产业融合升级和产业价值链重构，促进大湾区一体化协调发展。其中，大湾区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创新是促进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因素，不但可以进一步深化大湾区金融合作，对促进大湾区金融监管一体化，维护区域金融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及全球经济发展添加新动力。本文就如何加速大湾区金融创新与监管谈一些看法。

一、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具有较好的基础

一是香港特区具备特殊的对外开放优势和金融产业基础。在大湾区中，香港是能够与伦敦、纽约、东京并列的国际化金融自由港之一，相比同为国内金融中心的上海和深圳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及更多的政策支持。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金融企业都在香港设立了分部处理当地金融业务，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金融贸易人才，在文化教育、司法制度、科研等诸多领域与西方接轨，具备其他地区没有的特殊优势。而且香港作为优质深水港和国际化航空中转中心，对外交通便捷，人员往来方便，周边的金融服务体系具备较高的对外交往便利性，是大湾区金融产业走向世界不可或缺的助力和跳板。以

香港为依托创建新的金融中心，阻力较小，能够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可利用其特殊优势带动粤港澳地区的金融制度改革和金融服务业务革新升级，推出新种类金融产品，整合大湾区的力量赶超发达国家金融中心，可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海陆交通枢纽的特殊地理优势，构建大湾区对外经济开放交流的新平台。

二是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当前面临产业升级，有着巨大的融资需求，是产融结合的最好平台和投资的最好地方。大湾区金融创新战略不但对港澳有利，还可为珠三角地区制造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为产融结合提供巨大的平台。因多种因素制约，近年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后劲不足，获得融资的难度较大，面对国际竞争市场份额已开始逐步缩减，部分生产线外迁。构建粤港澳一体化金融服务中心能够使该地区传统的通讯器材、工程机械、网络设备等优势产业获得充足的融资平台，可以筹集市场资金投入技术研发与产品升级。这些领域的企业在上市融资后通过购入国际先进技术设备、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可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利润，提升大湾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宏观经济调节和各类优惠政策引导国际资本流入珠三角优势产业，使国外的金融评级机构、风投公司、科技创业孵化器逐步迁入粤港澳地区，也拓展了内地欠发达省份企业的融资路径，赋予各行业全新发展机遇。通过金融服务业的投资，帮助实体经济进行转型，满足产业升级要求，加快沿海省份城市的发展速度，提高港澳地区与珠三角地区之间的经济凝聚力和认同感，促进大湾区产业优化升级。同时，也为粤港澳地区乃至全国的资金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和平台。

三是大湾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金融服务有较大需求。目前，大湾区已经逐步形成空前庞大的城市群，越来越多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推动了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高素质人口与资金、生产技术大量集聚于此。由于大湾区特别是珠三角基础设施建设与世界发达湾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为提高大湾区发展质量和进一步改进大湾区居民生活品质，必须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城际交通提供便利，提高大湾区的宜居水平。实施大规模基建的融资需求较大，对优质金融产品有较强的购进欲望，要求打造一体化金融服务中心和融资平台，加强金融创新和监管创新，为跨境金融交易提供方便，构建以大宗贸易为主的金融服务体系。未来，在基础建设基本完成，城市服务功能齐全的情况下，大湾区必将成为全球高收入人群的聚集地，随着巨额个人资产逐步涌入该地区，将形成庞大的金融避险产品市场。

总体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而大湾区的金融发展，可以带动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进而拉动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促进大湾区起飞非常重要的发展因素就是金融创新，通过对金融发展模式的创新来提升产业的附加值。要想使得大湾区的金融发展模式不断创新，需要建立健全相对应的金融基础服务设施体系。

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的重点

一是在全国率先利用大数据资源，构建开放银行，使得数据资源首先在大湾区实现共享，从而增强大湾区银行金融服务能力，进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开放银行”是指伴随金融科技发展衍生出来的一种银行与大数据企业合作的新模式。即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基于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技术，利用 API 开放数据共享权，实现了银行与大数据企业或金融科技企业或者其他机构间的金融数据共享，拓展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提高金融服务维度，提升金融消费者的体验，达到各方共赢目的的一种新模式。开放银行基于传统金融服务生态基础，通过 API 技术，在实现银行金融服务“走出去”的同时，实现外部场景“走进来”，其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共享与合作。不论是大数据企业还是银行，只要纳入数据接口，就可以做到数据共享，达到社会数据资源最大化使用，数据费用的节约及不同行业 and 不同企业与银行竞争力的协同都得到提高。开放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率先成为建

设统一技术和大数据市场的抓手。与传统银行业务不同，开放银行作为一种全新商业银行模式，通过全社会主要大数据及金融数据共享，促使银行由一个服务场所变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服务平台。当前，正值大数据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大湾区率先建立统一金融数据要素市场，能够为数据开放共享奠定基础，通过各银行金融机构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让数据能够更好地流动和应用，进一步提升大湾区数据资源价值，建成统一大数据市场，使金融数据要素得到更有效的配置，金融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有序流动和合理集聚，提升大湾区银行业现代化水平。目前要做的是出台相关规定和政策，凝聚各方力量共建开放数据平台，防范相关制度风险，通过开放银行做到业务资源共享、服务共享。

二是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提升大湾区金融科技创新水平，以金融科技创新带动金融创新。首先，完善金融科技创新体系，占领政策和制度高地。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门针对大湾区金融科技创新，颁布相关扶持政策，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其次，大湾区要构建各部门联动发展机制，规划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将大湾区金融区块链、金融互联网、数字货币、金融智能投顾技术等作为未来金融科技发展的重点，并引领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再次，对大湾区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路径展开探索，促进深化内地与大湾区金融市场合作。同时，区内科创企业应同金融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大湾区设立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和创新的平台，加快构建有关科创基础设施建设，使区内相关组织机构同国家科技计划更好融合，协同创新。最后，政府部门应要求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体制改革这一举措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并不断加强对大湾区科技创新重视程度，以推动大湾区国际化创新平台的构建，以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设立，并成为带动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新动力和示范区。

三是优化金融与创新产业空间布局。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大湾区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外圈扩散，优化科创产业布局。大湾区内政府应立足于整体湾区布局情况，着力打造以珠三角地区为核心的先进装备产业带，将创新要素的集聚作用发挥到最大。利用澳门和香港在商贸服务业领域的发展优势，弥补珠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的不足，促使传统生产行业逐步向价值链高端转型升级。围绕港深广金融创新主核心、大湾区区内各金融中心为次核心的金融格局，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园区，逐步促使区域与国际金融层面接轨，以大量引进更多境外高端产业和人才，为金融科技创新助力，为产融结合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是大力开展金融与大湾区内先进的科创运营平台融合创新。区域政府需聚焦大循环内生动力，以深化科创改革为驱动，通过配置区内金融与科创主体，推动金融与科创中心联动发展。首先，政府可通过统筹规划区内金融与科创实体企业，积极引导资本实力较强的金融机构服务于科创实体企业，促使内部金融与创新资源合理分布，更好发挥科创效能。其次，大湾区内政府应以金融投资布局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重点科创产业平台，打造形成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科创产业集群。最后，在大湾区内通过盘活区内存量资金，加大布局金融支持科创企业的联动运营平台，构建区域内金融推动科创发展模式，推进重点科创产业改造，提高科创及金融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

五是建立大湾区高质量金融与科创技术联动机制，推动高技术产业区建设。首先，发展区域内科创技术共建机制，实现政府、金融机构、科创企业联合发展“常态化”。大湾区内地方政府、科创企业和金融机构间应建立共建结对机制，实现区内资源共用、信息共享。其次，创新协作共通机制，落实金融机构服务科创企业产业链“常态化”合作。金融机构应通过“组织联网、人才连育、征地联盟、发展连谋、活动联办”等方式形成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生态群，^①企业应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在沟通合作、要素对接、平台搭建中的桥梁作用，加速跨区域经济要素及金融要素流动。最后，创新金融与

^①朱艳霞：《全国人大代表袁建良：建立多层次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体系》，中国银行保险报网，2021年3月5日，http://www.cbimc.cn/zt/2021-03/05/content_384790.htm。

科技项目共融机制，推动科技创新、跨区域科创企业深度融合“常态化”。金融要与科技项目深度融合，大力促进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推动区内整体科创技术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六是在大湾区构建普惠金融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双轮驱动就是指数据和机制双管齐下进行发展。大湾区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建立“数据+机制”的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就可以大大缓解这一难题，使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向金融机构贷款时能融够资、够融资。通过构建普惠金融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和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行分析，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来解决普惠金融的分散、粗放需求和金融机构集约要求不相符合的问题。利用大数据对信贷经营模式进行创新，不仅可以降低经营成本，还可以找到与金融机构经营模式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模式，使大湾区普惠金融发展模式趋于成熟。在大湾区建立能够使金融机构发展的普惠金融的有效激励机制不仅能够提升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使金融机构的风险得到有效降低，资产质量得到有效控制。

七是大力进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大湾区金融基础设施不仅仅包括支付、结算、登记托管等，也包括法治环境、信息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和评级体系等内容。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金融活起来，也有利于金融稳起来，并且成为金融市场运行的核心支撑，也是宏观调控部门、监管部门的重要平台和工具。由于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应用，金融创新发展得非常快。目前，大湾区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建设与管理方面都处于分割状态。因此，统筹推进金融市场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监管，加强金融基础设施改革与互联互通，维护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健高效运行显得十分重要。此外，对于大湾区建设来说，需要考虑的还有金融基础设施的全球化及其监管问题，以及如何为国家层面的金融对外开放取得先行先试的经验。

三、需重点解决制约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有效解决大湾区体制制度差异化问题。大湾区发展的特殊性及其难点在于，涉及到的城市包含着个国家内不同制度和管理体制的地区。大湾区三地同属中国，但在制度、政策、法律体系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金融体制各不相同，在货币制度、金融机构体系等方面存在差异。制度的不同导致制度壁垒的存在，在金融信息交流、金融人才流动、金融资金流通等方面都存在障碍。这成为限制大湾区金融创新的重要因素。

二是要解决金融创新发展资源不均衡问题。大湾区内的9个城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拥有不同的金融创新发展资源。其中，广州拥有丰富的金融创新资源及产业基础，建立了广州商品清算中心、广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广州航运交易所等六大金融交易平台，设立了跨境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证券交易所的城市，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中国许多大银行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总部都在深圳；香港和澳门的金融开放程度最高，香港作为国际第三大金融中心，拥有强大的吸引资本的能力和金融创新的资源；其他城市的金融资源、创新水平、产业基础及资本吸引力都不及上述4个城市，但拥有大量可供使用的土地资源。因此，如何利用大湾区内9个城市的优势金融资源，使大湾区金融协同创新发展，是大湾区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创新资源共享机制问题。当前，大湾区内的城市在金融方面有一定的交流合作，如开展绿色金融合作，探索在大湾区构建统一的绿色金融相关标准，鼓励更多大湾区企业利用港澳平台为绿色项目融资及认证，支持广东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在香港、澳门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及其他绿色金融产品，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大湾区绿色企业、项目等。但目前这些城市在金融人才流动、金融机制统一、金融创新研发分工等方面，联系和协作程度较低。要实现大湾区内部的互通互补，建立长效的创新资源流通共享机制是关键。如何建立健全不同制度背景下城市之间关于金融发展创新资源流

通的相关制度和激励措施，是促进大湾区科技与金融创新发展的关键。

四是要解决大湾区内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产融结合力度不一致问题。首先，由于经济制度不同，地方政府针对大湾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和产融结合支持力度不一致，颁布相关扶持政策有冲突，没有形成一个良性发展循环。其次，金融发展还未在大湾区内形成一个良好的联动发展机制，没有规划好大湾区内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及产融结合战略，当前发展的盲目性较大。

四、进一步加大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监管以促进创新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提高大湾区金融监管体系层级，健全和完善大湾区金融政策自主性，强化政策保障。大湾区三地涉及不同社会经济制度，金融标准、行业惯例均存在许多差异。所以，要加强大湾区金融合作和监管的组织保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大湾区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领导委员会或类似机构，机构成员由国务院相关部委（如“一行两会”）、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组成。在统一领导机构下设金融合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大湾区金融合作事宜，加强三地金融合作的顶层设计，使得粤港澳三地金融合作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便于统筹工作、沟通顺畅、协调有序，有效缓解三地社会经济制度差异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金融合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构建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沟通机制，创新跨境金融监管。加强大湾区金融合作顶层设计，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推进金融业对全球扩大开放与对港澳地区开放先行先试，统筹兼顾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关系，争取设立中央金融监管机构深圳总部，大幅提高深圳金融监管层级和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建议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驻深机构的基础上，设立更高层级的监管和协调机构。在操作层面，争取在大湾区内由中央政府设立人民银行深圳总部，以及银保监会、证监会深圳特别办事处等，代表中央协调、统筹和监管深圳金融工作，加大中央对大湾区金融中心建设的支持力度。设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特别办公室，联合原证券、银行、保险分业监管的力量，根据大湾区金融发展特点制定特色化的金融监管政策和规则，提高大湾区金融监管的层级和金融政策的自主性。提升大湾区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争取中央政府赋予大湾区金融机构在一定额度内管理资金跨境自由流动、核准金融机构在大湾区开展跨境业务创新的权限。同时，加强大湾区金融合作的政策衔接，做好大湾区金融开放创新政策与自贸试验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政策的衔接，大湾区金融开放创新政策与产业发展导向、科技合作创新、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等政策的衔接，实现大湾区金融开放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联动、相互促进。

二是有序推动大湾区内金融双向开放，推广使用人民币，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突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导向。按照人民币国际化的总体方向，坚持人民币优先原则，推动人民币成为大湾区三地之间经贸往来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和融资、交易货币，扩大人民币在大湾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跨境使用。支持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增加人民币储备资产，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更加积极主动地支持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大湾区内的银行机构可逐步按照相关规定开展跨境人民币拆借、人民币即期和远期外汇交易业务、与人民币相关的衍生品业务、理财产品交叉代理销售业务；大湾区内的企业可逐步按规定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有序推进大湾区三地之间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创新金融合作模式和路径。在金融机构层面上，加速开放金融业，降低港澳资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鼓励港澳资金金融机构在珠三角 9 市设立分支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银行、保险机构在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设立经营分支机构，也鼓励广东的金融机构在港澳拓展业务，参与港澳地区的金融活动，二者在竞争中合作，共同为大湾区的建设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在金融市场层面上，建立资金和金融产品互通机制，有序推进大湾区内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跨境交易，支持内地与香港、澳门保险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再保险业务。支持香港机构投资者按规定将在大湾区募集的人民币资金投资香港资本市

场、内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要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彻底打通“债券通”和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的通道。统一大湾区内金融行业相关标准，例如绿色金融认证标准，有助于大湾区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和金融行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在个人用户层面上，创造大湾区银行账户互联互通机制，使一个银行账户可以在粤港澳三地完整使用全部功能，让粤港澳银行用户可以享受更多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在《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推动内地金融业扩大开放对港澳地区先行先试，创新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的路径和模式，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大湾区金融合作与发展、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开放格局。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和企业更加主动地参与港澳地区金融市场活动，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业务，在金融领域强化内地与港澳地区的互补、互助和互动关系。

三是突出大湾区金融创新特色，设立大湾区“监管科技”“监管沙盒”的试验区和全国科技监管示范区。以风险识别为导向，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和监管科技应用，以创新试点的方式，探索在金融监管领域减少监管真空及监管重叠，消除监管套利，以适应混业经营趋势下防控交叉金融风险的需要。促进科技监管相结合，提高监管效率。在大湾区内，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和技术，积极创新金融监管手段。探索建立新兴金融业态大数据分析和风险排查系统，针对互联网金融、私募、交易场所、虚拟货币等领域非法集资风险问题，提高系统分析能力和预警能力。在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基础上，建设统一的大湾区级金融监测平台，进行统一金融监测及跨地域监测、穿透式监测。将大数据金融安全与涉众金融风险防范工作有机结合，实现对网络借贷、众筹、交易场所、外汇交易、虚拟货币、区块链等涉众金融风险企业的预警监测。

四是继续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继续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在大湾区内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推动香港建设成绿色金融中心，在香港建立国际高度认可的绿色债券认证机构，开发多种绿色金融产品，活跃绿色金融市场。在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以碳排放为首个品种的绿色期货交易所。在澳门探索和建立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证券交易所、绿色金融市场、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在大湾区内建设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推进大湾区金融市场的互联和跨境特色金融合作，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金融监管的条件下，鼓励大湾区保险机构创新，开发跨境保险产品，为跨境保险客户提供便利化承保、查勘、理赔等服务。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依托大湾区股权交易市场，建设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广州进一步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中心、产权和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逐步提升金融国际化水平。支持深圳证券交易所不断创新上市规则，吸引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优质企业回归 A 股。注重发展金融科技产业，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激励深圳的金融科技创新职能。利用澳门的特殊优势，把澳门建设成为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金融合作的平台，积极开展与葡语系国家的金融服务合作。总体目标是形成一个“金融 + 科技 + 生产 + 贸易”的多元化世界级湾区。

五是建立统一标准的监管体系和统一监管标准，有效控制金融业不确定风险。现阶段粤港澳地区的货币结算机制尚未完全统一，货币兑换汇率和银行存款利率各不相同，面对全球经济波动的应对措施和风险监控机制也有很大不同。粤港澳三地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规则不一致，容易因此诱发经济危机。为了预防金融危机、全面管控国际资本流动、降低金融风险，必须尽快统一大湾区的金融管理措施，建立粤港澳三方协调管理机构，共同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在统一的金融监管框架下稳步发展，实施有次序、有保留的对外金融开放。发挥国家体制优势，对金融市场进行系统性动态管控，及时传递国际市场信息，打破信息壁垒。由金融管理机构审核市场上金融企业的资质和所提供金融产品的质量，统一汇总各方信息建立数据管理中心，以此保障客户隐私和金融交易安全、共享行业信息。面对现阶段的金融海啸，应由政府部门统筹应对措施，在粤港澳地区实施严格的金融管制，调控国内

金融行业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提高避险和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可适当通过金融杠杆工具使港元汇率保持稳定。统一技术标准，引进先进科技加强金融风险评估。建立一体化金融中心的前提在于统一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做好法律法规方面的对接工作。必须保证该标准能够适应国际金融市场规模，建立一致的金融市场管理机制和金融产品审查制度，弥补制度漏洞，制定交易设备、信息传输网络规格、书面文件格式、金融服务上市审批程序等不同领域的统一标准，以此加深大湾区金融市场融合，在制度层面形成合力，加强整体的对外竞争力，去除所有制度性、技术性障碍，实现资金与人员的自由流动。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发展对金融交易形式的影响，依托现代信息科技的进步推出智能化、个人化的金融服务产品，例如移动客户端支付、加密货币交易等新形态业务，及时抢占新时代金融创新高地，开拓全新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机构还可引进人工智能识别、量子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工具对金融市场实施自动化管理，扩大管控范围和金融市场监管效率，利用互联网搜索技术探明用户信息，以此加强个人信用审查力度，降低违约风险。通过对金融交易信息的深入挖掘，总结市场变化规律，及时采取行动控制交易频率和额度，防止金融市场失衡。

六是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政府部门应引导金融企业投资珠三角的企业孵化系统，为当地急需注资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债权性融资。可由政府牵头、金融企业投资建设新型企业孵化器，改善管理体制，推行企业孵化器管理模式，构建完善的粤港澳城市群企业孵化器网络，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内地开展科技创新投资活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提高企业孵化的成功率与速度。金融公司可针对此类濒危企业推出新型金融产品，降低对企业信用的要求，扩大融资抵押保证范围，缩减贷款审批流程。中小企业能获得稳定的现金流，生存能力将大大提高。投资孵化器既满足了金融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又减轻了政府管理压力，也提高了金融服务的社会效益。

七是加强粤港澳三地金融监管合作，创新金融监管方式，优化金融人才流动政策，为大湾区金融合作发展提供监管保障。创新灵活安全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确立三地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标准，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组建大湾区金融综合监管合作理事会，建立大湾区金融监管统一协调沟通机制，保障三地金融系统安全。制定统一的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预警制度。完善粤港澳三地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等方面的监管合作和信息交流机制，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合作机制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机制。推进三地之间的监管数据共享，建立金融数据备灾中心，定期发布大湾区金融发展指数，及时充分掌握大湾区金融发展的新进展，防范区域金融风险，促使金融融合更好地发挥推进大湾区建设重要引擎作用。鼓励和吸引港澳地区青年金融人才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实习，增加选派内地优秀金融人才到港澳地区金融监管部门、中资金融机构交流以及挂职、任职，促进内地与港澳地区金融人才双向流动。鼓励金融监管人才到大湾区发展，推动大湾区金融监管人才交流、培养体系和平台建设。对来大湾区从事金融监管工作的人才，符合相应条件的，可以比照高层次人才相关政策，在住房、周转房、子女入托、入学、干部收入等方面提供必要支持。在人才交流方面，设立金融人才挂职锻炼实践基地，开展多向互动的挂职交流锻炼，培养复合型、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金融监管培养奖学金、金融人才发展专项基金等形式，定向培养金融和监管人才。同时，为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才提供学习机会和长期培训计划，包括境内外学习机会，不断提高现有金融监管人才专业水平和素养，为金融监管队伍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五、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创新需要做好的几项基础工作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协调机制建设。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货币、三种金融体制的特殊条件下，推进大湾区金融合作需要三方进行全面谋划和通力协作，恰当选择合作发展的路径和切入点。在大湾区内应设立布局更合理、功能更完善的金融体系，为粤港澳跨区域资源分

配机制、补偿机制搭建通道，消除资源共享流通阻碍。大湾区金融业要有效进行合作发展。首先，制定大湾区金融发展战略规划。鉴于目前三地制度不同，金融合作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一步步推进。做到各方面通过协商、各自积极参与、成立协商机构等方式推进大湾区的金融合作发展。经过协同发展阶段后，三地在银行、保险、证券、投资等金融领域可实现互联互通、融合发展。待体制机制障碍完全消除后，三地金融即可实现一体化发展。其次，做好顶层设计。要站在全球视野和国家发展高度谋篇布局。在金融制度和体制机制创新、金融基础建设、金融市场布局、金融配套服务、金融人才培养、金融要素配置等方面加强大湾区金融合作的顶层设计，对大湾区金融建设与发展进行专项规划，为粤港澳金融合作明确方向、提供指引。最后，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保障。在大湾区内组织专门机构，形成统一领导，统管大湾区金融事业，协同推进三地金融合作发展。要进一步加大对大湾区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设立金融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确保大湾区金融事业优先发展。

二是破除制度性障碍，创新体制机制，建设长效合作机制。三地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大胆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相互发展。首先，充分发挥香港、澳门、深圳、广州等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功能，合作构建多元化、国际化、跨区域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其次，逐步缩小三地的法律体系、金融政策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之间的差异，放开三地金融互通的限制条件，扩大人民币、港币和澳门元的双向互认、自由流通通道。再次，扩大内地自贸试验区范围和开放程度，推动人民币作为自贸试验区与港澳地区及国外跨境大额贸易和投资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推动自贸试验区与港澳地区开展双向人民币融资。探索实行本外币账户管理新模式，在账户设置、账户业务范围、资金划转和流动监测机制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建立与大湾区发展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在跨境资金管理、人民币跨境使用、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方面先行先试，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便利化。通过自贸试验区桥梁作用，逐步使三地金融行业融合发展。最后，在支付、结算、信用卡、货币流通、投资、保险、理财、账户等领域，逐步实现三地互联互通、服务配套对接、三地居民待遇同等目标；在银行、证券、基金、信托、金融公司等金融行业逐步放开各种限制条件，放开金融机构互设条件，逐步消除跨境金融服务业并购壁垒，逐步破除三地的体系障碍，构建更紧密的互利共赢的大湾区金融合作长效机制。

三是发展金融科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要实现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必须要有先进技术的支撑。为此，三地要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API和软件开发工具包（SDK）技术、区块链、数字货币、网络安全等。携手推进金融与技术的融合，推进大湾区金融机构协同、金融市场对接、金融产品互认、金融基建互通、金融人才互动协同发展等。进一步推进粤港、粤澳电子签名互认，推动大湾区移动支付便利使用，推进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取消相互之间通信漫游和长途资费，实现免费高速无线在大湾区城市全覆盖。探索在线支付、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云闪付、银联闪付、银联二维码支付、刷脸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新技术的跨境运用。深入推进跨境电子支票联合结算、跨境电子账单直接缴费、支付工具跨境使用等金融服务创新。从技术层面上保障大湾区金融合作发展的实现。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首先，加强三地金融支付体系、清算和结算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等基础条件建设，以及金融网络安全、金融监管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互通共享的征信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为大湾区金融合作发展提供条件保障。其次，推进银行进一步相互开放，三地银行业统一业务流程和业务标准，放开信用卡、储蓄卡办理条件，为三地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第三，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逐步推进跨境结算、缴费、支付等“一卡通”服务，构建服务大湾区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流转的金融基础服务平台。第四，大力发展特色金融。探索设立由三方控股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使之成为互联互通的跨境投融资平台，支持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与环保、金融与科技、教育与卫生、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

域的发展。第五,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探索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澳门证券交易所,发挥澳门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有利地位的优势,专注于债券融资服务、人民币离岸服务,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加快建设广东国际金融城、广东期货交易所、广东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金融贸易市场,建立大湾区“碳交易市场”,建设在岸、离岸跨境金融服务中心,建设全球绿色金融中心区。加快推进深圳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发展及保险业创新发展。全面实现粤港澳资源要素市场的对接连通。优化创新大湾区内资源布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四是建立跨区域市场合作关系。目前,在较大的制度差异下,大湾区内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性较弱。从实际出发,可在符合规则基础上,建立跨区域特色市场合作关系,以实现区域间各项资源共享与流通。一方面,大湾区内政府部门应通过关税减免、政策扶持与跨境服务提供等举措,逐步开展对大湾区金融市场跨区域特色合作关系建立的探索。例如,可通过设立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逐步完善跨区域产品和资本流通机制。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依据金融和科技创新发展产融结合的实际水平,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加快金融产融结合的步伐,拓宽区域内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逐步实现大湾区内市场关系共建。

五是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建立高水平金融科技创新平台。金融科技创新是未来大湾区金融发展的驱动力和创新力,只有建立高水平金融科技体系和平台,金融才能更好地与产业融合以及支持大湾区经济快速发展。可借鉴广东省原有金融产业与科技创新的融合专项资金运作经验,基于已有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对大湾区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路径展开探索,促进内地与大湾区金融市场合作的深化。同时,区内科创企业应同金融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大湾区设立科技与金融协同发展和创新联盟,加快构建有关科创基础设施建设,使区内相关组织机构同国家科技计划更好融合,协同创新。同时,争取中央政府部门将大湾区创新体制改革这一举措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并不断加强对大湾区科技创新重视程度,以推动大湾区国际化创新平台的构建,以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设立。

六是构建大湾区人才体系。大湾区既有具备“中国速度”的经济发展龙头城市,又有香港、澳门两大具备国际航运与贸易能力的国际化都市。但是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人才培养体系。首先,促进大湾区内高校跨区域、多领域、多层面合作,在促使区内复合型科技人才高效流动的同时,实现相关教育资源全方位布局。其次,大规模引进大湾区建设缺乏的各类高素质人才。吸引全球各类高素质人才到大湾区工作,解决户口、住房、子女教育、就业等现实问题,用事业和待遇留住人才,将大湾区打造成全球高素质人才基地。最后,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大湾区人才培养、引进机制。对人才引进与培养提前规划、提前布局。特别是在大湾区内建设高水平 and 高质量的高校,以及在现有高校基础上设置大湾区建设急需的专业。

参考文献:

1. 裴光:《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改革发展》,《中国金融》,2020年第3期。
2. 陈向阳、陈晓云:《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机制构建》,《广东金融》,2022年第4期。
3. 吴燕妮:《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深圳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研究》,《城市观察》,2020年第1期。
4. 赵晓斌、强卫、黄伟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地理科学进展》,2018年第12期。
5. 石佑启、陈可翔:《粤港澳大湾区治理创新的法治进路》,《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6. 王景武:《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中国金融》,2018年第14期。

责任编辑:李蕊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思考^{*}

张生玲 郝 宇

摘要：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乌克兰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大的不确定性。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不仅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而且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只有正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厘清制约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外部因素，以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部考验，解析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及内在机制，明晰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背景下决策层审慎判断并着力推动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破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反映出的经济社会矛盾，才能有效应对国际复杂形势的冲击，准确把握国内发展的目标和诉求，破解难题，迎难而上，转危为机，迈向稳增长、稳预期、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稳增长 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 市场预期

作者简介：张生玲，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郝 宇，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 2022 年，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导致疫情反复，乌克兰危机爆发并引发了一系列波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受到阻碍。依据世界银行（WB）的统计数据，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过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是，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各种严峻性和复杂性挑战前所未有，外有波云诡谲、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内有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现实考验，多重因素叠加出现，多元目标交互影响。迫切需要正确研判，做到“一叶知秋”，未雨绸缪，才能实现“危中见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稳中求进。

一、外部形势：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由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叠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波动，主要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紧缩，全球供应链循环不畅，国际市场利益格局出现巨大变化，地缘政治危机升级，表明全球发展进程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生活以及生态和谐共生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A107）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病毒新变种导致全球疫情周期性爆发

2022 上半年，奥密克戎 (Omicron) 新变种 BA.5 的传播力比几个月前的主流变种 BA.2 高出 50% 左右，美国、英国、南非、日本、朝鲜等国都经历了大规模爆发，病毒对经济的冲击出现了一种周期性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警告疫情远未结束，近期部分国家疫情有抬头趋势 (如图 1 所示)。由于与疫情相关的扰动持续不断，全球供应链遭遇新的不确定性，商品物流和劳动力流动受阻，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转弱。与此同时，国内疫情也不间断地多点散发，包括上海和深圳在内的多个城市因为不同规模的疫情，且出现社区传播，导致一段时间的静态管理，暂停的经济活动给民众的生活和出行带来各种不便，给企业的生产、进出口物流以及供应链大循环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乌克兰危机长期化

乌克兰危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足以引发世界格局产生突变。

第一，战争已经持续大半年，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自 2022 年 2 月下旬乌克兰危机爆发，国际局势急剧紧张，西方能源市场尤其是欧洲能源市场波动明显，原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价格在短时间内急剧攀升。此后，随着冲突愈演愈烈，美国、欧盟等不断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在美国、俄罗斯、欧盟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等势力的激烈交锋中，世界能源价格震荡加剧 (如图 2 所示)。其中，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当天，荷兰 TTF 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跳涨 50% 到 132.71 欧元/兆瓦时，是一年前的 7 倍多，并带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原油、煤炭期货接连快速上涨，欧洲能源形势极度紧张。这场危机在供给端导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价格的上升，进一步拉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在需求端体现为实际收入下降。近两年来，因应对疫情，多数国家选择了宽松货币政策，大量流动性涌入市场，已经引起物价大幅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第二，乌克兰危机造成乌克兰粮食出口受阻。军事冲突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了乌克兰的物资运输和春季播种，导致伊拉克、苏丹等粮食进口国粮价暴涨 50%，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第三，乌克兰危机使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美国虽然没有直接下场与俄罗斯对抗，但在经济战场上，美俄激烈交锋，制裁与反制裁轮番上演。鉴于俄罗斯在某些商品全球供应链中的权重较大，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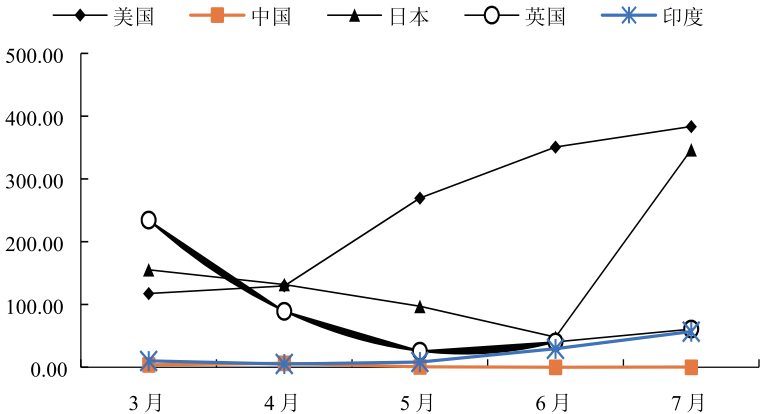


图 1 2022 年 3—7 月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新冠肺炎新增感染人数变化趋势图 (万人)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各国政府和权威媒体公开数据整理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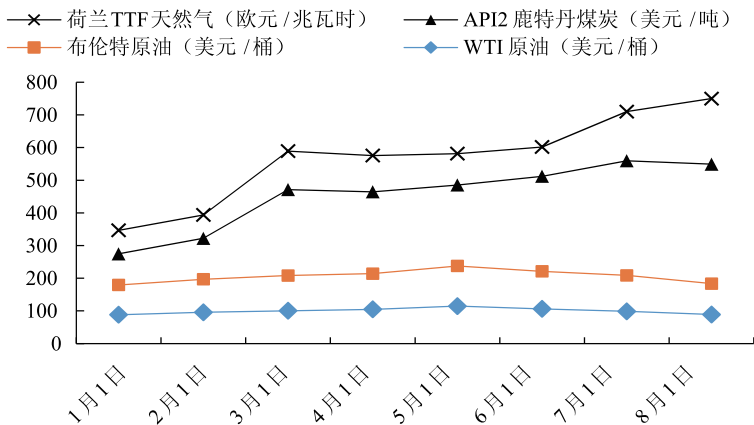


图 2 2022 年 1—8 月国际化石能源期货交易价格趋势图

数据来源：洲际交易所 (ICE)、英为财经。

了化石能源外，还有粮食、特殊金属和矿产品等，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如果乌克兰危机久拖不结，引发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经济影响将会阻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使各国经济政策可能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战争长期化的经济影响将更广泛而深远。

（三）国际供应链循环不畅

当前疫情仍是影响全球供应链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国际物流环节也成为全球供应链最突出的矛盾。鉴于供应链是将产品生产出来并交付到消费者手中所需的一整套商业和运营网络，在这一链条上，原材料供应、零部件制造、劳动力供应、跨国越洋的货物运输等，环环相扣，结织成网。从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的防疫物资短缺、生产停摆，到疫苗供应不足、制造业“缺芯”，再到一些主要港口出现创纪录的“海上大堵车”，运费走高，使全球制造业出现生产受阻和供应不畅。反映港口拥堵水平的克拉克森集装箱港口拥堵指数在2022年7月20日达到了37.9%的新高，远超2016—2019年31.5%的平均水平；波罗的海运价指数（FBX）发布的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Global Container Index）显示，全球集装箱运费自2020年11月以来快速攀升，2021年9月10日最高值达11109美元，与疫情前相比几乎暴涨10倍，此后长期高位运行（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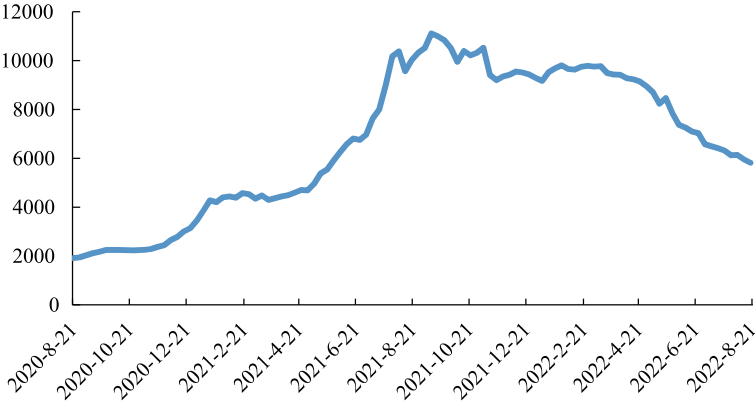


图3 2020—2022 年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变化趋势图（美元）
数据来源：FBX。

据日本经济新闻统计，2022年3月底全球2349家上市制造业企业库存数与2021年底相比，增长了5.5%，创下2018年3月底（6.1%）以来新高；库存金额也增加了970亿美元左右，高达1.8696万亿美元，创过去10年最高纪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年7月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将其在4月份对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量的预测进一步下调（如表1所示）。可以说，供应链循环不畅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复苏。造成供应链循环不畅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疫情不断反复，因防疫而导致国际物流受阻；第二，主要能源消费区的天然气、石油、煤炭库存低于平均水平，价格急剧上升，全球能源供给挑战影响制造业的生产活动；第三，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运输成本上升。供应链风险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凸显，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造成冲击。

表1 IMF对世界贸易量（货物和服务）增长形势的预测 单位：%

	2020	2021	2022年7月预测		与2022年4月预测的差异	
			2022	2023	2022	2023
世界贸易量（货物和服务）	-7.9	10.1	4.1	3.2	-0.9	-1.2
发达经济体	-8.8	9.1	5.3	3.2	-0.3	-1.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6.2	11.7	2.2	3.3	-1.8	-0.9

数据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22年7月。

（四）全球货币紧缩风险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先后推出空前的纾困措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推高了通胀水平。WB 的数据显示，2022 年 4 月，全球通胀达到 7.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达到 9.4%。IMF 的报告也显示，全球有 112 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 6% 以上。随着欧洲、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胀上行风险持续增加，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已经成为部分国家的首要选项。进入 2022 年以来，欧美央行再度释放信号，均表示遏制通胀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不排除更大幅度的加息，引发了全球市场对欧美货币政策加速收紧导致经济衰退的担忧。美联储在 3 月、5 月、6 月、7 月和 9 月共进行了 5 次加息操作，共计 300 个基点，其中 6 月、7 月、9 月，美联储均疯狂加息 75 个基点，这是美国从 1994 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轮加息。美联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一旦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将对全球金融市场、资本流动性和各国汇率构成冲击，最终必然拖累经济和就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较大影响。2022 年 7 月，IMF 对世界主要经济体 2022 年和 2023 年产出增长率的预测较 4 月预测值几乎全面下调，反映出世界经济复苏的暗淡前景（如表 2 所示）。

表 2 2022 年 7 月 IMF 对世界经济增长形势的预测 单位：%

	年 同 比（ % ）				第四季度同比	
	2022 年 7 月 预 测		与 2022 年 4 月 预 测 的 差 异			
	2022	2023	2022	2023	2022	2023
世界产出	3.2	2.9	-0.4	-0.7	1.7	3.2
发达经济体	2.5	1.4	-0.8	-1.0	1.3	1.5
美国	2.3	1.0	-1.4	-1.3	1.0	0.6
欧元区	2.6	1.2	-0.2	-1.1	0.7	2.1
日本	1.7	1.7	-0.7	-0.6	2.4	0.6
英国	3.2	0.5	-0.5	-0.7	0.1	1.3
加拿大	3.4	1.8	-0.5	-1.0	2.5	1.7
其他发达经济体	2.9	2.7	-0.2	-0.3	2.0	2.8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3.6	3.9	-0.2	-0.5	2.1	4.7
中国	3.3	4.6	-1.1	-0.5	4.1	3.2
印度	7.4	6.1	-0.8	-0.8	4.1	7.2
东盟五国	5.3	5.1	0.0	-0.8	3.4	6.1
俄罗斯	-6.0	-3.5	2.5	-1.2	-13.9	4.8

数据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22 年 7 月。
注：欧元区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除上述国家外还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中东和中亚部分国家，此处省略。东盟五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五）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动作频繁

2022 年上半年，美国在亚太地区频繁进行外交活动。第一，东盟“特别峰会”于 5 月 12 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这是东盟历史上第一次在域外国家举行的会议。东盟是东南亚 10 个国家的联盟，是亚洲第三、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经济具有活力，地理位置也很重要，一直是美国想拉拢的目标。第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于 5 月 24 日在东京举行，讨论了全球和地区议程，以及乌克兰局势，但峰会的重中之重是美国要拉拢其他三国共同对抗中国。第三，为了实施全面遏华战略，以美国为首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期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除美国外，首批成员国还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

韩国、泰国和越南。此外，2022年8月2日晚，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引发新一轮台海危机，对于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产生严重影响。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操作向中国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对中国而言，如何应对，极具挑战。

二、内部考验：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

不论外部形势如何复杂多变，立足自身条件和内部考验，转变经济发展思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宝贵经验和中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立身之本。面临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背景，为解决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换挡升级、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主客观障碍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的时代课题，全面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追求经济发展不能走发展初期粗放式增长的老路，必然要倒逼经济系统全面转型升级。

（一）双碳目标引领系统性变革

中国经济体量已达到美国的70%，稳居世界第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势必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面对当前全球气候变暖 and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全球气候危机，叠加中国经济发展迈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和转换经济发展动能新时期，制定双碳目标是国家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了“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为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即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的基础之上，坚决摒弃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对中国而言，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表现在低碳转型、经济转型、技术创新、供应链重构等方面实行一系列系统工程和彻底变革，其意义不亚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举措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能源供应紧张局面，部分省市为了完成能耗双控目标，采取一刀切的“拉闸限电”，能源供求矛盾凸显出来。因此，双碳目标的实现必然要兼顾能源保供和双碳行动的双重挑战，而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使应对该挑战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迫切需要能源体系和经济系统等改革的“深水区”进行深刻变革，通过“先立后破”，稳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二）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通过“干中学”，建立和发展了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发展成果举世瞩目。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必然要走创新引领的低碳绿色发展之路，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和困难很大。第一，减排约束大，特别是能源供给和生产过程等受到较大约束。因为中国的火电、煤电占比较大，要实现低排放或净零排放，火电、煤电最终都要逐渐退出电力市场，形成较高退出成本。但是，现阶段仍然必须坚持分步走，充分发挥火电和煤电的蓄水池、稳定器和调节器作用，增加煤电机组的灵活性。第二，产业转型升级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攻克技术瓶颈需要时间，也需要对创新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因此，政府的绿色投入力度要进一步加大，还要有更多制度激励和政策引导，激发民间创新和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加快制造业领域生产流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尽快突破各种技术瓶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第三，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也对实体经济形成强烈冲击。在加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智慧化转型的同时也要做大做强实体经济，避免经济结构脱实向虚，稳步推进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引导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打造稳定可靠、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链和供应链。

（三）共享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在经济发展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做优存量、做大增量，同时改革分配机制，践行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等理念，实现共享式发展是今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先进理念。共享发展因此成为了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经济建设，中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现阶段，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追求，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共同体，在参与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得到应有的、符合自己期望的回报。这就是既要做出“蛋糕”、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兼顾效率与公平，避免因分配不公出现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具体来看，在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不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四）人口与社会保障压力带来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随着这波人口红利逐渐褪去，第一代青年创业群体逐渐步入老年生涯，人口红利逐渐向“老龄化”负担转变，政府社会保障压力与日俱增。2021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34‰，接近于零增长，中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同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即老龄化率达到 14.2%。这些指标意味着：第一，伴随人口峰值和老龄化到来，劳动人口加快减少，抚养比加速提高，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朝着不利方向变化，潜在增长率继续下降，实现预期增长速度的难度加大。第二，人口负增长带来新的挑战，也就是由于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和收入分配产生的抑制居民消费的效应，总需求不足成为了常态化的消费增长制约因素。第三，社会保障支出伴随老龄化进程而增加，全社会的负担加重。因此，为了稳定和扩大社会总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必须对人口变化做出全面回应，显著提高再分配力度，扩大社会保障支出。此外，全面深化社会保障改革，通过缩小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创造刺激消费的效应，较好地抵消人口转折点所带来的抑制消费的挑战。

三、主要目标：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受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主要发达国家通胀高企、全球经济和金融风险持续累积等来自外部的多重因素影响，同时中国经济短期内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长期面临产业转型升级、人口与社会保障压力。外部因素的多重冲击和内部考验的不断加码，国际经济发展秩序脱离稳态，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剧，导致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断孕育，迫切需要深入分析和研判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巩固和拓展中国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势头，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一）千方百计稳增长

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的严峻形势，2022 年上半年，中国部分地区经历短期困难，经济增长指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全国二季度经济增长为 0.4%，上半年增长为 2.5%，与全年预期增速目标差距较大，也加大了下半年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难度。为了兼顾和协调稳增长、稳就业与稳通胀的关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了稳增长、促发展的 33 项措施，从财政、金融、产业链供应、消费和

投资、能源安全、基本民生六个方面高效统筹经济发展。从宏观政策到微观纾困，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畅通循环，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2022年下半年将以执行、落地为主，比如新能源汽车下乡、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努力发挥“拉动消费带动生产”的作用；适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基建的稳投资、扩内需、促升级、优结构的作用。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统筹和权衡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要求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回顾过去三年，疫情虽然是导致中国经济扰动的重要因素，但也要防止防疫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刀切”所带来的后果，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千方百计稳经济增长，切实做到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疫情暴发以来，各种不确定因素叠加，整体市场预期低迷，特别是旅游、餐饮、零售等服务行业因多次按下“暂停键”而导致收入下降，最终消费下降的幅度增大。只有市场繁荣，才能稳就业、稳消费进而稳增长；而市场繁荣的前提是要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才能使稳增长的各项政策精准着力，效果显现。具体来看：第一，营商环境是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便利性、公平性、透明性、法治化和国际化等特征；第二，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可以增强市场主体的投资激励，也能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力；第三，良好的市场生态是由信息传递畅通、外部反馈及时以及企业策略互动所构成的信息循环系统，其重要特征是核心企业能够不断获得系统整合报酬，提高企业预期收益，增强潜在的投资者兴办企业的激励，最终达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目的。

（三）发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

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中国的成本价格低、大规模生产等传统优势已经被削弱，但中国的产业配套完整、市场空间巨大、劳动生产效率较高等核心供应链竞争优势依然很明显。第一，在数字化、品质化、绿色化转型中的优势大。如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等一些数字化与绿色化交汇的产业，已经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未来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是中国能真正实现后来居上的战略机遇。这是因为，数字化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品质化是追求卓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化是“双碳”背景下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二，中国拥有庞大的民营企业群体。亿万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实现创新的生力军；民营企业更加注重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品质化与绿色化转型，践行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强大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的支持性产业政策充分发挥了资源禀赋的优势，使中国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政府通过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引导和鼓励企业投资，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良性互动，有效克服了市场失灵，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

（四）配合内政的智慧外交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同时服务于内政。中国经历40余年的改革开放，精彩的外交实践争取到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为国内发展保驾护航，为“中国奇迹”贡献了智慧。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关系，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复杂的世界政治局势。中美两国无疑是大国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对，但近年来两国关系紧张，频繁的贸易摩擦，不断的政治冲突，再加上突如其来的疫情蔓延，让所有人都闻到了两国关系中浓浓的硝烟味。中国外交再次被时代赋予了使

命，需要认真研判，深入研究，要有战略高度，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张弛有度，要据理力争去争取中国的核心利益，使更多国家和民众了解并理解中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有为地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服务，有效维护中国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并且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

四、破题之钥：恢复经济主体的信心与预期

2022 年上半年，疫情在全国多点散发，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相继出现社区传染。为了避免疫情大规模外溢，不得已的防疫封控，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市场信心和预期再次承压。回顾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政府及时提出了“信心比黄金重要”，推出一揽子应对计划，有效化解了风险，使经济快速恢复到正常轨道。当前重拾信心与预期依然非常重要，保住市场主体才能稳住经济大盘，恢复经济主体的信心和预期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先行之举”和“破题之钥”。

（一）让市场无形之手发挥更大作用

一般来说，政府有形之手在应对短期冲击和市场失灵方面具有优势，但过度依赖也容易造成不同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的失落，不可预测的行政干预，可能导致市场主体的逐渐退出。2022 年，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又叠加了乌克兰危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波动，以及美国加息可能引发的资本外流风险等等，给全球经济带来不可控的悲观预期和经济衰退。其中，病毒不断变异导致的疫情反复已经持续了三年，给全球经济、社会、人民生活都带来严重冲击。我们如何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关键是要尊重科学，灵活调整防疫政策，在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下，最大程度地使生产和经营活动恢复正常。此外，鉴于中国市场规模巨大，应有效发挥内循环的作用和优势，建立健全统一大市场，尽量减少人为干预和行政干预，给经济社会注入确定性，把不确定性转换为确定性，为经济增长打下一个“稳”的基础。

（二）高度关注各种经济风险产生的连锁反应

2022 年国内出现了一些群体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是部分省市的烂尾楼业主断供事件不断发酵。如果断供风险进一步蔓延，不仅影响开发商，银行、购房者以及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和企业，很容易形成风险的循环、扩散与叠加。特别是在当前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住房销售面积、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的背景下，必须高度关注房地产领域的风险。因为房地产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同时，房地产本质上也是民生问题。如何处置好这个问题？既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方针，又要保证基本住房需要，尤其是居民的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以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住房需求。事实上，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进一步上升，房地产市场仍有很大发展潜力，但必须调整发展方式，避免引发由房地产带来的金融泡沫衍生。二是部分村镇银行引发的群体事件。由村镇银行引起的各种乱象说明银行管理存在漏洞，监管出现真空。后续的解决措施为银行客户垫付本金的行为，不仅是在挽救银行的声誉，也同样是在挽救储户对于银行的信任。如果银行方面失去了储户的信任，意味着为银行背书的相关部门也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无疑是最糟糕的情况。类似已经出现苗头的现实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三）缓减过度竞争和行业内卷

内卷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一是制造业内卷。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但以中低端制造为主，产品同质化、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由于面临一系列“卡脖子”问题，企业乃至行业发展易受制于人，产业链掌控权和话语权较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产业内卷化倾向。规避产业内卷，是中国迈向制造强国要解决的拦路虎，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需正视和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从产业发展角度看，恶性低价竞争造成产业内卷情形，短期会直接影响企业生产效益，长期则可能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直接影响整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因此，迫切需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切实形成促进制造业转型与升级的制度环境，引导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二是互联网平台发展问题。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平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更大空间，但也可能带来无序扩张，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迫切需要处理好发展与规范、安全等方面的关系，减少法律和监管真空，引导平台经济茁壮成长。三是就业市场内卷。后疫情时代，市场投资预期减弱，就业率下滑，增加了人才市场的内卷程度。如大学生就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学历歧视和编制唯上。如果说学历歧视是用人单位的内卷，编制唯上就是就业者的内卷，数百人争抢一个编制的现象，显示出内卷的激烈程度。中国未来的发展还要依靠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如何激发年轻人口的创新精神，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与此同时，还需要防止就业市场内卷带来的躺平现象。

（四）以高水平改革开放促发展

改革开放 40 多年，巨大的制度红利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和值得尊敬的企业家。历史证明，中国是人口大国，只要往市场化迈开一小步，经济就能发展一大步；只要在思想上放开一点点，就能创造惊人的经济成果。一是以优化营商环境稳市场预期。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持续恢复态势没有改变，发展潜力大、韧性足、空间广的特点也没有改变，关键在于解决当前的市场预期转弱问题。疫情之下，更是要多措并举，从着力减负担、增信贷，助力企业爬坡过坎，到优环境、添动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这些举措短期是纾困，长期看是增强市场主体应对困难的底气。二是重拾企业信心。企业信心全面转弱，不仅是当前中国经济全面下行最重要的原因，也可能是影响未来十年甚至几十年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企业有信心，才能有意愿进行投资与生产，才能保市场主体，让更多人有就业的机会。三是关注预期管理。预期管理一定要走在做出判断和采取行动的前面，改善预期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在重点领域和行业设置红绿灯，让资本走入促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道路上。同时，对市场主体的诉求做到心中有数，及时高效解决市场关注的痛点问题，才能使市场主体形成一个清晰的预期，最终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邢予青：《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年。
2.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3. 蔡昉、贾朋：《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比较》，2022 年第 3 辑。
4. 魏加宁、周毅等：《20 世纪 70 年代发达国家滞胀的回顾与启示》，《比较》，2022 年第 3 辑。
5. 张生玲、贺易楠：《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回顾与前瞻》，《中国经济报告》，2022 年第 1 期。
6. 张生玲、刘琨：《面向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百位智库专家为党建专题文章）》，《中国经济报告》，2021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李蕊

日本介护保险支持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张 瑾 潘 林

摘要：日本在《介护保险法》实施之初，就把康复辅具纳入了待遇给付范围。本文从资金来源、保障对象、给付内容、服务递送、保险给付等多个维度，介绍日本介护保险支付老年人居家康复辅具租赁和购买费用的保险制度。实践表明，介护保险制度对康复辅具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起到了带动和促进作用，能够有效降低老年人的经济负担，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培育专业化养老服务的人才队伍。从日本介护保险制度实施的效果得到启示，我国应鼓励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探索将康复辅具纳入待遇范围，制订全国统一的辅具目录和参考定价，原则上以服务和实物给付为主，逐步取消现金给付，设立康复辅具独立补助额度和优化自付比例，培育和壮大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释放巨大消费潜力，完善控费政策，保持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介护保险 康复辅助器具 养老保障 长期护理

作者简介：张瑾，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潘林，利宏达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and 健康支撑体系，发展老龄产业。^① 2016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印发以来，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但由于起步晚、起点低，产业基础薄弱，正处于从小到大、爬坡过坎的发展历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自 2000 年《介护保险法》实施以来，就将康复辅助器具的租赁及购买服务纳入待遇范围，为需要照顾的老人及家庭提供了切实的生活帮助，为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付来源。^②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完善长期

^{*} 本文为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委托课题“长期护理保险对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研究——基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观察”研究成果。

^①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 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1 年 6 月 1 日 01 版。

^② 康复辅助器具简称康复辅具。

护理保险支持康复辅具产业发展的制度设计，对健全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介护保险中康复辅具保障制度

（一）给付内容

1. 功能定位

《介护保险法》中的康复辅具是指方便失能者日常生活和功能训练所需的用具，目的是在住宅中帮助失能者提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分为租赁和购买两种，聚焦于提高老年人自理能力和减轻亲属等照护人员负担的产品。2005 年，《介护保险法》修订时提出，要建立重视预防型护理体系，为需要轻度护理的老年人提供预防型护理服务，降低转为重度护理的风险。可租赁的康复辅具有 11 大类，包括轮椅（含附件）、特殊护理床（含附件）、防褥疮用具、体位转换器、扶手、坡道、步行器、步行辅助杖、失智老人徘徊感知器、移动用电梯（吊具部分除外）、自动排泄处理装置。^① 可购买的康复辅具有 5 大类，包括坐便器和自动排泄处理装置的可更换部分、洗浴辅助用具、简易浴缸、移动用电梯的吊具部分。^②

2. 目录分类

相关生产企业将产品在公益财团法人技术援助协会康复辅具信息系统（Technical Aids Information System, TAIS）数据库进行登记，取得编码既视同进入目录范围，可供被保险人挑选并由介护保险支付。截至 2021 年 3 月，已登录 815 家辅具生产企业的 14612 件辅具产品。^③ 介护保险可支付的辅具 12524 件，包括 11221 件租赁产品和 1303 件购买产品。根据《关于平成 30 年度介护报酬改订的效果验证及分析研究——康复辅具租赁价格合理化调查研究》，每个服务机构向外租赁商品平均数量排序前三位的是特殊护理床附件、扶手和特殊护理床。厚生劳动省《平成 29 年度介护给付费等实际状况调查的概况》显示，在康复辅具租赁服务中特殊护理床及其附件的总件数占比合计为 45.1%、扶手占比 22.6%、轮椅及其附件占比 12.3%、步行器占比 9%。按大类统计中，特殊护理床占比 28.8%、轮椅占比 16.6%，若加上其附件，两项约占康复辅具租赁的 60%。

3. 服务定价

《介护保险法》规定的康复辅具租赁和购买服务，由综合性介护服务连锁机构和康复辅具的租赁企业提供。介护服务机构从制造商买入产品，或从康复辅具租赁企业承接租赁或销售外包服务后，为周边 6~20 个市町村的人群提供服务。康复辅具的租赁和销售并非统一定价，价格因供应商而异，全国各地价格差距较大。为确保租赁和销售价格处在合理区间，提高价格的透明度，2018 年 10 月起厚生劳动省根据全国辅具租赁和销售平均价格，设定价格上限，并由 TAIS 每季度公布最新的全国平均价格和上限，公开透明的价格供康复辅具咨询专员和使用者参考。

《介护保险法》中规定，原则上以租赁优先，对重复使用存在心理抵触、使用后会使原本形态和品质发生变化的福祉用具，保险可给付购买费用。实行总价控制，康复辅具租赁与介护等级相关，康复辅具购买不受介护等级限制，原则上每年限额 10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6400 元。康复辅具咨询专员

①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一般社团法人全国福祉用具专门相谈员协会网站信息整理，<http://www.zfssk.com/kaigo/syumoku.php>。
②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一般社团法人全国福祉用具专门相谈员协会网站信息整理，<http://www.zfssk.com/kaigo/syumoku.php>。
③数据来源：公益财团法人技术援助协会 TAIS 数据，2021 年 4 月，<http://techno-aids.or.jp/sys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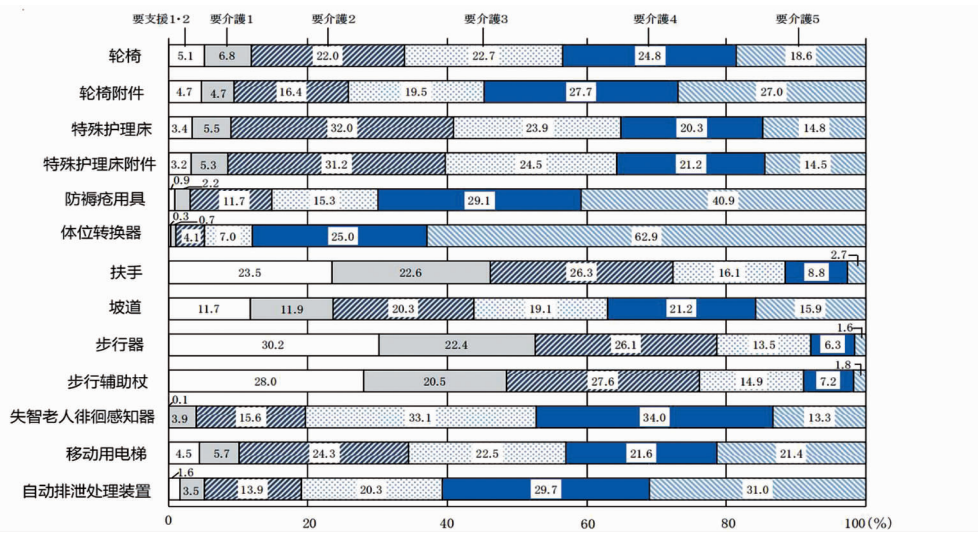


图 1 2017 年度康复辅具租赁商品件数按介护等级分类使用占比表

数据来源：厚生劳动省《平成 29 年度介护给付費实际状况调查的概况》。

根据使用者被评定的介护等级制定《福祉用具服务计划书》，在支付限额的总价规定内，统筹考虑租赁、购买康复辅具和其他服务的经费，提供康复辅具选择建议。使用者根据介护需要和自我意愿，选择享受何种租赁或购买服务并支付费用。

（二）服务递送

服务递送是指从服务生产方到服务接收方之间的渠道安排和系列流程。康复辅具租赁和购买的流程包括评估及服务供应。评估是综合考虑功能障碍者需要完成的活动、身体与心理状态、环境与政策等因素，为其选择合适的产品种类，并确定可获得的经费支持。服务供应是用户根据评估结果，选择并获得具体产品和服务的过程。

1. 评估阶段

由被保险人所在市区町村的行政机构对康复辅具租赁和购买的申请人进行认定。结果分为四类：重新调查；有自理能力，不能接受护理服务；“要支援”1~2 级，只能接受居家护理服务，不能入住养老机构，可享受介护预防康复辅具租赁和购买的服务；“要介护”1~5 级，分别对应轻度护理、中度护理、重度护理、最重度护理和特重度护理，可享受康复辅具租赁和购买的服务。介护计划实施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健康调查和重新评估，根据健康状况的改善或恶化程度，调整介护等级，制定新的介护计划。

2. 提供服务

康复辅具租赁、购买和住宅改造包含在介护服务计划中，评估完成后，由介护经理为申请人制定符合介护等级要求的服务计划，包括服务内容与时间等。康复辅具咨询专员向申请人提供康复辅具的相关信息和供应商建议，辅助介护经理制定康复辅具服务计划书，对使用者进行适用性检查、使用指导与效果评估，根据用户的身体状况调整辅助器具。

（三）保险给付

1. 给付依据

根据《介护保险法》规定，康复辅具的租赁和购买给付方式及服务给付与实物给付，不给使用者

发放货币补贴。为了减少福利的滥用，保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日本在给付目录中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支付限定，设定严格中立的评估制度，在支付限额上实行总价控制。康复辅具租赁产品与居家上门服务、日托、短期入住等居家服务经费统筹考虑，每月不同介护等级可享受的支付总额不同。介护经理和康复辅具咨询专员在限额的范围内为使用者高效、合理地安排介护计划，避免了介护服务的浪费。个人承担介护费用的 10% ~ 30%，负担比例与收入成正比。^① 70% ~ 90% 的护理费用由介护保险基金拨付给提供服务的机构，超出《介护保险法》规定限额的部分由被保险人全额自付。

表 1 不同介护等级每个月可使用的上限金额

给付种类	介护等级	居家护理费用（家庭访问、日托、短期入住、辅具租赁等）	住宅环境改造	康复辅具购买
预防给付	要支援 1	50320 日元/月（约合 3200 元人民币）	200000 日元（一次性支付，约合 12800 元人民币）	100000 日元/年（约合 6400 元人民币）
	要支援 2	105310 日元/月（约合 6800 元人民币）		
介护给付	要介护 1	167650 日元/月（约合 10800 元人民币）		
	要介护 2	197050 日元/月（约合 12600 元人民币）		
	要介护 3	270480 日元/月（约合 17300 元人民币）		
	要介护 4	309380 日元/月（约合 19800 元人民币）		
	要介护 5	362170 日元/月（约合 23200 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厚生劳动省《2019 年介护保险法修订》整理而得。

注：人民币金额按照 2020 年日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 6.4 折算。

2. 支付概况

2005 年修订《介护保险法》时增加预防型护理服务，为“要支援”1 ~ 2 级提供康复辅具租赁和购买服务后，厚生劳动省开始单独统计预防型护理服务的支出费用。随着使用者人数逐年增加，支出费用成倍增长。要支援的康复辅具租赁服务的年总费用支出由 2006 年 3.1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 29.2 亿元，增长了近 8 倍多；“要介护”1 ~ 5 级的康复辅具租赁服务的年总费用支出由 2006 年 104.3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 212.9 亿元，翻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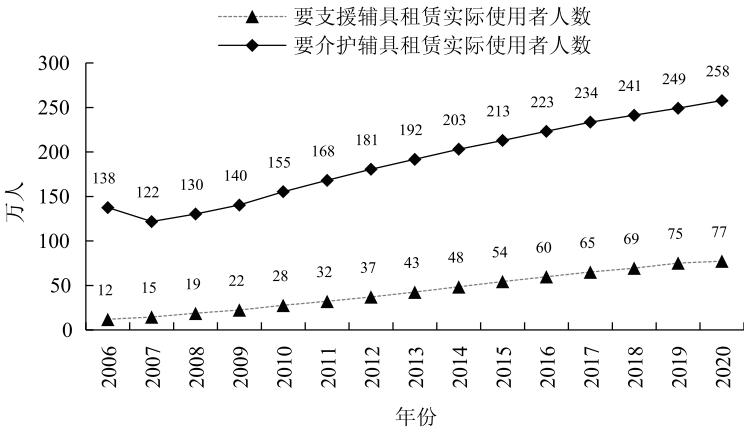


图 2 2006—2020 年康复辅具租赁服务实际使用者人数变化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厚生劳动省《2021 年介护保险事业状况报告》整理而得。

介护保险支付评级可分为“要支援”和“要介护”两大类。2006—2020 年，“要支援”的预防型护理服务支出占介护总支出的比例约为 3%， “要支援”居家介护是预防型护理服务的主要形式，占“要支援”总费用支出的 80% 以上。辅具租赁费用支出在居家介护中的占比近年来明显增加，从 2016

①65 岁以上的第 1 号被保险人，自 2015 年开始，单身家庭年收入（含年金和其他所得）280 万日元（约合 17.9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或夫妻家庭年收入 346 万日元（约合 22.1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原则上承担 20% 费用。自 2018 年开始增加规定，单身家庭年收入（含年金和其他所得）340 万日元（约合 21.8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或夫妻家庭年收入 463 万日元（约合 29.6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原则上承担 30% 费用。第 2 号被保险人承担 10%，与所得无关。

年 7% 增加到 2020 年 21%，表明日本日益重视预防作用，使用者通过康复辅具租赁减缓轻度失能向重度失能转化过程。

（四）人才培养

康复辅具咨询专员是市场化专业服务人员，帮助被保险人更好地对接需求、政策和产品服务。通过使用适当的辅具实现居家自立生活，将辅具在市场流通的情况传递给产品研发和制造端，对辅具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护理福祉士、假肢矫形器士、保健师、护士、准护士、物理治疗士、作业治疗士、社会福祉士等具有福祉、医疗和保健相关国家资格者均可以通过培训成为康复辅具咨询专员。培训内容包括介护保险制度、老年医疗知识、康复辅具技术和使用相关知识等。

（五）控费措施

日本介护保险控制费用的方式，包括限制申请对象种类、限制产品类型、控制品类单价、控制总价、限制产品申请数量与年限、控制评估环节、控制用户自费比例等。经过多年的数据积累和测算，日本对人口结构变化和介护需求有了系统的统计和预测，依此对康复辅具待遇补贴总金额进行控制。对被保险人失能等级进行严格评估，根据收入情况确定10% ~ 30% 自付比例。利用康复辅具目录来划定范围，设定辅具产品分类的价格上限，超出部分不予补贴，在设定单品价格控制的基础上做好每个人的年度补贴总额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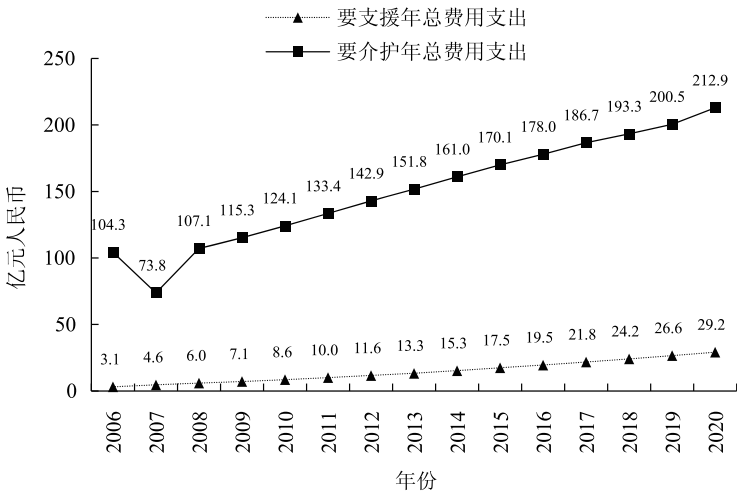


图 3 2006—2020 年康复辅具租赁年总费用支出变化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厚生劳动省《2021 年介护保险事业状况报告》整理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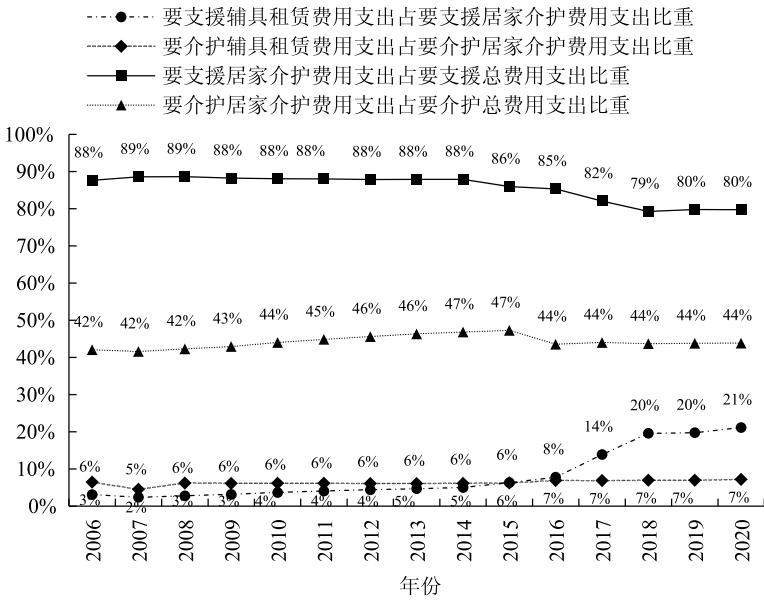


图 4 2006—2020 年康复辅具租赁及居家介护费用支出占比变化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厚生劳动省《2021 年介护保险事业状况报告》整理而得。

二、介护保险对康复辅具产业发展和老年照护产生的影响

介护保险通过按照一定比例支付康复辅具的购买和租赁费用，为康复辅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日本政府鼓励民间服务企业、社会福利法人和非营利组织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康复辅具服务，通过设置自付比例，引导从业者按照市场原则和竞争机制提供更优质的康复辅具产品和服务，

形成良性循环。涌现出一大批参与介护保险的康复辅具服务企业，间接带动了康复辅具产品研发、制造和服务产业的发展。介护保险制度使辅具更容易进入老年人家庭，帮助老年人在居家养老中实现自立，减轻了护理压力；培养了专业人才，提高了技术研发水平，促进康复辅具产业的发展。

（一）带动康复辅具制造业发展

介护保险制度对日本康复辅具的市场规模产生重要影响，在制度引导下，不同租赁和购买对象产品的市场规模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以 1999 年《介护保险法》实行前一年的市场规模数据为基数 100，各产品的增长趋势明显。2019 年用于租赁的步行器的市场规模为《介护保险法》实行前的 6 倍，步行辅助杖、扶手、体位转换器、防褥疮用具、轮椅附件和移动用电梯的市场规模都得到大幅增长。与此同时，用于租赁的特殊护理床、手动轮椅、电动轮椅、坡道则有所下降，用于购买的自动排泄处理装置和洗浴辅助用具则有所增长。由此看出，可以在步行器、步行辅助杖和扶手帮助下实现行走的使用者对辅具租赁的需求最为旺盛。说明此类辅具在介护保险的租赁服务支持下，为帮助老年人的生活自立、减轻照护者负担方面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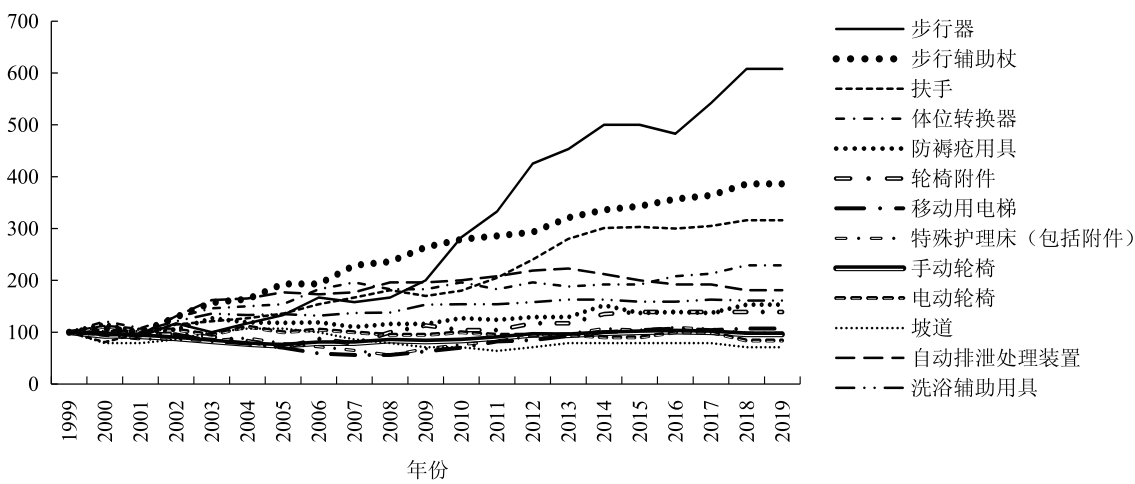


图 5 1999—2019 年介护保险制度对康复辅助产品市场规模影响变化图

数据来源：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福祉用具・生活支援用具协会《康复辅具产业市场动向调查报告（2019 年版）》。

（二）促进康复辅具服务业发展

介护保险推动了辅具服务产业的发展。康复辅具的产业链主要包括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消杀和修理等环节，由生产厂家、辅具租赁公司、辅具租赁和销售业务所^①组成。辅具租赁公司从生产厂家买入辅具，提供给租赁和销售业务所，为业务所提供辅具的回收、清洗、消毒、修理和保管服务，形成辅具的循环利用闭环。在产业链中，随着《介护保险法》的实施，康复辅具服务的诞生使消杀修理工厂成为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辅具产业有着统一的生产和洗消标准，大型辅具租赁公司拥有自己的洗消工厂，承接不具备洗消能力的社区租赁业务所的外包业务。每件完成洗消的辅具部件都会贴上专属二维码，保证可溯源。以日本三菱集团旗下的 NCS 公司（Nippon Care Supply）为例，公司成

^①《介护保险法》规定，康复辅具租赁与销售业务所只要向都道府县提出申请并获得认可，拥有 2 名以上康复辅具咨询专员，并拥有产品清洗消毒存储等必要条件，即可纳入介护保险支付范围。

立于 1998 年，以《介护保险法》的实施为契机开始辅具的租赁、消杀、修理业务，目前在全国拥有 80 余家工厂，2020 年营业额为 1.26 亿元人民币，为周边业务所或其他养老机构提供辅具的消杀外包服务，业务稳步增长。康复辅具租赁业务所的数量呈现快速增长，从 2000 年的 2685 个增加到 2019 年的 7651 个，每个业务所平均配置的康复辅具咨询专员基本保持在 3~4 人，带动了就业。

（三）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

租赁的康复辅具成为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重要工具，对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质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比来看，在日本购买一辆普通轮椅的价格约合 3000 元人民币，同样的支出可以租用 83 个月，而且租赁还可以享受优质的上门服务，大幅降低了使用者的经济成本。《介护保险法》目的是对老年人生活自理的支援和防止重度化，使老年人能够在自己长期居住的地区生活。理想的老年生活不是全部躺在养老机构和医院里，而是要尽量在自己家里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介护保险将康复辅具租赁和购买纳入给付范围，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支持与帮助老人在养老生活中保持自立，通过身体上的自立，实现心理和社会性的自立。一般社团法人

日本福祉用具供给协会发布的《关于康复辅具使用效果的研究报告》显示，使用者在辅具帮助下身体机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改善的情况一般出现在使用后的前 4 个月，第 6 个月后处于维持状态，自理程度越低效果越明显；使用者主观上更愿意与人和社会交流的欲望在使用后的前 4 个月有所增强，第 6 个月后处于维持状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辅具使用者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有所改善。

（四）培育辅具专业化人才队伍

在介护保险的支持下增加了就业，培育了专业人才队伍。介护保险制度实施后，康复辅具租赁的使用者大幅增长，由 2000 年的 10.6 万人增加到 2019 年的 202.3 万人；辅具租赁与销售业务所的工作人员，由 2000 年的 0.8 万人快速增加到 2005 年的 1.8 万人，目前保持在 3.5 万人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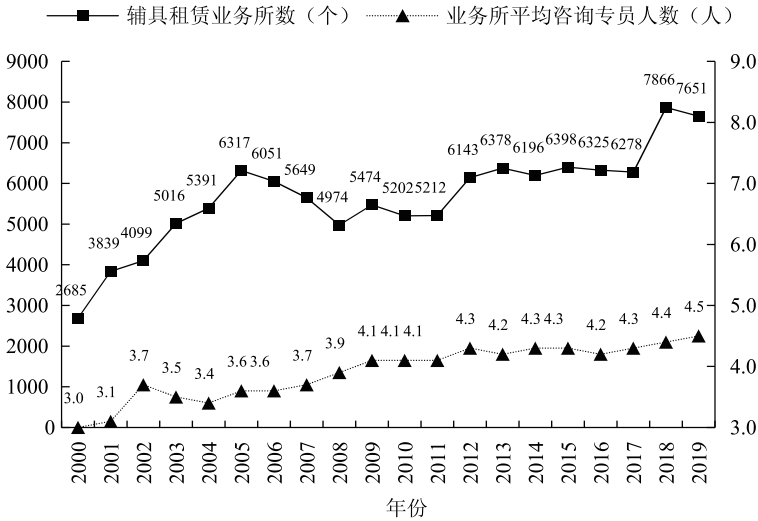


图 6 2000—2019 年康复辅具租赁业务所变化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厚生劳动省《介护服务设施·业务所调查》历年数据整理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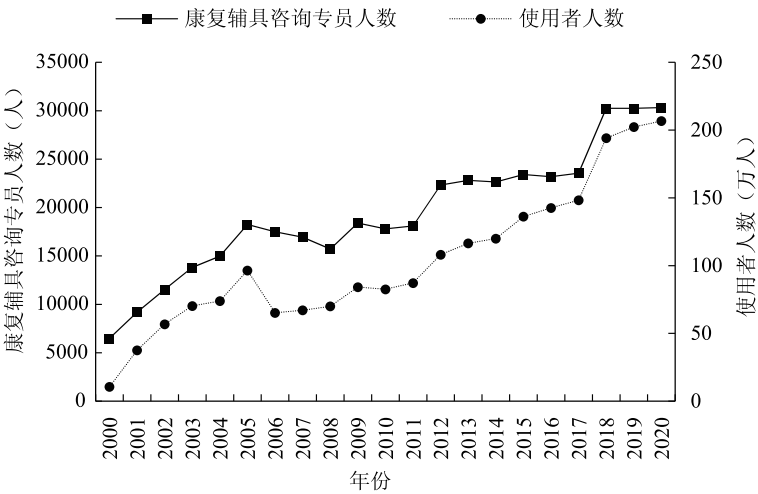


图 7 2000—2019 年康复辅具咨询专员人数变化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厚生劳动省《介护服务设施·业务所调查》历年数据整理而得。

三、对完善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康复辅具待遇制度的启示

（一）鼓励具备条件的试点城市将康复辅具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通过对我国多个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试点城市数据分析和调研访谈，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家一致认为，把康复辅具纳入长护险保障范围，能够带动康复辅具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改善失能老人家庭的生活质量，增加就业和培养专业人才。从日本经验看，为提升失能老人的自理能力，介护2级和3级使用康复辅具的人数占比40%，介护4级和5级占比21.5%。因此，通过科学的测算，在保持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前提下，鼓励具备条件的试点城市逐步探索将待遇覆盖人群从重度失能扩大到中度失能。引导和鼓励更多的长护险试点城市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将康复辅具纳入长护险待遇范围，充分发挥长护险对康复辅具产业的培育和带动作用。

（二）制订全国统一的辅具目录和参考定价

及时研究制订全国统一的康复辅具配置评估标准。建立基本型康复辅具目录，目录产品满足中度、重度失能人员的普遍需求，将轮椅、护理床、防褥疮床垫、移位机、坐便椅等基础普惠类产品优先纳入目录，租赁的康复辅具产品，需要具备可流转、可回收、可洗消特性，确保康复辅具实现循环利用。完善康复辅具租赁定价和支付机制，根据行业特点和市场规律合理定价，让服务企业取得合理利润。根据全国康复辅具租赁的平均价格，设定价格上限，并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定期公布。适当调整支付方式，缩短支付周期，租赁服务结束后康复辅具所有权归租赁公司。

（三）原则上以服务 and 实物给付为主逐步取消现金给付待遇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把购买和租赁康复辅具纳入保障范围，制度设计初衷是以较低价格为老人提供真正需要的康复辅具，改善其生活质量，发挥康复辅具对养老服务的支撑作用。部分城市长护险试点制度有现金给付选项，出发点是给老年人家庭更多照护选择，而非增加失能老人收入。现金给付难以达到制度设计初衷，建议逐步取消失能家庭居家护理的现金补贴选项，增加对失能人员配置康复辅具的支持，让更多失能人员享受到康复辅具配置服务。

（四）设立康复辅具独立补助额度和优化自付比例

调整一些地方康复辅具服务与居家上门护理服务、居家短期照护服务共享补助限额的规定，给康复辅具服务设立单独补助科目，享受单独补贴额度。康复辅具补贴费用由基金和被保险人共担，可以促进服务监管，只有用户认可的服务才愿意支付自付费用，优化长护险基金和个人支付比例，适当降低康复辅具租赁费用个人自付比例，按照限额内长护险基金和个人9:1或是8:2的比例支付。这种比例结构既能满足老百姓的切实需求，又能降低家庭的经济开支，同时能防止泛福利化。

（五）培育和壮大康复辅具产业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鼓励将康复辅具相关知识纳入临床医学、生物学工程等专业教育，以及医师、护士、特殊教育教师、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专业人员继续教育范围。支持企业、院校合作建立实用型人才培养基地，鼓励企业为教师实践、学生实习提供岗位。完善康复辅具从业人员职业分类、国家职业标准、职称评定政策，在将“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基础上，研究建立康复辅具咨询师、介护经理职业资格制度，具有医疗和保健相关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者均可通过培训成为康复辅

具咨询师。

（六）完善控费政策保持长护险基金的可持续性

使用总额控制、用户自费比例、申请对象种类限制、加强监管等方法，保持长护险基金可持续。加强数据积累和测算，测算可能享受待遇的参保人的数量，确定不同失能等级被保险人的补贴待遇水平，每年进行调整；根据长护险支出总额确定康复辅具待遇支付比例，比如将康复辅具租赁和购买支出总量控制在长护险支出总额的一定比例以内；严格控制评估标准，加强失能评估环节控制，审核评估者资质，指导失能家庭有效使用康复辅具；建立健全基金监管机制，创新基金监管手段，完善举报投诉、信息披露、内部控制、欺诈防范等风险管理制度，确保基金安全。

参考文献：

1. 日本厚生劳动省：《介护保险制度概要》，日本厚生劳动省网站，2021 年 12 月 20 日。
2. 日本厚生劳动省：《介护服务信息指南》，日本厚生劳动省网站，2018 年 3 月 30 日。
3. 日本厚生劳动省：《提高居家护理中的介护服务事业生产率的指导意见（2019 年修订版）》，日本厚生劳动省网站，2020 年 6 月 30 日。
4.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福祉用具供给协会：《提高辅具租赁服务使用者·家属满意度问题集》，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福祉用具供给协会网站，2012 年 6 月 30 日。
5.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福祉医疗机构：《介护保险中的康复辅具选定判断标准》，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福祉医疗机构网站，2004 年 6 月 30 日。
6. 日本厚生劳动省：《关于平成 30 年度介护报酬改订的效果验证及调查研究的调查——康复辅具租赁价格合理化调查研究事业报告书》，日本厚生劳动省网站，2019 年 6 月 30 日。
7.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福祉用具供给协会：《康复辅具利用效果研究事业报告书》，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福祉用具供给协会网站，2018 年 6 月 30 日。
8.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福祉用具·生活支援用具协会：《康复辅具产业市场动向调查报告（2019 年版）》，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福祉用具·生活支援用具协会网站，2021 年。
9.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技术援助协会：《康复辅具信息系统》，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技术援助协会网站，2021 年 12 月 20 日。
10.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技术援助协会：《2020 年度事业报告》，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技术援助协会网站，2021 年 6 月 30 日。
11.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技术援助协会：《介护保险中的康复辅具实际状态调查研究报告书》，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技术援助协会网站，2009 年 4 月 6 日。
12. 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全国福祉用具专门相谈员协会：《介护保险与康复辅具租赁和销售对象种类》，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全国福祉用具专门相谈员协会网站，2021 年 12 月 20 日。
13. 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全国福祉用具专门相谈员协会：《介护服务使用流程》，日本一般社团法人全国福祉用具专门相谈员协会网站，2021 年 12 月 20 日。
14. 魏晨婧、李高峰、何艳等：《日本辅助器具社会保障政策研究》，《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21 年第 8 期。

责任编辑：李蕊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 指标构建和跨国比较^{*}

倪淑慧 刘东民

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经济体只有充分了解自身在全球金融治理当中的竞争力表现，才能有效地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以更好地反映主要国家力量的对比和变化。对此，本文将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界定为各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当中影响国际规则设定的相对权力，并将其分为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和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三个层次，测算了 34 个主要经济体的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指数。测算结果显示：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系；分层次来看，全球金融组织竞争力更向发达国家集中，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相对分散，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中发展中国家排名提升最为显著。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提升自身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的对策意见。

关键词：全球金融治理 竞争力 跨国比较

作者简介：倪淑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东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主任、副研究员。

引 言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张宇燕，2019）。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必然要求提升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相对地位，这就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竞争关系。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这种竞争关系主要表现为各国在国际金融制度领域的竞争，即围绕着制度或机制运行规则而展开的对规则设定主导权的竞争（李巍，2017）。因此，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主导国会通过在已有制度内约束崛起国，甚至以直接退出现有机制的方式，维护自身主导权，限制崛起国参与国际规则设定的权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改革是一个典型案例。2010 年 IMF 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Quota and Governance Reforms，即第 14 次份额总检查），决定将超过 6% 的份额从代表性过高的成员国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份额将从此前的 3.994% 大幅上升至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金融结构优化与高质量技术创新研究”（批准号：21&ZD111）部分成果。

6.390%，跃升为 IMF 第三大份额国。但是，由于美国国会拖延了 5 年才批准该议案，IMF 份额改革直到 2015 年方得以完成。由此可见，在作为集体行动的全球金融治理当中，少数拥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可以通过纯粹基于本国利益的国家权力介入，而大大增加集体行动的难度，并降低全球金融治理的公正性和效率。

在国际层面上，如何根据主要国家力量的对比和变化，调整和分配各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当中的话语权，是增强全球金融治理的公平性并提升其效率的关键，也是未来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深入分析和测算各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竞争力，为中国提升竞争力提供参考，这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

一、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概念界定与指标选择

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相互协作从而解决全球共同面临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行为则以一系列国际社会认可的制度、规则以及规范为基础（张宇燕、任琳，2015）。因此，全球治理的本质是调节全球问题中利益冲突的集体协作活动。James N. Rosenau（1995）在界定治理概念时，指出相比传统的政府统治，治理还应包括非政府间的私人协作机制。在这个层面上，全球治理需要政府（即国家），在国际协作和全球问题解决中发挥作用，也需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国际规则的构建和实施。因此，尽管主权国家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国际治理的主角，但是其在全球治理体系框架中的作用和效果也是有限的，而各个国际组织则突破初创时期的地域、领域的限制，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乃至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作用。鉴于国际组织满足了金融全球化的需求，其在全球金融治理当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且各国政府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在国际组织中协商来解决国际金融问题，因此本文选择国际组织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国际组织作为全球金融治理主体，并非否认主权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当中始终扮演核心角色，而是因为主权国家需要通过国际组织这样的平台才能更好地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作用。如果主权国家绕开国际组织来解决国际金融问题，这一行为就不属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范畴，因而也不是本文的研究范畴。

在明确了国际组织作为全球金融治理主体之后，我们还需要考察全球金融治理的主要内容，才能确定将哪些国际组织纳入考察对象。根据联合国训练与研究所的课程对全球金融治理的理解，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是维持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前者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预测和国际经济交易支付的便利，后者是有利于信贷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进而保护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投资利益（Bradlow，2009）。有学者认为，除了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还应包括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包括国际货币金融机构的改革，也包括全球金融治理与改革的决策主体改革，比如如何更好地发挥二十国集团（G20）的作用。还有学者指出，除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金融业监管和全球金融治理机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还应包括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及协调、区域金融合作、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张礼卿，2021）。本文认为，以上所述均可以看作是全球金融治理的主要内容。

在此基础上，本文筛选相应国际组织纳入分析框架。有学者指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WB）、一战后建立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七国集团（G7）所建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SF）以及在各地区建立的区域性开发银行，如泛美开发银行（IDB）、亚洲开发银行（AD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非洲开发银行（AfDB）等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金融组织体系，

并将上述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分为全球宏观稳定类、区域多边开发类、金融监管与标准制定三大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全球金融治理课题组，2016）。熊北辰（2021）则认为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国际组织还应该包括：欧洲金融稳定基金、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等。除此之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巴黎俱乐部（Paris FC）、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清迈协议（CMI）、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国际组织也常常被纳入分析框架（张庆麟、刘天姿，2012；Tsingou，2014；潘庆中等，2015；洪小芝，2012；张茉楠，2016）。

结合上述研究，本文选择以下正式或非正式国际组织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包括 IMF、WB、BIS、OECD、G20、FSB、Paris FC、IDB、AfDB、EBRD、欧洲投资银行（EIB）、ADB、AIIB 和 NDB，合计 14 家国际组织。

最后，本文将确定衡量与测算一个经济体全球金融竞争力的量化指标。国际组织是通过制定国际金融规则来开展全球金融治理的。如 Keohane（1988）所言，国际组织中的规则实际上反映了组织内事实上的各成员国之间的相对权力地位。因此，本文将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竞争力界定为其参与国际组织规则设定的相对权力，并进一步分析，这种相对权力的量化指标可以由经济体在国际组织中的份额与投票权来表示。

二、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指标构建

（一）一级指标选取

区别于以往研究根据全球治理内容对国际组织进行分类。本文根据全球金融治理的组织机制和层次进行分类，首先根据国际组织机制将全球层次分为正式国际组织和非正式协调平台，然后根据治理层次将正式国际组织分为全球层次国际组织和区域层次国际组织，最终将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分为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和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三个一级指标（具体分类详见表 1）。

表 1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	覆盖机构	数量
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国际清算银行（BI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4
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	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巴黎俱乐部（Paris FC）	3
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	美洲开发银行（IDB）、非洲开发银行（AfD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欧洲投资银行（EIB）、亚洲开发银行（A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	7

之所以先根据国际组织机制将全球金融治理分为正式国际组织和非正式协调平台两种类型，是参考 Donald 等（1982）对正式和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区分，即两种机制在建立依据和实施保障两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正式国际机制建立的依据是法律文件，因此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实施保障主要通过设置实体组织架构，比如 IMF、WB 都设有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这种实体部门以保障相关协议的落实；非正式机制则更多是依据成员国共识建立，即成员国之间共同追求的目标，协议的落实上

更多依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利益牵制，比如 G20 等。由此可以看出，在两种机制下各成员国达成一致意见的效力和保障一致意见实施的途径存在较大差异。

进一步根据层次对全球金融治理主体进行分类。主要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竞争和合作，没有哪个国家或机构可以控制或掌握充足的资源，进而有能力解决全球面临的所有问题。这是因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全球的、地区的或跨国的权威性规则塑造和执行多重层次体系（Held，2002）。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种行为体之间进行沟通和协商，共享各种资源和信息，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如果一个机构会员覆盖全球主要国家，那么在这个机构相关机制下形成的决策、意见、方针等文件，将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和推广；而区域性金融机构则主要在区域范围内发挥作用。

（二）二级指标选取

接下来需分析选择哪些指标来衡量经济体在上述 14 个国际组织中的竞争力（代表权和主导权）。以 IMF 为例，分析一国或地区竞争力的表现方式。一国或地区想获得 IMF 的会员（代表）资格，首先需要向 IMF 递交申请；董事局审议通过后，需要向管治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申请国的“会员资格决议”报告；在管治委员会接纳申请后，申请国签署入会文件才可以成为正式成员国。在管治委员会的“会员资格决议”报告中，会给出分配给申请国“配额”比例的建议，该“配额”则决定了成员国应付会费的规模，投票权、特别提款权（SDR）分配以及接受资金援助的份额。这表明会员份额是成员国在 IMF 的代表权和享受会员福利的份额，是衡量该成员国在 IMF 相对地位的指标。由此可以看出，会员份额可以作为衡量一国在 IMF 中代表权的指标。

在决策机制上，IMF 采取的是协商一致和投票表决两种议事规则，其中前者是 IMF 执行性董事广泛使用的规则，多在非正式会议上进行，后者则是在进行重大事项决议时采用，因此更能代表成员国在决策机制中的相对权力。投票表决机制包含加权投票制度和多数表决制度，前者表示成员国投票权由基本投票权和基于份额的投票权构成，后者则有助于重大决策的尽快产生。由此可以看出，投票权重可以作为衡量一国在 IMF 相对主导权的指标。因此，本文选择经济体在国际组织中的会员份额和投票权重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指数的二级指标。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构建方法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均来自 14 家国际组织的官网。具体指标构建方法如下。

第一步，标准化。单个指标均采用标准化值，单个指标标准化为 100，指标范围为 [0，100]。以投票权重为例，首先分别取所有样本国家投票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用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该指标的差；其次，用各国的权重比减去最小值，再除以差；最后，用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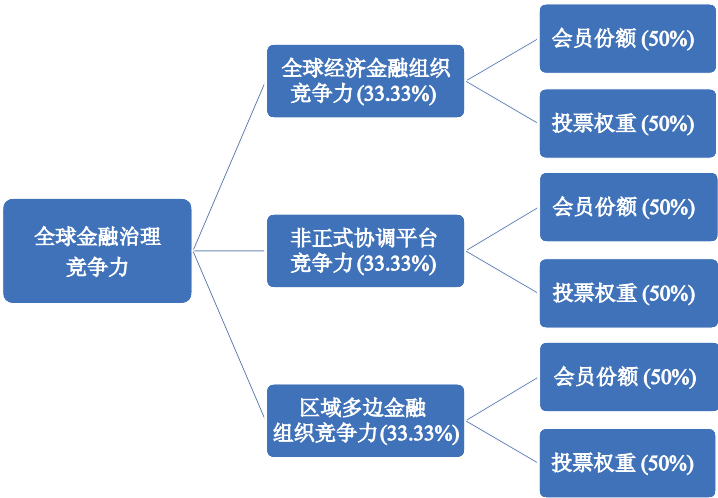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指标构建和权重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商乘以 100，就得到该指标指数值。具体见下面公式：

$$\overline{V_j} = 100 * (V_j - V_{min}) / (V_{max} - V_{min})$$

(1)

特殊数据处理过程如下，部分正式和非正式国际组织没有会员份额或投票权重数据，按照是否为会员平均权利。比如 AfDB 只有投票权重数据，没有会员份额数据，那么假定会员份额在会员间平均分配，会员国家取值 100，非会员国家取值 0。此外，还有部分正式或非正式国际组织既没有会员份额也没有投票权数据，使用认缴股份占比作为投票权重数据，会员份额按是否为会员平分。

第二步，一级指标构建。首先，会员份额指数和投票权重指数各自赋权 50%，得到单个机构或平台中样本国家的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其次，对每类机构中的单个机构或平台平均赋权，得到分类的竞争力指数。比如对 IMF、WB、BIS 和 OECD 平均赋权，得到全球金融组织竞争力；对 G20、FSB 和 Paris FC 平均赋权，得到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对 IDB、AfDB、EBRD、EIB、ADB、AIIB 和 NDB 平均赋权得到区域多边金融竞争力。需要

表 2 经济体列表

说明的是，本文没有按照以往文献做法，使用股本规模作为权重依据，而是对每类机构中的单个机构或平台平均赋权，是因为本文选择的国际组织，不但包括正式组织还包括一些非正式的协调平台，后者主要通过峰会或部长会议的方式推出公报或协议，目前还缺少股本数据。最后，对三个一级指标平均赋权，得到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指数（IFGC）。

序号	经济体	序号	经济体	序号	经济体
1	阿联酋	13	芬兰	25	墨西哥
2	阿根廷	14	法国	26	马耳他
3	澳大利亚	15	英国	27	荷兰
4	奥地利	16	希腊	28	葡萄牙
5	比利时	17	中国香港	29	俄罗斯
6	巴西	18	印度尼西亚	30	沙特阿拉伯
7	加拿大	19	印度	31	新加坡
8	瑞士	20	爱尔兰	32	土耳其
9	中国大陆	21	意大利	33	美国
10	塞浦路斯	22	日本	34	南非
11	德国	23	韩国		
12	西班牙	24	卢森堡		

（四）样本国家构成

本文选取了 34 个经济体作为评级样本（见表 2），范围涉及 G20 成员国、金砖国家、欧元区成员国等经济体，包含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少数经济体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三、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跨国对比

根据前文指标构建方法，本文测算了主要经济体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具体排名以及一级指标排名情况分析如下。

（一）总指标排名情况

表 3 给出了主要经济体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指数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在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中占据绝对优势。其中，最具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的美国，指数高达 85.1 分，超出第二名德国 12.1 分，这是所有相邻国家分值差距的最大值。在排名前 10 的国家中，发达国家获得 8 个席位，其中 G7 国家正好占据了全球前 7 名。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未获得与其相符的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在排名前 10 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大陆和巴西两个发展中国家，且排名仅为第 9 位和第 10 位。

该排名显示出美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仍具有最强的竞争力和主导性话语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整体上占据强势地位；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则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表明，美国可以在现有国际组织框架内表达自己的诉求，实现其所关注的自身金融利益，同时还可以利用相关规则与机制约束竞争对手，以确保自身的主导权。

进一步，本文根据会员份额和投票权重两个二级指标，分别对主要经济体进行全球金融竞争力排名（详见表 4 和表 5），以考察两个指标各自对排名的影响。从指数计算和排名结果可以看出，各国在两个二级指标的排名与其总指标排名差距不大。比如总指标排名第 2 的德国，会员份额指数以 69.9 排名第 3，投票权重指数以 76.1 排名第 2；总指标中排名第 9 的中国大陆，会员份额指数以 57.3 排名第 9，投票权重指数以 58 排名第 10。这表明，会员份额与投票权重两个指标对主要经济体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排序差异的影响较小。对于中国而言，需要从三个一级指标（即全球经济金融组织、非正式协调平台和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的对比分析中，找到进一步提升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的对策。

（二）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排名情况

表 6 给出了一级指标中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的排名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这个一级指标中，发达国家的竞争力更为突出。其中，美国排名第一，指

表 3 主要经济体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排名

排名	经济体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分值	排名	经济体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分值
1	美国	85.1	18	土耳其	39.5
2	德国	73.0	19	比利时	38.9
3	日本	72.5	20	阿根廷	38.8
4	法国	69.5	21	奥地利	37.8
5	意大利	67.5	22	芬兰	37.1
6	英国	64.1	23	沙特阿拉伯	35.8
7	加拿大	62.2	24	印度尼西亚	33.8
8	韩国	60.3	25	南非	31.4
9	中国大陆	57.7	26	爱尔兰	29.6
10	巴西	55.9	27	葡萄牙	25.5
11	俄罗斯	53.5	28	新加坡	20.2
12	澳大利亚	52.9	29	希腊	15.6
13	西班牙	52.2	30	卢森堡	12.0
14	荷兰	50.8	31	中国香港	11.5
15	瑞士	47.3	32	塞浦路斯	4.9
16	印度	46.4	33	马耳他	4.8
17	墨西哥	44.2	34	阿联酋	0.6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表 4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二级指标排名：依据会员份额的排名

排名	经济体	会员份额指数	排名	经济体	会员份额指数
1	美国	85.7	18	墨西哥	38.2
2	日本	70.8	19	沙特阿拉伯	38.1
3	德国	69.9	20	印度尼西亚	33.7
4	法国	67.4	21	比利时	33.6
5	意大利	65.4	22	土耳其	33.6
6	英国	62.6	23	南非	32.4
7	加拿大	58.5	24	奥地利	32.3
8	巴西	58.1	25	芬兰	31.1
9	中国大陆	57.3	26	爱尔兰	25.5
10	韩国	56.8	27	新加坡	20.1
11	俄罗斯	52.0	28	葡萄牙	19.2
12	西班牙	48.1	29	中国香港	11.4
13	澳大利亚	47.1	30	希腊	9.4
14	印度	46.2	31	卢森堡	5.5
15	荷兰	45.4	32	阿联酋	0.5
16	瑞士	43.6	33	塞浦路斯	0.2
17	阿根廷	40.9	34	马耳他	0.1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数得分为 100 分，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的绝对竞争力和强大话语权。以中国大陆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维度的排名仅为第 15 位和第 22 位。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以 44.31 的分数位居第 10 名，不仅高于中国大陆，还高于作为传统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墨西哥高于中国大陆，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四大全球经济金融组织中，只位列三席；墨西哥高于澳大利亚，是因为尽管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相对持平，但是墨西哥对外贸易和国际储备的规模均高于澳大利亚，而这三项是全球金融组织分配份额和投票权的主要依据，因此墨西哥的排名略高于澳大利亚。

从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这个维度上来看，全球金融治理从霸权模式走向多边主义模式步履缓慢。这也表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一系列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进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正式全球经济金融组织中话语权的提升十分有限。以 IMF 为例，2008 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凭借较高的经济增速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这必然要求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IMF 中的会员份额和投票权重，但是改革的进程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通过对比 2020 年与 2010 年 IMF 会员份额和投票权重的变化就可以发现，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会员份额和投票权重有所提升，但是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竞争力仍然得到了维护。具体来说，中国大陆的会员份额从

表 5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二级指标排名：依据投票权重的排名

排名	经济体	投票权重指数	排名	经济体	投票权重指数
1	美国	84.5	18	土耳其	45.4
2	德国	76.1	19	比利时	44.1
3	日本	74.2	20	奥地利	43.4
4	法国	71.7	21	芬兰	43.1
5	意大利	69.5	22	阿根廷	36.8
6	加拿大	66.0	23	印度尼西亚	33.8
7	英国	65.7	24	爱尔兰	33.8
8	韩国	63.7	25	沙特阿拉伯	33.5
9	澳大利亚	58.6	26	葡萄牙	31.7
10	中国大陆	58.0	27	南非	30.4
11	西班牙	56.2	28	希腊	21.8
12	荷兰	56.2	29	新加坡	20.3
13	俄罗斯	54.9	30	卢森堡	18.4
14	巴西	53.6	31	中国香港	11.5
15	瑞士	50.9	32	塞浦路斯	9.6
16	墨西哥	50.1	33	马耳他	9.6
17	印度	46.5	34	阿联酋	0.6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表 6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一级指标排名：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

排名	经济体	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分值	排名	经济体	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分值
1	美国	100.0	18	爱尔兰	39.9
2	日本	64.3	19	芬兰	39.8
3	德国	56.6	20	葡萄牙	39.4
4	英国	52.8	21	希腊	39.2
5	法国	52.7	22	印度	33.6
6	意大利	48.5	23	俄罗斯	33.0
7	加拿大	47.3	24	沙特阿拉伯	32.1
8	西班牙	45.2	25	巴西	31.6
9	韩国	44.6	26	印度尼西亚	27.9
10	墨西哥	44.3	27	阿根廷	27.6
11	荷兰	43.9	28	新加坡	26.6
12	澳大利亚	43.5	29	卢森堡	13.6
13	比利时	42.9	30	南非	2.1
14	瑞士	42.8	31	阿联酋	1.1
15	中国大陆	42.2	32	塞浦路斯	0.3
16	土耳其	42.0	33	马耳他	0.2
17	奥地利	40.8	34	中国香港	0.0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3.72% 上升至 6.41%，投票权重从 3.65% 提升至 6.08%；同样，日本的会员份额也从 6.12% 上升至 6.48%，投票权重从 6.01% 上升至 6.12%；美国会员份额从 17.09 上升至 17.51%，尽管投票权重从 16.74% 略下降至 16.51%，但是这并未改变“一票否决权”（即超过 85% 投票权）制度下美国的绝对竞争力。

通过上文对会员份额与投票权两项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性金融组织在这两个指标的设计上是比较精细的。以 IMF 为例，其实施的是加权投票制度，其中基本投票权在成员国之间平均分配，而基于份额的投票权是根据一国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开放度、波动性等多种因素确定的，大致是与一国经济实力挂钩。随着 IMF 增资和成员数量的增加，基本投票权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基于份额投票权的重要性逐步上升。这也部分解释了前文提到的主要经济体二级指标排名和总指标排名差异较小的原因，即主要经济体在会员份额和投票权重两项指标上的排名具有较高相关性。

（三）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排名情况

表 7 给出了一级指标中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的排名情况。从表 7 可以看出，主要经济体竞争力排名相对平均，主要发达国家在第一档；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分化，其中金砖国家的巴西和俄罗斯，率先在非正式协调平台中获得同发达国家相持平的竞争力，而同为金砖国家的大陆和印度，则居于第二档。中国大陆和印度位居第二档的主要原因是两国都不是 Paris FC 的永久会员，只是特别参与者。

与前文所述全球性经济金融组织相比，非正式协调平台既不要求成员国出资，也没有投票权的安排，其治理过程更多依据成员国经协商后达成的共识。这意味着，在非正式协调平台上，各经济体具有相对平等的话语权。同时，这也反映出一个经济体在非正式协调平台治理竞争力的高低，

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经济体加入非正式协调平台的数量，即加入就有话语权，未加入就没有话语权。

总体来说，相比全球金融组织竞争力，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受强国霸权影响较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多元治理的公平性和非正式机制的灵活性。在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出现较大不确定时，各国参与国际协作过程中，为确保出现不利于自身利益情形下可以修改协议，甚至退出合作机制，通常会选择非正式国际机制（Lipson，1991）。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 这种非正式性质的灵活性机制

表 7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一级指标排名：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

排名	经济体	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分值	排名	经济体	非正式协调平台竞争力分值
1	澳大利亚	100.0	12	沙特阿拉伯	66.7
1	巴西	100.0	12	南非	66.7
1	加拿大	100.0	12	西班牙	66.7
1	法国	100.0	12	瑞士	66.7
1	德国	100.0	12	土耳其	66.7
1	意大利	100.0	23	奥地利	33.3
1	日本	100.0	23	比利时	33.3
1	韩国	100.0	23	芬兰	33.3
1	俄罗斯	100.0	23	中国香港	33.3
1	英国	100.0	23	爱尔兰	33.3
1	美国	100.0	23	新加坡	33.3
12	阿根廷	66.7	29	塞浦路斯	0.0
12	中国大陆	66.7	30	希腊	0.0
12	印度	66.7	31	卢森堡	0.0
12	印度尼西亚	66.7	32	马耳他	0.0
12	墨西哥	66.7	33	葡萄牙	0.0
12	荷兰	66.7	34	阿联酋	0.0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也为后续正式机制形成提供了时间窗口。可以说，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机制大多数为发达国家主导，少数共治性机制难以融合南北共同利益。在这个层面上，G20 作为国家领导人平等对话的最高机制，能较好地兼顾协商效率和南北共治，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重大突破。它体现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从霸权模式向多边模式的尝试，也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及提升话语权提供了平台与渠道。自 2013 年起，在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中国大陆的地位及影响力稳步提升，推动 G20 将更多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合作领域。

G20 机制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对竞争力得以扩大进而提升，但是受限于自身组织机构设置，G20 在主导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决策和执行效率都比较低。主要表现为：历届峰会主办方都致力于在多边主义下共同达成一致目标，抑制政治和经贸纷争，避免争议性议题，同时在行动上鲜有突破。这一方面是因为，G20 作为非正式协作机制，没有法律文件作为设立基础，达成的国际协议难以形成较强的法律约束力，各届峰会所通过的公报等文件只能依靠各国自觉来完成；再加上缺乏实体常设的执行机构，所达成的国际协议很难落实到位（刘宏松，2015）。另一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仍主导着 G20 的运作，为扩大其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领导权，对 G20 的转型态度十分消极，与新兴国家协调时的姿态渐趋强硬，后者短期难以改变其次要地位。此外，受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加剧的负面冲击，全球对 G20 峰会议程的关注，远不及对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关注。

（四）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排名情况

表 8 给出了一级指标中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的排名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这个二级指标中，发展中国家的排名显著提升。在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中，中国大陆得分为 64.2 位居第 1，略高于排名第 2 的德国；在全球经济金融组织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美国，得分 55.3 位居第 4；同样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和印度的排名也从全球经济金融组织竞争力中的第 22 和 25 跃升至第 13 和 17。

在全球层面的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举步维艰，短期难以获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新兴国家纷纷转向区域层面的改革，以期通过区域层面的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加速或倒逼全球层面的改革。可以说，加大区域金融合作成为当前发展中国家推动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次优选择。从这个维度来

表 8 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一级指标排名：区域多边金融竞争力

排名	经济体	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分值	排名	经济体	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竞争力分值
1	中国大陆	64.2	18	瑞士	32.5
2	德国	62.4	19	俄罗斯	27.5
3	法国	55.9	20	南非	25.4
4	美国	55.3	21	卢森堡	22.3
5	意大利	54.0	22	阿根廷	22.3
6	日本	53.3	23	墨西哥	21.5
7	西班牙	44.6	24	爱尔兰	15.7
8	荷兰	41.8	25	澳大利亚	15.1
9	比利时	40.5	26	塞浦路斯	14.5
10	英国	39.6	27	马耳他	14.4
11	加拿大	39.5	28	土耳其	9.7
12	奥地利	39.5	29	沙特阿拉伯	8.6
13	印度	38.8	30	希腊	7.6
14	芬兰	38.2	31	印度尼西亚	6.8
15	葡萄牙	37.1	32	中国香港	1.1
16	韩国	36.2	33	新加坡	0.6
17	巴西	36.0	34	阿联酋	0.6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而得。

看，中国大陆已经在区域多边治理中承担了与自身相匹配的责任，也在区域多边合作中拥有了较大的影响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某些全球层面的国际组织因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而面临领导力真空、经费紧张、规则破坏的境况，这导致全球治理赤字不断上升。然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全球金融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有增无减。在全球层面国际金融组织和机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必须要增强区域国际组织活力。区域组织内的成员国往往因地缘相近、文化相亲、经济互补、利益相关等因素而具备提高合作层级的可能性。未来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速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公共产品的创新和供给以满足局部需求，并通过区域多边金融合作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是中国大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自身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的关键。

四、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提升：中国的策略选择

一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全球金融治理走向真正的多边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一治理理念符合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风险上升需要各经济体集体合作的现实，适应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引入新理念、新机制、新力量的需求，为疫情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该理念强调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不能由少数国家垄断，而是由世界各国所共享（刘世强，2017）。对此，中国应在国际合作中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理念，强调各种规则和制度应建立在各国协商共识的基础上，避免国内金融政策溢出侵害其他经济体利益，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让全球金融治理实现共赢共享，真正走向多边主义。

二是积极参与区域多边合作，让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在 IMF 等全球层面国际组织功能等逐步弱化时，中国应致力于创新推出区域层面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承担起大国责任。目前，中国已经在区域开发金融领域主导创建了 AIIB、NDB，在区域经济金融合作领域创建了“丝路基金”和“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从中获得制度性话语权的新机制（刘力臻，2020）。未来应积极推动 AIIB、NDB 等区域多边金融组织的扩容和发展，让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是推动 G20 机制化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全球治理体系功能。提升 G20 的作用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必然选择，其中推动 G20 机制化转型是核心。目前，G20 有财政部长会议、中央银行行长会议、领导人峰会和 G20 全球金融治理名人小组，但是缺少实体治理机构，严重制约其职能的发挥。因此，中国应积极推动 G20 机制化转型，通过推动体系改革实现金融治理体系职能完善。

四是积极加入有影响力的非正式协调平台，比如 Paris FC。非正式协调平台兼具多元化治理和非正式机制的特点，成为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背景下缓解全球金融治理赤字的有效路径之一。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债务问题激增；巨额的政府债务存量下，各国政府之间并没有集体行动解决条款，使得全球债务问题已恶化成“海啸”（Kose et al., 2021）。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债权国，中国可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加入 Paris FC，通过积极参与制定全球债务处理的规则与条款，维护自身的债权国利益，提升全球金融治理竞争力。

五是积极寻找与美国协商合作的结合点，共同推进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即使美国在其主导和建立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下与中国开展竞争，中美亦能找到很多协商合作的机会，从而在全球金

融治理框架下建立可预期、可管理的竞合关系。中美都可以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展现大国应有的担当，共同推进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5 年第 3 期。
2. 张礼卿：《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八个问题》，《中国外汇》，2021 年第 4 期。
3.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全球金融治理课题组：《全球金融治理：挑战，目标和改革——关于 2016 年 G20 峰会议题的研究报告》，《国际经济评论》，2016 年第 3 期。
4. 熊北辰：《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学习时报》，2021 年 1 月。
5. 张庆麟、刘天姿：《全球金融治理若干凸显问题综述》，《金融法学家（第四辑）》，2012 年。
6. 潘庆中、李稻葵、冯明：《“新开发银行”新在何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背景、意义与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2 期。
7. 洪小芝：《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文献综述》，《西南金融》，2012 年第 3 期。
8. 张茉楠：《AIIB 影响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的三个维度》，《金融博览》，2016 年第 2 期。
9. 刘宏松：《G20 议题的扩展及其对机制有效性的影响》，《国际论坛》，2015 年第 3 期。
10. 刘世强：《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与能力建设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 年第 2 期。
11. 刘力臻：《全球金融治理的困境，变革及中国参与方式》，《社会科学战线》，2020 年第 11 期。
12.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5 期。
13. 李巍著：《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14. Rosenau J N.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Lynn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15. Daniel Bradlow. Materials for A 4 – Part On – Line Course o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Offered by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on Training and Research (UNITAR), UNITAR, On – Line Training Courses in Public Finance and Trade, 2009.
16. Tsingou E. The Club Rules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85, No, 4, 2014.
17. Keohane R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2, 1988.
18. Donald, J, Puchala, et al.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 36 (2).
19. Held D.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Polity Press, 2002.
20. Charles Lipson, Why are Som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1991.
21. Kose, A., Nagle, P., Mason, A. & Sugawara, N. What Has Been the Impact of COVID – 19 on Debt? Turning a Wave into a Tsunami,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s, No. 9871, 2021.

责任编辑：李蕊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数字贸易的中介效应分析

杨鸿岳

摘要：自 2017 年美国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美贸易摩擦，且矛头直指中国高科技产业，以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此轮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倒逼了中国企业出口转型升级。本文选择 2016—2021 年季度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考察了数字贸易发展的中介效应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实证发现，中美贸易摩擦显著改变了中国出口的技术、国别和产品结构；数字贸易发展承担着中介角色，即中美贸易摩擦倒逼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数字贸易发展有利地提升了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及降低了对美依存度，从而助推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中美贸易摩擦与出口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以数字贸易发展为突破口稳外贸，促进出口升级提供了策略依据。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 出口结构升级 数字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

作者简介：杨鸿岳，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文献回顾

2017 年美国针对中国贸然发起“301”调查，拉开了中美新一轮贸易摩擦的序幕。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其对中国贸易和产业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贸易方面，研究普遍得出贸易摩擦损害了中美贸易的结论。Rosyadi & Widodo (2018) 基于 GTAP 模型研究发现美国贸易制裁措施对两国经济、贸易和福利都有破坏效应。李春顶 (2018) 构建了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模拟得出中美贸易摩擦对两个国家都有损害，且中国受损更大。詹宇鹏 (2019) 分析得到中美贸易摩擦显著抑制了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但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未产生明显的影响。谢建国等 (2021) 发现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存在“倒 U”型影响，在贸易冲突初期存在“抢出口”效应。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 2025》领域的出口产生了较严重的冲击 (张大海等, 2021)。在产业结构方面，则得出贸易摩擦既有可能倒逼国内产业升级，也可能抑制产业升级的结论。王云胜等 (2020) 指出要借助贸易摩擦契机增强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将贸易摩擦转化为拉动中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新动能。史长宽 (2019) 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能从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优胜劣汰、降

低对美贸易依存度等多个层面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此外，少数学者也关注了中美贸易摩擦下国内企业如何应对的问题。例如，美国发起的贸易制裁主要针对的是高科技产品，这是否会推动企业加大自主创新，进而推动出口商品升级？美国对大多数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后，是否会倒逼中国企业转向欧洲、亚洲国家出口？对于第一个问题，魏浩等（2019）采用 2000—2017 年的数据得出，中美贸易摩擦下的美国进口竞争冲击倒逼中国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产生了“逃离竞争效应”。颢孙书勤（2020）基于 2008—2017 年的企业微观数据发现，中美贸易模型短期内抑制了企业创新能力，但长期能激发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动力。李昊洋等（2021）利用 2010—2018 年的微观数据，发现出口贸易摩擦显著降低了企业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且在高海外收入比例和高科技制造企业中更为突出。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谢建国等（2021）在研究中美贸易冲突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同时，间接观察了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与其他几个主要贸易国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发现第三国贸易转移效应显著。杨成玉（2020）分析发现欧盟在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承接了部分中美贸易份额，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外贸压力。

文献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产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方向基础。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尚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学者主要侧重于从中美贸易、中国贸易以及产业结构转型、企业创新等角度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和创新效应，却未从出口转型的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后期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是否倒逼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二是未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产业结构、企业创新的路径机制以及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三是除了少数几篇探讨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影响的文献外，其余文献采用的是 2018 年及以前的数据，很难准确反馈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真正影响后果。综合以上分析，为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将选取 2016—2021 年季度频率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出口技术结构、国别结构和产品结构三个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数字贸易的中介效应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在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下如何稳外贸，促进出口升级提供策略依据，也为新时期中国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如何生存与转型、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冲击提供了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中美贸易摩擦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

2017 年以来美国单方面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给中国制造业重重一击，特别是一些被美国列入加征关税清单中的商品。由于国内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众多，而国外客户有限，导致部分制造业企业难以维持，这也让众多企业家认识到了创新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性。一方面，美国此次加征关税主要针对《中国制造 2025》中的高科技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航空、新材料等，但《中国制造 2025》是中国政府部署实施的全面推进制造强国的战略文件，因此中美贸易争端反而会催逼中国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另一方面，尽管中低端制造业尚未被此轮中美贸易摩擦波及，但同样使企业家的危机感加剧，加上近几年外资不断转向东南亚等劳动力廉价地区，中低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也迫使企业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以维持全球的竞争力。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尽管未对大多数中国制造品产生重要冲击，但已让企业家有了危机意识，增强了其研发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国内产品技术升级。

在中美贸易摩擦呈现持续性、复杂性以及中美历次谈判并无实质性改善后，为了稳定外贸局势，中国政府也力促企业向其他国家扩大出口，出台了稳外贸的相关举措。孙立行（2019）指出中美贸易

摩擦持续升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中国应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是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有效手段。此外，欧盟的产业及消费结构与美国相近，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通信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电气机械设备、服装鞋类等商品具有较好的替代效应，且欧盟对中国商品依赖性较强，在中美贸易摩擦下具备贸易替代条件（杨成玉，2020）。事实上，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的现状下，中国对全球的出口额不减反增，也间接表明了中国企业已在逐步实施转变贸易区域结构、减少对美依赖度的行为。关税争端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全球化，说明中国有可能加速调整贸易区域结构（鞠建东等，2021）。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是美国通过关税和非惩罚性关税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崛起（王云胜等，2020）。因此直接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会降低中国高科技产品向美国出口（刘薇等，2019）；同时中国高科技产品的众多关键零部件、新材料（数控机床、机器人控制系统、减速器等）本身由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进口（满岩，2020），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材料、零部件的出口被限制，导致中国向外部输出的高科技产品规模下降。与此同时，尽管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都意识到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但诸如芯片、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品从设计到研发，再到生产的周期非常长，对美国依存度较高，短期内无法实现国产替代，因此中美关系的短期恶化可能会导致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梁明（2019）通过对两国在2018—2019年上半年的贸易数据分析，发现美国的关税措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影响非常明显。柴利等（2020）分析指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且在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但是在中美贸易冲突后贸易增速递减。由此可见，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冲击，进而降低了高科技产品出口，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分工高端地位攀升。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技术结构）存在正影响。

H1b：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非美国比重（国别结构）存在正影响（或者说对出口美国依存度存在负影响）。

H1c：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高科技商品出口比重（产品结构）存在负影响。

（二）数字贸易的中介效应分析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及对外贸易依赖于“加工型贸易”，其贸易模式存在以下缺点：一是利润水平较低，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可替代性极强；二是产业模式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低水平、高污染、高能耗，长期看对经济转型和降低贸易依赖存在一定的桎梏。基于此中国提出了“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战略方针，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也不断促进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企业通过将数字技术融合到生产、销售、研发等环节中，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产品创新和竞争力，形成了显著的产业结构升级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无论是传统制造业企业，还是高科技企业都更加重视技术创新，促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加征关税等贸易摩擦实质上是将贸易成本转嫁给卖方企业，中国制造业利润空间小，此时如果企业不想流失客户且维持原有利润空间，就必须开发出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使客户自愿承担由商品质量提升带来的价格溢出（王玉，2021），而数字技术为企业产品升级提供了动能；另一方面，部分对美依赖度较高的外贸型企业为了生存只能转向贸易摩擦相对低的国家，数字技术有利于企业快速、精准地匹配新客户（孙杰，2020），稳定企业出口并优化出口的区域结构。这些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出口企业存在倒逼机制，使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更加注重数字化创新，以减少贸

易摩擦的负影响，而企业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开发，促进了各地区的出口结构和技术升级。姚战琪（2021）分析发现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提高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余姗等（2021）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产生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助推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数字贸易很可能在贸易摩擦与出口质量之间起到了中介角色，现实也表明过去几年中美贸易摩擦期正是中国数字技术快速发展阶段。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中美贸易摩擦激发了数字贸易发展，促进中国出口结构升级。

（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机制

当前，中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面对经济形势的持续变化，中国不断调整经济政策，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邓江花等（2021）、王红和李克（2021）研究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抑制作用。席艳乐等（2019）分析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的增加会显著抑制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刘啟仁等（2020）分析表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越会对出口技术水平产生抑制作用。由此可得如下假设：

H3：中美贸易摩擦对地区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受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具体影响机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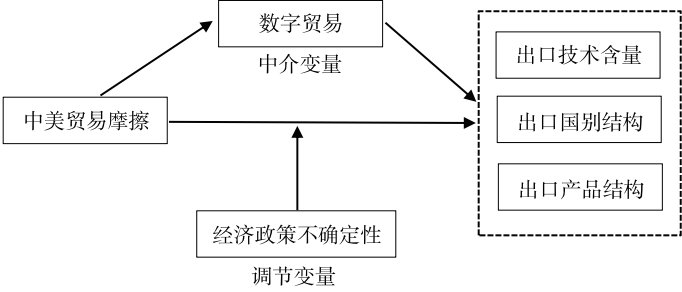


图 1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选取

（一）样本与数据

目前对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经贸效应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数据：一是年度数据，但是这类数据难以准确评估贸易摩擦的影响；二是月度数据，这类数据适用于观测中美贸易摩擦对贸易的影响，但其他指标缺乏如此高频数据限制了研究的延伸性。综合考虑后，本文选择季度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时期范围为 2016 年第 1 季度至 2021 年第 4 季度。在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划分上，通过计算各个省份的出口依存度来划分地区开放性，如果 2017 年（中美贸易摩擦前）对美出口依存度高于 10% 则定义为开放型地区，^① 反之为非开放型地区。本文所选取的经济指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的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于《南华早报》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EPU）指数，^②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来源于财新智库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

①共包括 11 个开放型地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天津、重庆、北京、山东、辽宁、江西。

②数据来源：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scmp_monthly.html。

（二）模型构建

考虑到中国省际间地区开放度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依存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①同时由于地区产品结构的差异性，中美贸易摩擦对开放型地区出口升级的影响可能强于非开放型地区。为此以开放型地区作为考察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开放型地区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

$$UES_{it}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treat \times after)_{it} + \sum_j \gamma_j \times X_{j,it} + \delt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UES_{it} 是 i 地区 t 时期的出口结构升级，包括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国别结构和产品结构。 $treat$ 为分组虚拟变量，若为开放型地区取值为 1，若为对照组非开放型地区取值为 0； $after$ 为事件虚拟变量，2018 年 3 月底美国宣布拟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于 4 月 4 日发布了涉及 500 亿美元的商品进口惩罚关税清单，中国也在当日做出了反制措施，由此两国贸易摩擦正式升级。本文以该事件确立中美贸易摩擦的时间点，在 2018 年 4 月以前取值为 0，2018 年 4 月及以后取值为 1。 X_j 表示方程的第 j 个控制变量。

为检验数字贸易发展的中介效应，建立如下模型：

$$DEI_{it}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treat \times after)_{it} + \sum_j \gamma_j \times X_{j,it} + \delt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UES_{it} = \beta_0 + \beta_1 \times DEI_{it} + \sum_j \gamma_j \times X_{j,it} + \delt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DEI 是数字贸易指数，如果方程（2）中的 α_1 、方程（3）中的 β_1 同时显著且符号相同，则说明数字贸易在中美贸易摩擦与出口结构升级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建立如下模型：

$$UES_{it} = \alpha_0 + \alpha_1 \times (treat \times after)_{it} + \lambda \times (treat \times after \times EPU)_{it} + \sum_j \gamma_j \times X_{j,it} + \delt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EPU 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果方程（4）中的 λ 显著，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美贸易摩擦与出口结构升级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三）变量定义

1. 出口结构升级。本文的省级地区出口结构升级包括了三个维度：出口技术结构升级、国别结构升级和产品结构升级。其中，出口技术结构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具体基于 Hausmann et al. (2007) 的方法测算：

$$PRODY_q = \sum_p \frac{x_{pq}/X_p}{\sum_c x_{pq}/X_p} Y_p \quad (5)$$

其中 $PRODY_q$ 是《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6 位码）商品 q 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p 是省份， x_{pq} 表示 p 省份 q 商品的出口额， X_c 表示 p 省份的总出口额， Y_q 表示 p 省份的经 HP 滤波调整后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在得到各商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后，再计算省份工业制造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PRODY_c = \sum_q \frac{x_{cq}}{X_c} \times PRODY_q \quad (6)$$

式（6）中 $\frac{x_{cq}}{X_c}$ 表示 c 省份 q 产品出口额占该省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本文将国际贸易商品编码中的第 16 章至第 96 章确定为工业制造业产成品。

^①经测算，2020 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存度为 26.1%，西部地区的出口依存度为 8.0%。

出口国别结构以工业制造业产成品中非美国的比重衡量，即出口到非美国国家占地区总出口额的比重。

出口产品结构以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衡量，即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地区总出口额的比重。对于高技术产品的划分，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二次修订版的出口技术分类,^① 通过 HS 编码转为 SITC 编码的得到。

2. 数字贸易。本文以财新智库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作为数字贸易指标。相对于现有学者从互联网普及率、电信业务总量、信息通信行业从业人员数量等角度构建指标体系测量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财新智库的测度更加全面，能准确反映各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考虑到该指标为年度数据，本文采用如下方法转化为季度数据：首先，计算 2016 年数字经济指数相对于 2015 年的季度增长率（ $(2016DEI/2015DEI)^{(1/4)}$ ）；其次，以此增长率乘以 2015 年 DEI 得到 2016Q1DEI，以 $2016Q1DEI * \text{该增长率}$ 得到 2016Q2DEI，依次计算 2016 年后面两个季度的数字经济指数；最后依此类推计算得到各省 2017—2021 年每个季度的数字经济指数。

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参考现有文献，采用 Baker et al.（2016）根据《南华早报》中统计的关键词数量占当月文章总数量的比重得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该指标的原始数据为月度数据，在月度计算上求和得到季度数据。该指标对全部省份取值相等。

4. 控制变量。选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创新能力、政府财政支出、实际利用外资 4 个变量，其中人均生产总值本身为季度数据，而其他三个变量为年度数据。考虑到财政、创新都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性较高，因此本文以地区生产总值的季度比例来计算当年每个季度的创新能力、财政支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衡量指标
因变量	出口技术含量	EXPY	基于 Hausmann 算法得到
	出口国别结构	EXregion	1 - 出口美国贸易额除以总出口贸易额
	出口产品结构	EXtech	高科技产品出口额除以总出口贸易额
自变量	对照组	treat	2017 年对外出口开放度超过 10% 的省份取 1，其余取 0
	时期	after	2016 年 1 季度到 2018 年 1 季度取 0，2018 年 2 季度至 2021 年 4 季度取 1
中介变量	数字贸易	DEI	财新智库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并转化为季度数据
调节变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EPU	Baker et al.（2016）计算的中国每月 EPU 指数的季度加和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人均生产总值
	创新能力	patent	专利申请数量
	政府支出	finance	科技与教育财政支出比例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实际利用外资额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统计描述

表 2 显示研究期间全部地区的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均值为 15575，其中开放型地区高于非开放型

^①SITC 编码下的高技术产品包括：524、54、712、716、718、75、761、764、77（不含 772、773 和 775）、792、871、874、881。

地区，中美贸易摩擦后高于中美贸易摩擦前。出口非美国比重均值为 86.2%，其中非开放型地区（88.1%）显著高于开放型地区（82.6%），说明开放型地区对美依存度更高，在中美贸易摩擦前后差异并不明显。出口高科技产品比重均值为 29.8%，其中开放型地区高于非开放型地区，中美贸易摩擦前高于中美摩擦后。数字贸易均值为 0.380，其中开放型地区高于非开放型地区，中美贸易摩擦后高于中美贸易摩擦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均值为 1455，中美贸易摩擦后显著高于中美贸易摩擦前，说明在中美出现贸易摩擦后，为减少贸易摩擦的负冲击，频繁出台的相关政策具有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整体	非开放型地区	开放型地区	中美贸易摩擦前	中美贸易摩擦后
EXPY	15575.080	14732.540	17106.960	14132.010	17280.530
EXregion	0.862	0.881	0.826	0.860	0.864
EXtech	0.298	0.285	0.322	0.311	0.287
EDI	0.380	0.297	0.530	0.300	0.473
EPU	1455.096	1455.096	1455.096	884.630	2129.284
pgdp	15575.080	11970.590	22128.690	14132.010	17280.530
patent	28953.870	13014.710	57934.170	25586.470	32933.530
finance	0.179	0.169	0.197	0.180	0.178
fdi	20.482	12.681	34.668	20.314	20.683
N	744	480	264	403	341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

表 3 列示了方程（1）的估计结果，可见前两列中双重差分变量 $treat \times after$ 显著大于 0，说明中美贸易摩擦能显著促进出口开放型地区的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出口非美国比重，即中美贸易摩擦倒逼了出口商品提高技术含量并降低了对美依存度。最后一列的双重差分变量 $treat \times after$ 显著小于 0，说明中美贸易摩擦将显著降低开放型地区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比重。控制变量中，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降低出口对美依存度和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出口技术复杂度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但会增加对美依存度；科教财政支出比重能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对对美依存度不存在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	EXPY	EXregion	EXtech
treat × after	0.127***	0.012***	-0.019**
	(0.013)	(0.004)	(0.008)
lnpgdp	0.872***	0.030***	0.100***
	(0.026)	(0.010)	(0.018)
lnpatent	0.087***	-0.026***	0.028***
	(0.010)	(0.004)	(0.008)
finance	3.256***	0.072	0.836***
	(0.377)	(0.152)	(0.280)
fdi	-0.004***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constant	-6.970***	0.837***	-0.764***
	(0.234)	(0.088)	(0.160)
地区控制	YES	YES	YES
时期控制	YES	YES	YES
估计方法	RE	RE	RE
N	744	744	744

注：（1）*、**、***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概率水平下统计显著，下同；（2）考虑到数量级差异，在回归时将 EXPY 变量除以 10000 处理，同时对人均生产总值、专利申请数量取对数处理。

显著影响。表 3 结果表明假设 H1 中的三个假设均成立，中美贸易摩擦增加出口商品的整体技术含量，同时倒逼了开放型地区增加向其他国家出口，但也受制于美国贸易制裁而减少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对上述结果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稳健性检验。借鉴范夏阳等（2022）建立如下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UES_{it} = \alpha_0 + \sum_{s=-13}^{10} \beta_s \times d_s + \sum_j \gamma_j \times X_{j,it} + \delt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tag{7}$$

其中 d_s 为虚拟变量，当季度观测值取 1，其他季度观测值为 0。对方程（7）进行估计，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前（政策实施前）的虚拟变量系数（ β_{-13} 到 β_{-1} ）不显著为 0（即系数不显著），那么可以认为通过平行趋势检验。表 4 结果显示，三个因变量下中美贸易摩擦前的虚拟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中美贸易摩擦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中美贸易摩擦后，d1 变量均显著，说明中美贸易摩擦显著改变了中国出口形势，因此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通过虚构处理组，针对不同的样本随机选取 500 次相同数量的处理组商品作为虚构处理组进行回归。模拟结果如图 2 所示。可见当因变量为出口技术复杂度时，估计系数 p 值的核密度分布最高值与 0.12 非常接近；当因变量为出口国别结构时，估计系数 p 值的核密度分布最高值与 0.012 非常接近；当因变量为出口商品结构时，估计系数 p 值的核密度分布最高值与 -0.19 非常接近。由此可见，在随机筛选样本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依然稳健，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表 4 平行趋势检验

因变量	EXPY	EXregion	EXtech
列	(1)	(2)	(3)
d_ 13	- 0. 029	0. 004	0. 049
	(0. 048)	(0. 010)	(0. 032)
d_ 12	- 0. 023	- 0. 004	0. 047
	(0. 040)	(0. 009)	(0. 032)
d_ 11	- 0. 012	- 0. 001	0. 040
	(0. 038)	(0. 009)	(0. 033)
d_ 10	- 0. 002	0. 005	0. 043
	(0. 035)	(0. 010)	(0. 031)
d_ 9	- 0. 004	0. 007	0. 035
	(0. 041)	(0. 011)	(0. 021)
d_ 8	- 0. 004	0. 006	0. 029
	(0. 035)	(0. 008)	(0. 024)
d_ 7	- 0. 008	- 0. 005	0. 028
	(0. 033)	(0. 007)	(0. 026)
d_ 6	- 0. 012	- 0. 006	0. 023
	(0. 028)	(0. 007)	(0. 024)
d_ 5	- 0. 020	0. 001	0. 012
	(0. 030)	(0. 008)	(0. 011)
d_ 4	- 0. 029	- 0. 007	0. 011
	(0. 026)	(0. 005)	(0. 012)
d_ 3	- 0. 024	- 0. 012 **	0. 018
	(0. 020)	(0. 006)	(0. 012)
d_ 2	- 0. 023	- 0. 003	0. 013
	(0. 018)	(0. 005)	(0. 011)
d_ 1	- 0. 000	0. 005	0. 011
	(0. 023)	(0. 006)	(0. 009)
d1	0. 017 **	0. 010 ***	- 0. 024 **
	(0. 008)	(0. 003)	(0. 010)
d2	0. 008	- 0. 004	0. 036 ***
	(0. 010)	(0. 003)	(0. 008)
d3	0. 023	0. 025 **	0. 017
	(0. 018)	(0. 009)	(0. 012)
d4	0. 037 ***	0. 014 ***	0. 016
	(0. 013)	(0. 004)	(0. 014)
d5	0. 048 ***	0. 020 ***	0. 023
	(0. 013)	(0. 006)	(0. 015)
d6	0. 057 ***	0. 033 ***	0. 039
	(0. 014)	(0. 005)	(0. 024)
d7	0. 106 ***	0. 039 ***	0. 038
	(0. 020)	(0. 010)	(0. 024)
d8	0. 100 ***	0. 006	0. 030 *
	(0. 015)	(0. 007)	(0. 015)
d9	0. 108 ***	0. 007	0. 037
	(0. 018)	(0. 008)	(0. 024)
d10	0. 145 ***	0. 014 **	0. 039 *
	(0. 023)	(0. 006)	(0. 02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N	744	744	7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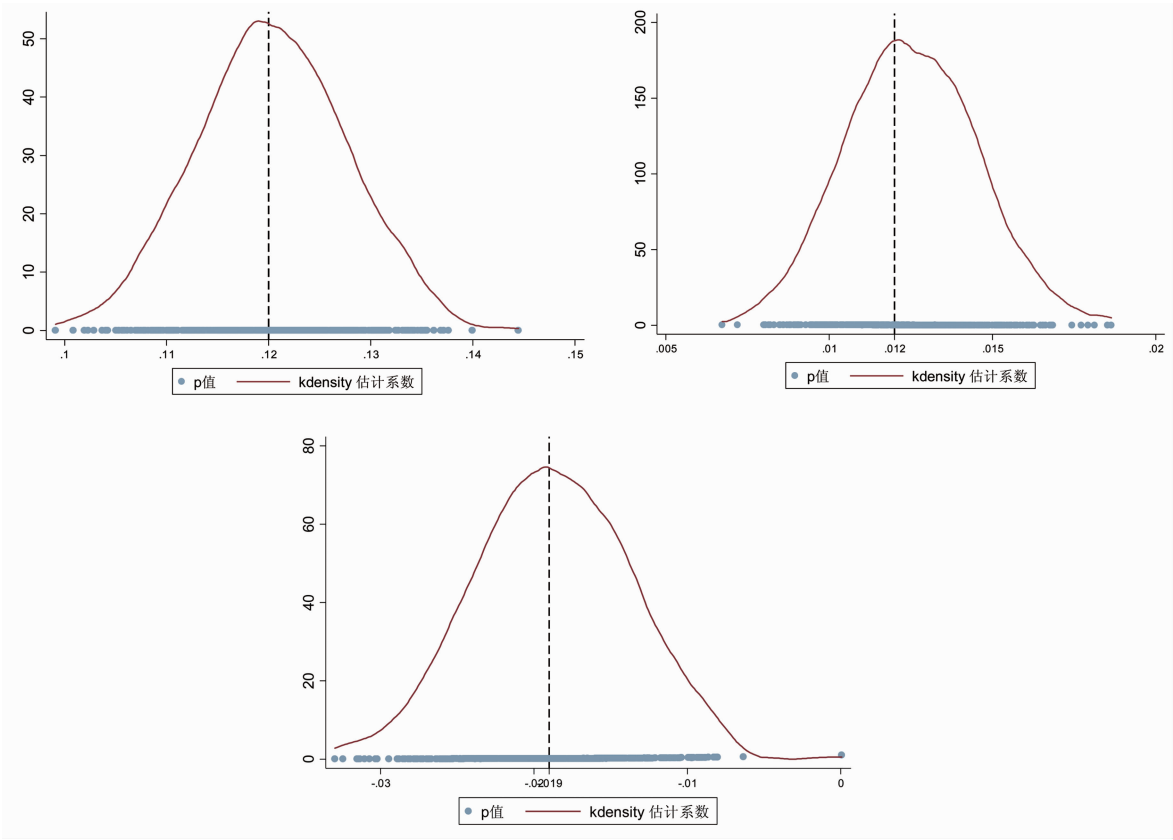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三）数字贸易的中介效应

表 5 显示了采用两步法检验的数字贸易中介效应结果。首列显示双重差分变量系数显著大于 0，说明中美贸易摩擦对开放型地区数字贸易发展存在正影响。后三列中数字贸易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非美国比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出口高技术产品比重不存在显著影响，由此表明地区数字贸易发展在中美贸易摩擦与出口技术含量、出口国别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机制，即数字贸易发展是中美贸易摩擦下开放型地区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降低对美依存度的其中一项中间路径。假设 H2 得以验证。

表 5 数字贸易发展的中介效应

因变量	EDI	EXPY	EXregion	EXtech
treat × after	0. 113 ***			
	(0. 007)			
EDI		0. 890 ***	0. 084 ***	− 0. 033
		(0. 038)	(0. 020)	(0. 035)
lnpgdp	0. 508 ***	0. 574 ***	− 0. 011	0. 112 ***
	(0. 017)	(0. 030)	(0. 015)	(0. 027)
lnpatent	− 0. 007	0. 099 ***	− 0. 024 ***	0. 023 ***
	(0. 008)	(0. 009)	(0. 005)	(0. 008)
finance	1. 617 ***	2. 369 ***	0. 092	1. 092 ***
	(0. 269)	(0. 314)	(0. 161)	(0. 285)
fdi	0. 001 **	− 0. 004 ***	− 0. 000	−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constant	− 4. 159 ***	− 4. 712 ***	1. 147 ***	− 0. 776 ***
	(0. 147)	(0. 252)	(0. 129)	(0. 229)
地区控制	YES	YES	YES	YES
时期控制	YES	YES	YES	YES
估计方法	FE	FE	FE	FE
N	744	744	744	744

（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为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对中美贸易摩擦下开放型地区的出口升级产生调节作用，进一步估计方程（4）。表6结果显示，在三个因变量下，双重差分项分别大于0、大于0和小于0，与表3结论相同。三者交叉项系数 $treat \times after \times EPU$ 则恰好表现出与双重差分项 $treat \times after$ 符号相反，在因变量为 EXPY、EXregion 时，该变量系数显著小于0，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美贸易摩擦与开放型地区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出口非美国比重的正相关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中美贸易摩擦对开放型地区这两类出口升级的正影响减弱。在因变量为 EXtech 时，该变量系数在10% 概率下显著大于0，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美贸易摩擦与开放型地区出口高技术产品比重的负相关存在逆向的调节作用，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中美贸易摩擦对开放型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负影响减弱。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未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对出口高技术产品比重的负影响，相反能减轻这一负影响的现象，本文认为在中美贸易摩擦下，国内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出口受阻，为了缓和贸易壁垒的冲击，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这些政策更多倾向于高科技领域，如针对芯片、集成电路、新能源产业的出口补贴等，使这些行业受益明显，驱动企业积极布局海外市场，进而有效地减缓了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负向冲击。

表 6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因变量	EXPY	EXregion	EXtech
treat × after	0.216 ***	0.026 ***	-0.051 **
	(0.020)	(0.007)	(0.035)
treat × after × EPU	-0.075 ***	-0.011 **	0.029 *
	(0.013)	(0.005)	(0.016)
lnpgdp	0.854 ***	0.026 **	0.094 ***
	(0.026)	(0.010)	(0.018)
lnpatent	0.092 ***	-0.025 ***	0.030 ***
	(0.010)	(0.004)	(0.008)
finance	-3.431 ***	-0.092	-0.862 ***
	(0.370)	(0.151)	(0.280)
fdi	-0.004 ***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constant	-6.818 ***	0.870 ***	-0.718 ***
	(0.231)	(0.089)	(0.162)
地区控制	YES	YES	YES
时期控制	YES	YES	YES
估计方法	RE	RE	RE
N	744	744	744

表 7 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变量滞后一期的稳健性分析

因变量	EDI	EXPY	EXregion	EXtech
treat × afterl	0.117 ***	0.215 ***	0.026 ***	-0.053 **
	(0.007)	(0.021)	(0.008)	(0.024)
treat × afterl × EPU		-0.082 ***	-0.011 *	0.019 **
		(0.016)	(0.006)	(0.010)
lnpgdp	0.505 ***	0.858 ***	0.026 **	0.090 ***
	(0.017)	(0.026)	(0.010)	(0.019)
lnpatent	-0.005	0.094 ***	-0.025 ***	0.029 ***
	(0.008)	(0.010)	(0.004)	(0.008)
finance	-1.615 ***	-3.381 ***	-0.092	-0.904 ***
	(0.266)	(0.371)	(0.151)	(0.281)
fdi	0.001 **	-0.004 ***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constant	-4.154 ***	-6.876 ***	0.869 ***	-0.668 ***
	(0.145)	(0.231)	(0.088)	(0.161)
地区控制	YES	YES	YES	YES
时期控制	YES	YES	YES	YES
估计方法	FE	RE	RE	RE
N	744	744	744	744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对双重差分变量进行了三个角度的调整：一是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后可能存在“抢出口”窗口（谢建国等，2021），因此将事件虚拟变量滞后一期，即2018年3季度开始取值1；二是对开放型地区以出口依存度大于7%作为标准，为此在原有11个开放型地区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疆、广西、陕西、安徽4个地区。三是考虑到出口地区开放度的划分比较主观，而出口开放度又是一个连续型变量，因此进一步采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表7至表9显示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中美贸易摩擦对数字贸易发展仍存在显著正影响，同时对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出口非美国比重存在正影响，对出口高技术产品比重存在负影响，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美贸易摩擦与出口升级的关系存在逆向调节效应，与表3至表6有一致的结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选择2016—2021年季度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考察了数字贸易的中介效应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实证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促进了中国开放型地区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国别结构的升级，即提高了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并降低了对美出口依存度，但中美贸易摩擦也抑制了开放型地区高技术商品的出口。数字贸易发展是中美贸易摩擦与出口技术、国别结构升级之间的显著中介变量，中美贸易摩擦倒逼了地区数字贸易发展，而数字贸易发展有利地提高了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并降低对美依存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中美贸易摩擦与出口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强，中美贸易摩擦对出口技术含量、国别结构的正影响将减弱，而对产品结构的负影响将增

表 8 开放型地区样本调整的稳健性分析

因变量	EDI	EXPY	EXregion	EXtech
treatl × after	0.108 ***	0.243 ***	0.033 ***	-0.068 **
	(0.007)	(0.017)	(0.006)	(0.030)
treatl × after × EPU		-0.083 ***	-0.014 ***	0.026 *
		(0.011)	(0.004)	(0.014)
lnpgdp	0.410 ***	0.767 ***	0.011	0.094 ***
	(0.018)	(0.026)	(0.011)	(0.020)
lnpatent	0.025 ***	0.110 ***	-0.022 ***	0.028 ***
	(0.007)	(0.010)	(0.004)	(0.008)
finance	-0.717 ***	-3.408 ***	-0.078	-0.936 ***
	(0.242)	(0.346)	(0.148)	(0.276)
fdi	0.001	-0.004 ***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constant	-3.689 ***	-6.167 ***	0.979 ***	-0.690 ***
	(0.152)	(0.228)	(0.093)	(0.171)
地区控制	YES	YES	YES	YES
时期控制	YES	YES	YES	YES
估计方法	RE	RE	RE	RE
N	744	744	744	744

表 9 基于连续型 DID 模型的稳健性分析

因变量	EXPY	EXregion	EXtech
treat × after	0.482 ***	0.040 **	-0.108 ***
	(0.044)	(0.018)	(0.032)
lnpgdp	0.975 ***	0.032 ***	0.122 ***
	(0.026)	(0.011)	(0.019)
lnpatent	0.095 ***	-0.024 ***	0.023 ***
	(0.011)	(0.005)	(0.008)
finance	-3.573 ***	-0.006	-0.957 ***
	(0.385)	(0.163)	(0.283)
fdi	-0.003 ***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constant	-7.999 ***	0.793 ***	-0.902 ***
	(0.225)	(0.095)	(0.165)
地区控制	YES	YES	YES
时期控制	YES	YES	YES
估计方法	RE	RE	RE
N	744	744	744

强。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积极开拓市场打造核心优势，稳步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美贸易摩擦具有突发性、持续性、复杂性特征，对国内出口尤其是对美依存度高的出口企业产生了巨大负面冲击。由于存在各种要素成本，企业如果直接放弃美国出口市场，将对经济和贸易稳定带来不良后果。为此无论是外贸政策，还是企业自身都要有长期发展思维，积极调整外贸结构，务实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在国内市场，充分利用中国人口基数大、市场消费能力强的优势，释放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方面的潜力，加快地区性贸易组织建设，积极探索跨境贸易发展；面对国际市场，不仅要加速数字经济发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还要推动平台企业充分发挥业务类型和模式创新优势，依托“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生根发芽，与更多国家建立友好的贸易关系，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开展数字转型伙伴行动，争取制定数字经济新标准的主导权，努力在网络安全、跨境数据流、数字标准、数字主权和数字经济计量等领域达成全球共识，打造中国数字贸易核心优势。

第二，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完善数字贸易相关政策。一是发展数字经济基础研究，鼓励资本入局。实现中国数字经济从应用型创新向技术和模式创新的转变，依靠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走国内技术和模式创新的道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二是加强数字贸易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监管。国家有关部门可成立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家组，跟踪研究国内外政策形式和动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民间智库、行业界、商会等协会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经验，为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同时，要健全数字贸易领域的法律监管，重视数据在流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及早布局抢占发展的制高点。

第三，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我国外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在“科技兴贸”的发展战略下，应将重点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转移到以出口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建立梯度发展战略，加速布局三大产业群即农副轻纺等传统支柱产业、化工机电等主导型产业及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出口战略。同时，要完善加工贸易的相关政策，鼓励通过技术改革、产业改造与深加工能力对加工贸易进行转型升级。此外，可以引导跨国公司将技术含量更高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要培养本国实力的跨国公司，实施差异化战略和品牌战略，合理进行贸易保护，创造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品。

第四，稳定政策预期缓解贸易摩擦，增强企业投资和转型信心。中美贸易摩擦给大多数出口导向型企业带来了贸易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国内不断出台的产业政策也使企业家在投资上更加谨慎，有的企业不敢投资、不愿转型。对此，国家在密集出台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微观企业对政策预期的滞后性和敏感性，要缓和企业家的不确定性心理，增强政策稳定预期，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使企业能充分享受政府政策的利好，增强投资、创新和转型信心。企业也应该抓住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在充分利用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优化出口结构。

参考文献：

1. 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2. 詹宇鹏：《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2019年第8期。
3. 谢建国、王肖：《中美贸易冲突的贸易后果——基于中美贸易细分产品数据的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1期。
4. 张大海、祝志川、张玉杰：《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14期。
5. 王云胜、于树江：《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中长期影响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6. 史长宽:《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对策》,《中国流通经济》,2019 年第 6 期。
7. 魏浩、连慧君、巫俊:《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进口冲击与中国企业创新》,《统计研究》,2019 年第 8 期。
8. 颢孙书勤:《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研究——基于 2008—2017 年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 年第 5 期。
9. 李昊洋、沈昊旻:《出口贸易摩擦降低了公司研发投入持续性吗——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国际商务(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1 年第 2 期。
10. 杨成玉:《中美贸易摩擦下中欧贸易转移与承接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4 期。
11. 孙立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有效手段》,《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9 年第 6 期。
12. 鞠建东、王晓燕、李昕、侯江槐:《关税争端对中美贸易差额、贸易条件与贸易结构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1 年第 2 期。
13. 刘薇、张溪:《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分析——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工业技术经济》,2019 年第 9 期。
14. 满岩:《中美贸易关系新形势下中国先进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价格月刊》,2020 年第 2 期。
15. 梁明:《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影响和未来走向》,《国际贸易》,2019 年第 7 期。
16. 柴利、马龙南:《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瓶颈及对策》,《价格月刊》,2020 年第 12 期。
17. 王玉:《数字经济对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 年第 2 期。
18. 孙杰:《从数字经济到数字贸易:内涵、特征、规则与影响》,《国际经贸探索》,2020 年第 5 期。
19. 姚战琪:《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改革》,2021 年第 1 期。
20. 余姍、樊秀峰、蒋皓文:《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走出去的影响——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视角》,《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1 年第 2 期。
21. 邓江花、张中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投资》,《软科学》,2021 年第 6 期。
22. 王红、李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武汉金融》,2021 年第 7 期。
23. 席艳乐、汤恒运、魏夏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 CEPII-BACI 数据库的实证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9 年第 5 期。
24. 刘啟仁、吴鄂燧、黄建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分布》,《国际贸易问题》,2020 年第 7 期。
25. 范夏阳、李兵、刘韬、修媛媛:《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准自然实验的研究》,《产经评论》,2022 年第 1 期。
26. Rosyadi S. A., Widodo T. Impact of Donald Trump's tariff increase against Chinese imports on global economy: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 model.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8, 16 (2).
27. Hausmann D.,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 (1).
28. Baker S., Bloom N., Davis S.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 (4).

责任编辑:李蕊

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 商业模式研究

——基于核心能力建设的技术路径

王立鹤 宋丽妮 韩媛媛

摘要：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和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跨境电商+海外仓”逐步成为推动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引擎。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加速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强势崛起。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商业模式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认为，“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应该进行全链路核心能力建设，优化生态环境的技术路径。一要通过加强供应资源整合能力建设，提升选品能力，以及打造高附加值产品平台等措施提高供应资源整合能力；二要通过实施精准营销策略，紧抓流量提升，提高价格掌控能力，以及加强品牌建设等措施提高营销推广能力；三要通过提高物流资源整合能力，提高仓库管理智慧化水平提升物流质量效率；四要通过提高客户体验感和优化售后服务流程，提高客户综合服务能力；五要在跨境支付、通关、税收、金融服务等方面拓展外贸新生态；六要通过数字化管理、数据挖掘、数据共享等建立智慧运营生态系统。

关键词：跨境电商 海外仓 商业模式 技术路径

作者简介：王立鹤，中国建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会高级研究员；
宋丽妮，中国建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
韩媛媛，中国建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投资专员。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跨境电商+海外仓”逐步成为推动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引擎。跨境电商从本质上说是跨境贸易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实现革命性变化的成果，对全球贸易规则、产业链供应链、配套基础设施、文化制度环境、国际交往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外仓是跨境电商在买方所在国通过租赁或自建仓库的方式，开展仓储物流、清关商检、订单管理、包装配送和金融、税收、检验及售后服务等服务。海外仓不仅是仓库，还提供属地综合服务。作为新型外贸基础设施，海外仓已经成为跨境电商重要的境外节点，可有效提升满足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是提升跨境电商客户体验感的重要保障。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跨境电商的文献综述

关于跨境电商的优势，Ma Shuzhong 等学者（2018）认为企业对企业（B2B）、企业对消费者（B2C）、消费者对消费者（C2C）等跨境电商模式的出现，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多样性，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张洪胜、张小龙（2021）认为相较于传统贸易，跨境电商平台在贸易成本、交易流程、模式创新和服务贸易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Aydin 和 Kavaklioglu（2011）认为，相较于传统企业，跨境电商企业在低成本方面具有优势，尤其能够更好地控制库存数量，更便捷地进行业务推广与产品展示，能够提供连续的客户服务，能够更高效地进行客户业务的存储和数据分析。关于跨境电商面临的挑战，王会（2022）认为，跨境电商供应链范围广、整合难度大，跨境物流成本高、周期长、通关效率低，受税收、汇率影响大。王淑翠、王丹丹（2022）认为：跨境支付服务规则不统一，缺乏全球性支付系统；通关效率不能满足需求，海关检验检疫压力大；课税要素界定和税收监管程序面临挑战。

（二）关于海外仓的文献综述

作为跨境电商物流支撑环节的重要形式，海外仓受到诸多学者关注。蔡琴（2021）认为海外仓提升了终端客户本地化采购的体验，通过集中运输的优势和供应链体系的优化能够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从而促进跨境电商持续发展。杨芸（2021）提出，海外仓作为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打破了传统电商的物流瓶颈，突破了传统电商在时效性、服务范围、服务质量、物流成本等方面的局限性。熊俊、朱思怡（2021）以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了跨境电商海外仓在客户满意度、本土化建设水平、信息系统、专业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张夏恒、李豆豆（2021）认为，目前海外仓仍存在经营成本高、服务系统滞后、库存压力大等问题。

（三）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既有研究很少有对“跨境电商+海外仓”供应链全流程核心能力分析的分析，尤其是基于供应链全链路生态系统建设角度的分析更少。本文旨在通过对“跨境电商+海外仓”供应链全流程核心能力建设分析，探索核心能力建设实施技术路径，促进“跨境电商+海外仓”商业模式生态系统协调高效运行，为“跨境电商+海外仓”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二、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发展现状

（一）我国跨境电商交易形式、经营产品种类、出口国家不断丰富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始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在起步阶段，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国制造网、环球资源网等为代表的平台为我国产品提供线上展示和推广服务，为供需双方提供“相亲平台”，促成线下交易。2004 年敦煌网创立，标志着电商平台线上交易的启动。需求方可以在网上进行搜索、咨询、下单、支付、物流、评价等交易活动。随后，兰亭集势、全球速卖通等平台相继上线，从 B2B 小额批发业务逐渐衍生出 B2C 零售业务。近年来，跨境电商交易形式进一步丰富，涵盖了 B2B、B2C、C2C、企业对企业对消费者（B2B2C）、线上到线下（O2O）等多种创新形式。跨境电商的服务也覆盖了跨境电商平台服务、跨境物流仓储、跨境支付、属地仓储配送、运营服务等多个领域。

近年来，我国货物进出口额逐年攀升，从 2015 年的 24.55 万亿元增至 2021 年的 39.10 万亿元，年均增长 8.07%，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的迅猛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拉动作用。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 2015 年仅为 5.4 万亿元，2021 年达到 14.2 万亿元，年均增长 17.5%。据海关总署的统计，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从 2015 年的 400 亿元增至到 2021 年的 19800 亿元，年均增长高达 91.6%（见表 1）。同时，我国跨境电商经营的产品日益丰富，电子产品、服装服饰、家居园艺、户外用品、健康美容类产品在零售类产品中所占比例较高。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主要目的地包括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巴西等国家，这些国家人口基数比较大，互联网基础设施较好，物流基础设施完善。此外，作为跨境电商出口的新兴市场，东南亚国家近几年迅速崛起，非洲国家未来的市场空间较大。

表 1 2015—2021 年我国进出口额、跨境电商交易额及进出口额

年份	货物进出口额 (万亿元)	同比增长 (%)	跨境电子商务交 易额(万亿元)	同比增长 (%)	跨境电商进出口 额(万亿元)	同比增长 (%)
2015 年	24.55	-7.1	5.4	28.6	0.04	—
2016 年	24.33	-0.9	6.7	24.1	0.05	25.0
2017 年	27.79	14.2	8.1	20.9	0.09	80.0
2018 年	30.51	9.7	9.0	11.1	0.13	44.4
2019 年	31.54	3.4	10.5	16.7	0.17	30.8
2020 年	32.16	2.0	12.5	19.0	1.69	894.1
2021 年	39.10	21.6	14.2	13.6	1.98	17.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网经社和中商产业研究院。

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源于网经社对跨境电商的界定，将境内外主体通过平台询价、线下成交的也视为跨境电商，甚至将境内外主体通过电子邮件洽谈业务、网上银行付款的线下交易等方式也视作跨境电商，属于广义范围的统计口径。跨境电商进出口额源于海关、地方政府部门对跨境电商的界定，主要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企业或个人通过互联网平台达成交易并形成订单，同时伴随货物跨境物流送达的商品交易活动，属于狭义范围的统计口径。

（二）各级政府颁布政策鼓励跨境电商和海外仓的发展

在跨境电商政策支持方面，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跨境电商产业发展。2015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设定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截至 2022 年 4 月，全国共有 132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本覆盖全国，形成了沿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①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先后推出了针对跨境电商的多种海关监管方式。在海外仓政策支持方面，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一批跨境电商龙头企业、海外仓领军企业和优秀产业园区，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和生态圈。2022 年 4 月 20 日，《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运营与管理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公布实施，这是全国首个跨境电商海外仓标准，有助于为企业海外仓建设和运营管理提供指导，提升海外仓经营与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地方政府也颁布鼓励跨境电商和海外仓发展的政策。例如，浙江省出台《对外贸易主体培育行动计划》，鼓励引导重点外贸企业合理布局、发展建设海外仓，培育一批在信息化建设、智能化发展、多元化服务、本地化经营方面特色鲜明的代表性海外仓。

^①佚名：《商务部 4 月 21 日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2 年 4 月 21 日，<http://www.scio.gov.cn/xwfbh/gh-xwfbh/xwfbh/swb/Document/1723573/1723573.htm>。

（三）海外仓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海外仓模式不断创新

伴随着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海外仓作为跨境电商属地化经营的重要一环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我国分别在 2010 年、2015 年、2017 年掀起了海外仓建设浪潮。第一波以自建海外仓为主。在第二波的海外仓建设中，海外仓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加强了退换货、金融结汇、补货、换标签等增值服务。2017 年，第三波海外仓建设的创新步伐加快，除平台海外仓、自营海外仓、第三方海外仓之外，还有一些市场主体探索建设公共海外仓和虚拟海外仓。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海外仓的数量已超过 2000 个，总面积超 1600 万平方米。^①

三、我国“跨境电商 + 海外仓”运营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跨境电商 + 海外仓”企业在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各方面能力显著提升，但在供应链核心能力建设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供应资源整合难度大

一是供应商遴选难度大。我国跨境电商供应链采购范围广，时间空间差距大，生产者的水平差距大，识别并培育能与平台共同发展的高质量供应商难度大，对产品质量控制难度大。二是产品遴选难度大。选品对于“跨境电商 + 海外仓”企业至关重要，但品类众多、区域差异大、消费偏好各具特色等都加大了选品的难度。如果所选商品适销不对路，或者投放时间不对，则会出现货品滞销、积压，甚至仓库爆仓。如果产品长期销售不出去，在高昂的仓储费用压力下，商家不得不选择销毁产品。三是产品附加值不高。我国跨境电商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园艺用品等，该类产品同质化严重，很多企业个性化定制等创新能力不足，影响了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以中俄贸易为例，根据俄电商企业协会的统计，2018 年俄罗斯消费者在跨境电商平台上购买的商品，从包裹数量上看中国占 92%，但金额中国仅占 54%，而欧盟商品却以 3% 的包裹量占据了 22% 的贸易额。^②

（二）营销推广意识弱

一是营销策略不足。营销策略整体规划不足，在营销的理念、策略和方式上创新不足，营销缺乏互动性，形式单一，甚至很多电商平台企业依然主要依靠电子邮件、电话咨询。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特点，也没有制定差异化的产品营销策略。二是店铺引流困难。客源是跨境电商经营的关键，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很多，但是很少能占据较大市场规模。平台引流成本巨大，但很难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客户粘性低。平台相互之间的可替代性很强，客户有可能更换平台，导致平台客源流失。三是价格掌控力不高。首先，市场的复杂性提高了定价的技术难度。由于文化、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客户需求情况复杂，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产品，确定投放数量和制定价格策略的难度增加。其次，我国电商出售的产品相对附加值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所以价格掌控能力比较弱。跨境电商平台之间流量的争夺，也易导致以打价格战作为电商平台竞争的手段。四是品牌建设意识淡薄。我国跨境电商企业缺乏品牌意识，很多企业迫于市场竞争压力，选择低价策略抢占市场，忽视了品牌建设。也有的企业认为品牌建设投入具有不确定性，品牌价值积累见效慢，放弃了建设品牌长期优势。

^①吴力：《海外仓建设从量增迈向质升》，《国际商报》，2022 年 1 月 11 日，第 002 版。

^②姜岩、郭连成：《中俄跨境电商发展研究》，《学术交流》，2021 年第 4 期，第 92 页。

（三）物流资源整合成本高

一是物流运输成本高、效率低。目前跨境电商物流费用在整个跨境电商成本中的占比为 20% ~ 30%，依据 FocalPrice 的客户满意度调查，客户对跨境电商的抱怨集中在物流方面。^① 在头程运输中包括了境内运输、海上运输及目的国运输等环节，运输距离长、成本高。又涉及到跨境运输，还需要进行通关、商检等环节，各国海关的通关流程不同，手续复杂，有的甚至需要专门的通关公司来完成清关。二是海外仓建设运营成本高。海外仓的主要成本包括建设或租赁成本、运输成本和运营成本。其中海外仓建设成本巨大，建成一个设施配备完备，达到相对成熟规模的海外仓，所需成本高达上千万美元。^② 因此很多企业选择租赁海外仓。海外仓的运营成本主要集中在人工、能耗以及租赁费用。以人工成本为例，中国仓库工人的最低人工成本为每小时 3 美元，美国为每小时 15 美元，是国内费用的 5 倍。^③ 三是海外仓库存管理水平低。海外仓运行系统需要保持信息的及时性和流通性，能够对各环节链接快速响应。我国很多海外仓管理系统采用传统的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下单，辅之以人工复核，很少应用大数据，信息也缺乏流通性，物流信息跟踪实时性差，易出现错发漏发。一些海外仓物流技术与自动化设备水平低，仍靠劳动密集型作业方式，物流效率低、成本高。

（四）客户服务质量低

一是客户需求把握不准。“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客户，语言、文化、风俗、消费习惯等差异很大。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普遍存在对当地客户需求研究不深的问题，研发、设计、实施、反馈等环节很难精准匹配客户需求，无法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线上购物体验。二是售后服务能力不强。售后服务是客户满意度的重要保障，跨境电商产品的售后服务主要体现在产品退换货、售后维护保养等方面。由于“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本土化运营能力低、本土化服务能力不足等原因，售后服务成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亟待补齐的短板。一方面是需要提供维护保养的耐耗品，由于专业人才配备不足，很多供应商难以为出口货物提供长期有效的售后服务，极大影响了客户的购物体验。另一方面是退换货，平台反应速度慢，本土化的服务能力不强，专业人才缺乏，对客户要求反应不及时，服务不专业，导致客户体验感不佳。

（五）生态系统效率低

“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还要在支付结算、通关、缴税、金融等方面做好生态系统构建的综合协调服务，这直接影响着交货速度、资金安全、通关效率、合规纳税等环节。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在这些综合协调服务方面还面临诸多困难。一是支付风险高、便利性差。在跨境电商交易中，大多采用第三方平台线上支付，涉及不同国家间的货币交易，汇率波动大，导致交易风险大。很多国家和地区网络稳定性差，在信息传输中经常出现信息延迟、系统故障等问题。二是清关、商检效率低。“跨境电商+海外仓”业务具有订单多、频次高、品类多等特点，面临通关、商检、监管等环节的挑战。跨境电商对通关效率要求高，但电商企业在自主申报和办理清关程序过程中，不确定性较多。海外仓属地化清关过程中，也面对着各国海关管理规则差异，清关手续繁杂。在商检方面，多频次、多品种，增加了商检的难度，造成商检效率低。三是税收监管难度加大。跨境电商交易缺乏纸质发票或者纸质凭证，增加了纳税机关在纳税主体界定方面的难度。再有是跨境电商采用无纸化交易，电子交易凭证容

①陈炯、李谷：《中小型跨境电商企业海外建仓模式选择研究》，《中国市场》，2020 年第 1 期，第 189 页。
②张夏恒、李豆豆：《跨境电商海外仓类型及发展措施》，《工信财经科技》，2021 年第 1 期，第 76 页。
③林芳、刘香进：《海外仓模式下跨境电商物流成本控制分析》，《中国市场》，2019 年第 2 期，第 33 页。

易被修改，导致纳税机关不能准确判断相关纳税信息，可能造成逃税漏税行为。四是金融服务能力不高。各“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汇率管理和资源综合使用能力弱，平台卖家资金占用大，现金流紧张，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低。针对这种情况，亟待协调金融资源，提升金融服务能力。

（六）智慧运营水平低

与传统业务比较，“跨境电商+海外仓”业务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智慧赋能。当前，我国企业在智慧运营方面依然存在问题。一是管理系统信息化水平不高。企业未能高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没有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水平不高。二是海外仓库管理智慧化水平不高。近半数企业使用传统 ERP 系统和人工核查，缺少仓储管理信息系统，仅能以劳动密集型作业方式提供仓储物流服务，制约海外仓的整体运作效率。^①三是数据攀爬、收集、分析能力不高。数据资源价值没有充分发挥，无法高效的利用数据资源分析客户需求、消费偏好、行业热度等信息。四是没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海外仓、跨境电商平台、独立站未实现联动发展，制约了订单转化率和仓内商品周转率。

四、“跨境电商+海外仓”核心能力建设技术路径探析

“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需要提供货源选品、质量管理、营销推广、渠道建设、物流运输、仓储配送、报关报检、支付结算、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要与供应商、物流企业、仓储企业、海关、商检、税收、支付平台等构成的生态系统进行有效协同。作为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引领者，组织构建智慧稳定高效的全链路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为此，“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要打造供应资源整合能力、营销推广能力、物流整合能力、客户服务能力、生态拓展能力、智慧运营能力等核心能力。

（一）供应资源整合能力

“跨境电商+海外仓”核心业务是将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快捷、高效地运送到客户手里。所以电商平台整合供应商资源，选品以及产品质量控制能力构成了电商企业服务客户的基础能力。一是加强供应资源整合能力建设。积极推进与行业头部厂家合作，强化与国际知名品牌的战略合作，为平台构建高品质的供应根基。利用客户搜索、浏览、购买等大数据信息，及时准确把握客户需求动向，及时将客户需求信息共享反馈给平台商家，并积极吸引热销品供应商进驻平台。建立对现有商家的评级机制。对拟入驻商家进行严格准入审核。建立资信记录档案，对于发生客户投诉的商家进行核实，并降低评级，对于行为恶劣者应该责令下架产品。二是加强选品核心能力建设。跨境电商选品要坚持从兴趣出发、从市场需求出发和从平台特性出发。要运用大数据资源选品，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活动数据，分析计算点击量、转变率、购入率、产品评价、售后需求等数据，并结合目标国家国情、客户消费水平、消费整体偏好等特征，解析预测出市场需求趋势，选择需求量大、周转速度快的产品，降低库存成本，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具有较高品牌价值的产品，可以作为优选产品。三是提供高附加值产品。通过行业大数据分析，预测行业发展方向，洞悉市场偏好，引导供应商的技术升级，生产高附加值产品。通过客户行为大数据分析，对不同区域市场的客户进行“画像”，掌握客户个性化需求，通过个性化产品服务提升价值，提升品牌影响力。此外，要严把产品质量关，建立全流程产品质量管控体系，实现全流程可溯源。

^①韩娟娟：《跨境电商海外仓建设运营问题及建议》，《中国外资》，2021 年第 9 期，第 82～84 页。

（二）营销推广能力

“跨境电商+海外仓”模式的营销推广相较于传统的营销推广在营销途径、营销策略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利用数字化手段，营销推广将更加精准聚焦目标客户群体和客户需求。营销推广要从策略、引流、定价和品牌建设等方面打造核心能力。一是实施精准营销策略。运用大数据技术搜寻目标客户、潜在客户的消费水平、消费偏好、年龄、性别等特征，创建客户特征分析模型，确定产品目标客户群体，依据模型精准找到商品的目标客户，进行有针对性的投放和推广。二是采取有力措施提升流量。在把握好选品环节的基础上，通过社交媒体等平台开展有效营销，实现引流。电商平台之间可以相互合作，提高客户服务能力，并实现双方客户渠道资源的共享。要综合运用网络营销多种方式，如搜索排名、自媒体营销、网站优化、邮件营销等拓宽渠道，实现全方位引流。三是提升价格掌控力。要通过大数据监测市场变化情况，预测市场动向。分析客户在网站留下的浏览、交易信息，推送产品及价格信息。要创新差异化定价策略，基于整合分析信息资源，充分考虑各种成本因素，针对不同区域市场、客户群体，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进行差异化定价。四是加强品牌建设。树立品牌意识，在提升产品质量、企业文化宣传、企业形象维护、客户关系管理等各方面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企业的软实力。平台电商重点吸引有自主品牌和知名品牌的企业，培育细分市场的品牌。建立危机公关处理机制。强化知识产品意识、社会责任意识。

（三）物流资源整合能力

在“跨境电商+海外仓”业务模式下，企业一般通过海运等集中运输方式，实现低成本、集约化的头程运输，随后将商品在海外仓集合、仓储、管理。客户下单后，再通过属地化的物流配送系统实现快速交货。海外仓的重要优势之一是属地化交货，提高了交货速度，提升客户体验感。在实践中，需要提高如下能力。一是提高物流资源整合能力。要探索自创物流和协同物流相结合的方式，结合业务覆盖区域和运输需求特点与专业的海运、铁路运输、汽运等第三方物流公司合作及属地化的物流企业合作，解决头程运输及属地化的分销配送问题。在头程运输中，根据目的国位置及运输货物特点灵活选择不同运输方式。在属地化物流配送上，与当地物流企业合作，提供属地化服务。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探索属地化物流能力建设，提高本土化量身定制的服务能力。二是提高仓库智慧管理水平。国外先进企业通过智能化系统，实现物流自动监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采用的是可视化管理系统，能够迅速对系统各个环节做出响应。我国海外仓仓库管理要在信息化水平上进行升级，提高海外仓运营效率。在具体运营中，产品入仓时要做好商品类别分拆、分类，强化商品编码管理工作。要实现产品全程可监控，从进仓—打包—出仓—运输—配送，包裹物流全程可追踪、可监控，并提供即时查询服务。探索使用机器人拣货、无人机派送等智能物流手段，提升尾程送货能力。

（四）客户服务能力

当前“跨境电商+海外仓”业务行业同质化竞争较严重，为提高竞争力，增加客户的粘性，提升客户忠诚度，有必要强化其客户服务能力。一是提升客户体验感。“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的发展理念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深入研究本土化客户需求特点、消费心理、购买习惯，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匹配的营销服务策略，提高客户对购物全过程的体验感。二是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跨境电商+海外仓”模式下，高度本土化服务是其重要特征和关键竞争力。提升客户服务能力，要提高属地化用工水平，雇佣对当地化、传统、习惯等熟知的本地人才；要配备数量充足、专业水平高的技术人员，保障售后维护、维修工作高质量开展；要培训客服工作人员，提升其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以便

于妥善解决客户的各种问题。三是提升售后服务水平。售后服务水平是客户体验感的重要方面。退换货作为一种附加服务会使平台更具吸引力。要简化、优化退换货手续和流程，并启动多样化的退货模式，保障消费者的良好购物体验。

（五）生态拓展能力

为实现全链条便捷高效运行，支付结算、通关、税收、金融等环节的协调提升至关重要，关系着交货速度、资金安全、通关效率、合规纳税。一是在跨境支付方面。“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要积极协调、督促各方在制订行业标准，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开展务实有效的工作，推动建立统一的支付体系和收费方式。二是在通关效率方面。跨境电商企业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机构及政府部门的沟通。推动各国在海关监管方面进一步对接规则，申请互认等。三是在税收服务方面。跨境电商企业要协调推动税收监管方式的电子化，适应电商新业态发展。在国际合作方面，积极推动相关机构和政府之间在税务方面的合作，实现税收程序电子化、凭证互认以及避免重复征税。四是在金融服务方面。基于“跨境电商+海外仓”的真实交易，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为供应链的上下游客户提供融资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要针对供应链金融、信保支持、欧元贷款等诸多金融手段进行深度开发。

（六）智慧运营能力

“跨境电商+海外仓”业务相较于传统业务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数字技术的赋能，可实现智慧运营，驱动全产业链及整个生态系统不断提升。要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全流程可视化的信息管理系统。要协同生态系统中各方数据资源，建立全链条的数据系统，通过挖掘数据价值，分析客户需求、消费偏好、行业热度、供应能力、库存调配等信息，依据分析结果，调整产品、营销、服务策略，促进系统内部智慧运营。要通过数据共享完善智慧生态系统。实现供应链整体设计、流程管理、营销选品、需求预测、可视物流、智慧金融、智慧采购、智慧仓储、智慧配送、智慧售后等环节的融合发展，形成网络化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 张洪胜、张小龙：《跨境电商平台促进全球普惠贸易：理论机制、典型事实和政策建议》，《国际商务研究》，2021 年第 4 期。
2. 王会：《跨境电商供应链模式创新的研究——以笨土豆为例》，《老字号品牌营销》，2022 年第 2 期。
3. 王淑翠、王丹丹：《跨境电商背景下跨境出口零售规则的完善》，《国际商务研究》，2022 年第 1 期。
4. 蔡琴：《外贸新业态背景下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建设的对策研究》，《对外经贸》，2021 年第 2 期。
5. 杨芸：《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发展现状及应对策略机制研究》，《对外经贸》，2021 年第 12 期。
6. 熊俊、朱思怡：《跨境电商海外仓内部管理优化研究——以北京凯博锦程经贸有限公司为例》，《对外经贸实务》，2021 年第 9 期。
7. 张夏恒、李豆豆：《跨境电商海外仓类型及发展措施》，《工信财经科技》，2021 年第 1 期。
8. 陈炯、李谷：《中小型跨境电商企业海外建仓模式选择研究》，《中国市场》，2020 年第 1 期。
9. Ma S., Chai Y. and Zhang H., Ris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ports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6, 2018.
10. Aydin E. and Kavaklioglu S., A Study of Superiority of E-trad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Methods of Commerce in Overcoming Crises; Case Study of kitapix.com,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24, 2011.

责任编辑：郭霞

· 宏 观 经 济 ·

我国居民收入对文化消费 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

刘 慧 夏杰长

摘要：本文基于文化消费代际差异的视角，对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是对不同年龄人群，收入都是决定其文化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但其影响程度存在代际差异，其中“90后”文化消费受收入影响较小。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文化消费的代际影响显著。二是生活压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只对“60后”有直接的影响；社会保障满意度制约“70后”“90后”的文化消费支出；文化活动满意度既直接影响“80后”文化消费支出，又可以通过调整收入与文化消费的关系间接影响文化消费支出。三是文化消费已经成为“90后”的必需品；“50后”由于消费观念以及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调节变量中只有文化活动满意度影响其文化消费支出，“50后”的文化消费支出大多是对公共文化产品的消费，这与我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断提高有关。为进一步优化居民文化消费结构，促进文化消费高质量发展，需要在需求侧、供给侧上和供需匹配方面精准施策。

关键词：居民收入 文化消费 代际差异 消费决策

作者简介：刘 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 言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凸显提升内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20年1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高品质生活的概念，而多样化的文化消费恰恰是人民高品质生活的体现。中国经济逐渐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日益彰显，文化消费的重要性也不断凸显。文化消费需求提升能够倒逼供给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2013—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总消费的比重保持缓慢上升的态势，而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占人均可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大数据视角下代际差异对文化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2019BH03698）部分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创新工程支持计划资助成果；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委托项目“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研究”部分研究成果。

支配收入的比重、居民生活性消费增长率和人均文化消费增长率则一直处于波动状态。说明除了收入因素之外，其他因素也会对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产生影响。^①

生活压力、社会保障满意度、社会经济地位等都会影响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体来说，其文化消费是否存在差异？文化产品或服务作为“非必需品”的特性是否对不同出生年代的群体都适用？影响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因素又是否存在代际差异？基于此，本文以文化消费代际差异为切入点，研究文化消费的高质量发展，为供需两侧的精准匹配提供可借鉴的路径，助力我国经济内循环进一步加速。

一、文献综述

中国城镇家庭消费同时存在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余玲铮，2015）。年龄对文化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年轻人相较其他群体会购买更多的影视作品（Diniz & Machado，2011）。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具有年龄效应，即文化消费支出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但在超过 60 岁以后又会增加（文立杰等，2017）。个人的消费行为具有时代特征。不同出生时代的群体消费行为及选择偏好存在差异，同一代人经历相同的社会变迁，其消费特征也相似，因此，对于不同年代的人们，消费决策存在代际差异（林晓珊、张翼，2014）。教育文化消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70 后”在教育消费支出方面比其父辈的支出更多。

目前有关代际文化消费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大学生和农民工等特定群体的微观调查分析。大学生通过文化消费活动，可以获得高层次文化的相关知识和经验，有助于将来在职场获得更好的职位，步入社会精英阶层（Van，1997）。个人特征、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户主受教育程度、文化消费环境以及大学生消费观念等因素会影响大学生的文化消费（朱伟，2012）。大学生的文化消费也会受到其家庭文化和父母消费观念的影响（赵菡、程毅，2016）。提高大学生文化消费水平需要从需求端促进文化资本聚集，从供给端建立需求导向型的供给机制。通过对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研究发现，随着消费环境的变化，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情况发生了代际转型，即新生代农民工开始逐渐融入城市的文化消费中（王艳华，2007）。

分析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对我国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侧改革以及供需精准匹配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实证检验不同收入来源、生活压力、社会保障满意度、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消费满意度对不同群体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为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二、研究框架和模型设定

（一）收入来源对文化消费支出的直接影响

收入直接影响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与文化消费支出具有正相关关系（Brito & Barros，2005）。收入对不同文化产品需求的影响存在差异，当收入增加时，对艺术品的需求有强烈的正向影响，但对话剧等耗时比较长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没有显著的影响。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消费支出额（方福前、张艳丽，2011），其中，工资性收入以及财产

^①Hui Liu, Shuang Lu, Ximeng Wang and Shaobo Long.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Social Network. Complexity, vol. 2021.

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吕寒、姜照君，2013），因此提出假设 H1。

假设 H1a：居民收入对代际文化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H1b：不同收入来源对代际文化消费有正向的影响。

（二）生活压力调节变量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

休闲限制理论将休闲限制归为自身限制、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三类。文化消费受到这三类因素的影响。自身限制与生活压力密切相关，家庭的总体消费在既定收入水平下，家庭生活压力越大，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越强，家庭总消费趋向于主动抑制消费。文化消费是非必需品，很容易被挤出，即使具备文化消费的经济条件，但受制于自身限制因素的差异，休闲动机也会呈现差异性，从而影响文化消费支出，因此提出假设 H2。

假设 H2：生活压力负向调节居民收入对代际文化消费支出的关系，当生活压力大时，居民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弱。

（三）社会经济地位调节变量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

消费者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其文化消费（Chan & Goldthorpe，2007）。消费者会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消费与地位有关的商品，以向个体自身或他人传递其地位信息（Eastman et al.，1999）。现有的营销领域研究发现，地位消费有品位消费和奢侈消费两种消费行为。其中，品位消费是消费者通过消费象征其文化修养与生活方式的产品，来表现出个人的社会地位（Holt，1998）。文化消费是品位消费的重要体现，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其文化消费的因素，因此提出假设 H3。

假设 H3：社会经济地位正向调节居民收入对代际文化消费支出的关系，当社会经济地位高时，居民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强。

（四）社会保障满意度调节变量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Richards，1996）。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对中国的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方匡南、章紫艺，2013）。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高居民抵御未来风险的不确定性，改善居民对未来的心理预期，从而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能够较大幅度推动收入弹性比较大的文化消费的增长。社会保障满意度作为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主观感受，反映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果的最佳方式，对文化消费行为有实质的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4。

假设 H4：社会保障满意度正向调节居民收入对代际文化消费支出的关系，当社会保障满意度高时，居民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强。

（五）文化活动满意度调节变量对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

文化产品或服务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属于体验性产品，文化消费是典型的体验性消费。消费者可以通过体验性消费获得幸福感（Gilovich，2015）。参与文化活动对幸福感的效应仅次于健康和收入，高于年龄、教育、性别或就业等的效应（Schmiedeberg & Schroder，2017）。对于不同的代际群体来说，其参与文化活动的满意度会影响到文化消费的支出，因此提出假设 H5。

假设 H5：文化活动满意度正向调节居民收入对代际文化消费支出的关系，当文化消费满意度高时，居民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强。

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收入是影响文化消费的直接因素，建立模型（1），IN 代表收入，X 代表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和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 ε 为误差项， i 为样本编号。

$$CC_i = \beta_0 + \beta_{1_i}IN + \beta_{2_i}X + \varepsilon_i \quad (1)$$

研究框架中，生活压力、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满意度、文化活动满意度等调节变量也会直接影响代际文化消费支出，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如模型（2）所示，Mod 代表居民的生活压力、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满意度以及文化活动满意度这 4 个调节变量，X 代表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和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 ε 为误差项， i 为样本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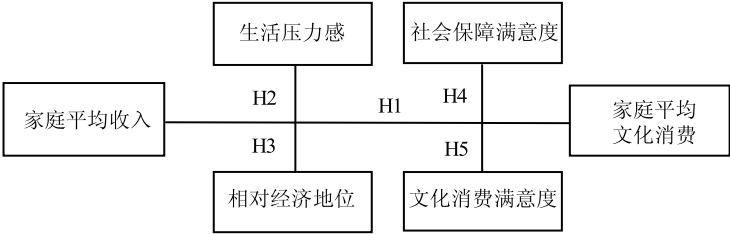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CC_i = \beta_0 + \beta_{1_i}IN + \beta_{2_i}X + \beta_{3_i}Mod + \varepsilon_i \quad (2)$$

为了检验以上调节变量是纯调节变量还是半调节变量，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收入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如模型（3）所示。Mod 代表居民的生活压力、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满意度以及文化活动满意度这 4 个调节变量，X 代表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和婚姻状况等控制变量， ε 为误差项， i 为样本编号。若模型（3）中 β_{4_i} 显著，则表明特征变量为调节变量；同时模型（2）中 β_{3_i} 也显著，则表明该特征变量是半调节变量，反之则为纯调节变量。

$$CC_i = \beta_0 + \beta_{1_i}IN + \beta_{2_i}X + \beta_{3_i}Mod + \beta_{4_i}IN \times Mod + \varepsilon_i \quad (3)$$

三、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公布的 2019 年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文化消费支出的代际差异。该数据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包括 151 个区市县县的 604 个村/居委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问卷共有 10283 份样本。通过对问卷进行预处理，剔除家庭教育支出或家庭文化、娱乐、旅游支出或家庭人均收入缺失的数据样本，以及样本中“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文化消费总支出”这两个指标位于 1% 以下和 99% 以上的极端值。根据民政部 2018 年 4 季度的民政统计季报数据，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 6956.4 元/人、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 4833.4 元/人、年，本文以低保平均标准作为居民收入的下限，剔除不符合条件的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另外，因为教育支出占文化消费的比重比较大，为了避免统计误差，更好地反应其他文化消费支出的代际差异，本文剔除了文化消费中的教育支出，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 2124 个。

（二）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文化消费。我们使用对数形式的家庭平均文化消费支出作为文化消费的代理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文化消费分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文化娱乐用品等 3 个部分。如图 2 所示，剔除教育支出之前，“70 后”的文化消费支出最高，“00 后”的文化消费支出最低；剔除教育支出之后，“00”后的文化消费支出最高。由此可见，教育支出会挤占文化娱乐服务、文化娱乐用品等支出。因此，为了避免统计分析误差，更好地分析文化消费的代际差异，本文选取 CSS2019 调查中文化、娱乐、旅游支出，用文化、娱乐、旅游支出之和除以家庭人口数，再取对数得到平均文化消费支出。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居民收入，我们使用年家庭收入除以家庭人数，再取对数得到平均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代理变量。

3. 控制变量

本文将年龄、性别、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态、所在地区等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户口类型设置为 0-1 变量（农业户口 = 1，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 = 0）；年龄用 2018 年与出生年份之差表示；性别设置为 0-1 变量（女 = 1，男 = 0）；受教育程度的取值范围为 1 至 9（未上学 = 1，上学 = 2，初中 = 3，高中 = 4，中专 = 5，职高技校 = 6，大学专科 = 7，大学本科 = 8，研究生 = 9）；婚姻状况设置为 0-1 变量（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同居 = 1，未婚/离婚/丧偶 = 0）；就业状态设置为 0-1 变量（没有工作 = 1，有工作/有工作，但目前休假、学习，或临时停工、歇业 = 0）。

4. 调节变量

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会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因此，本文将影响文化消费的生活压力、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满意度、文化活动满意度等 4 个指标均设定为调节变量。如表 1 所示。生活压力变量的样本均值接近于 2，说明被调查人群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总体上偏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取值越大，相应被采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该变量的样本均值接近 2.6，介于“上等层次”和“下等层次”之间，接近于“中等层次”。社会保障满意度变量的样本均值约为 6.9，介于“非常不满意 1 分”和“非常满意 10 分”之间，且更偏向于“非常满意”，说明调查人群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整体上偏高。文化活动满意度变量的最高取值为 10，分值越高说明调查者对文化活动的满意程度越高，该变量的均值为 6.4，说明人群的文化活动满意度整体处于较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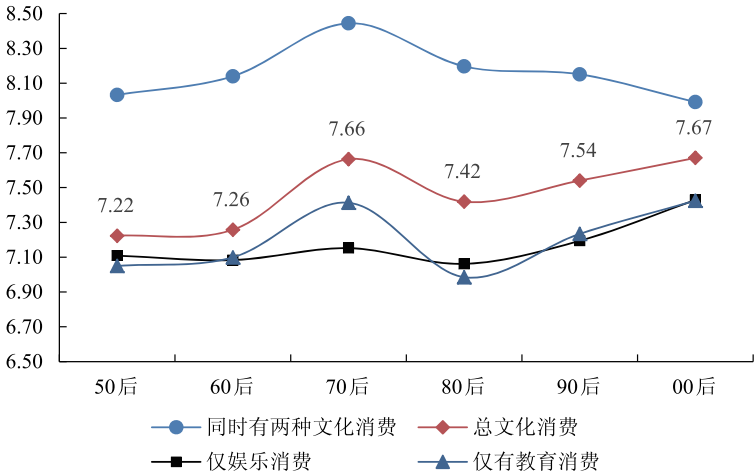


图 2 文化消费结构的代际比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CSS2019 调查微观调查数据绘制而得。

表 1 变量设定及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文化消费	CC	7.808877	1.296495
	教育消费	CED	7.70421	1.199699
	文化娱乐旅游消费	CET	6.924827	1.387239
解释变量	居民收入	IN	10.30122	0.798998
	工资性收入	gong	9.972384	1.021115
	经营性收入	jing	8.60453	1.962858
	财产性收入	cai	8.012929	1.705283
	转移性收入	zhuan	7.938054	1.872539
控制变量	户口类型	H	0.4387947	0.4963566
	年龄	A	40.55273	13.91599
	性别	G	0.556968	0.496861
	受教育程度	E	5.259887	2.265736
	就业状态	W	0.3243879	0.468256
	婚姻状况	M	0.757533	0.4286762
	地区（东中西三大区）	L	1.706685	0.8115584
调节变量	生活压力	LP	1.950094	1.99206
	社会经济地位	ES	2.576271	0.8655886
	社会保障满意度	SS	6.861111	2.057811
	文化活动满意度	CA	6.36629	2.336004

(三) 实证结果分析

1. 收入变量对代际文化消费的直接影响

本文根据居民出生年代的不同将样本划分为五个出生组，如表 2 所示，1950—1959 年出生的为“50 后”，1960—1969 年出生的为“60 后”，1970—1979 年出生的为“70 后”，1980—1989 年出生的为“80 后”，1990 年之后出生的为“90 后”。

如图 3 所示，随着出生年代的延后，居民文化消费均值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80 后”的文化消费均值最低，“60 后”的文化消费均值最高。为检验居民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代际差异，本文对 5 个出生组进行了分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回归结果表明：从“50 后”到“90 后”5 个出生组的居民收入均显著及正向影响文化消费支出，且其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文化消费随收入的变动减少后增加再减少，“60 后”最低，“70 后”最高。这主要是因为“60 后”绝大部分处于退休或即将退休阶段，没有教育支出的挤占，结合图 3 可以看出，“70 后”“80 后”可支配的文化消费大多用于教育支出，从而挤占了文化、娱乐、旅游等文化消费支出。“50 后”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以及针对“50 后”的文化消费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不足，直接影响了文化、娱乐、旅游等文化消费支出。对于“90 后”而言，文化消费这样的享受型、发展型的消费已经成为其生活必需品，受收入等因素的影响较小。这也反映出我国文化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以及教育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假设 H1a 得到验证。

另外，根据心理账户理论，不同账户系统（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不可替代性，分别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本文根据来源方式将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 4 种类型的收入，并分别使用这 4 种收入对 5 个出生组的文化消费情况进行了分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工资性收入提高只影响“70 后”的文化消费支出，“70 后”的文化消费支出中教育支出挤占了其他文化消费支出。经营性收入对“50 后”“90 后”影响显著，“50 后”经营性收入中主要是农村居民通过自主经营（农家乐等）获得的收入，“50 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其文化消费的支出；“90 后”群体有 1/3 受过高等教育，信息获取越来越便捷，其思维、视野更加开阔，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更倾向于创业而非获得一份稳定固定的收入，通过创业获得远高于固定收入的经营性收入，能明显提升满足其品质生活的文化消费支出。转移性收入显著影响“50 后”和“90 后”的文

表 2 收入对不同出生组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

出生年代	观测值	居民收入 (M ± SD)	文化娱乐旅游消费 (M ± SD)
50 后	292	9.983 ± 0.722	6.868 ± 1.527
60 后	366	10.208 ± 0.791	6.985 ± 1.333
70 后	419	10.35 ± 0.798	6.913 ± 1.369
80 后	542	10.374 ± 0.783	6.892 ± 1.276
90 后	505	10.433 ± 0.812	6.96 ± 1.471
所有样本	2124	10.301 ± 0.799	6.925 ± 1.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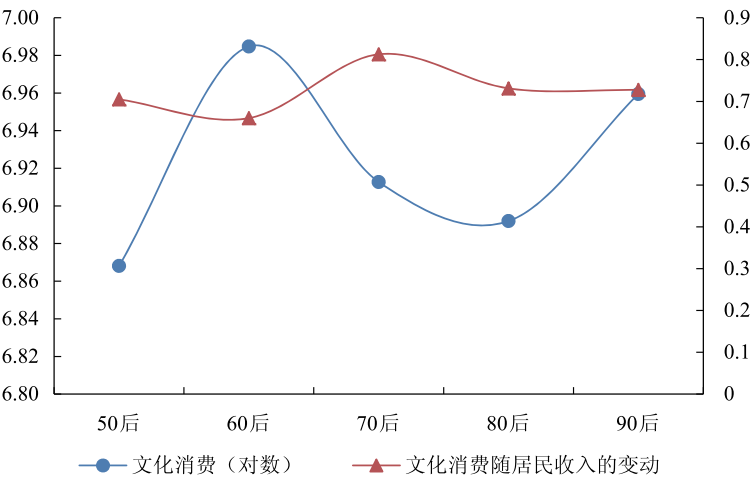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出生组文化消费曲线与文化消费随居民收入变动曲线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CSS2019 调查微观调查数据绘制而得。

化消费支出，这主要是因为“50后”人群为退休职工，其主要收入来源即养老金等社保收入；“90后”家庭成员医疗报销收入以及福利收入会正向影响其文化消费的支出。财产性收入对“60后”“70后”“80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群体通过出租固定资产和金融理财等方式获得的收入，是其固定收入之外的第二收入来源，拓宽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助于推动其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假设 H1b 得到验证。

2. 调节变量对文化消费影响的代际差异

(1) 生活压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对“60后”有直接影响。如表 5 和表 6 所示，生活压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出生组的群体没有调节效应。生活压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只对“60后”的文化消费支出产生直接的影响。即生活压力越大，“60后”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就越少；社会经济地位越高，“60后”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越多。“60后”的群体即将退休，在职期间的低收入已经增加生活压力，为了应对退休之后的生活，便会减少文化消费的支出。社会经济地位高通常意味着收入较高且稳定，退休后的生活品质有保障。因此，“60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也越多。假设 H2 和 H3 得到验证。

(2) 社会保障满意度对“70后”和“90后”的文化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如表 7 所示，模型(3)中，除了“70后”“90后”，其他年龄群体的 SS 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对于“70后”，这一群体经历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保障满意度会增强“70后”居民收入对于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90后”一代享有更

表 3 居民收入影响文化消费的回归分析结果：代际差异

变量	模型 (1)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IN)	0.705***	0.660***	0.813***	0.731***	0.728***
	(5.780)	(7.530)	(10.530)	(11.180)	(9.430)
(G)	0.355**	-0.284**	0.174	0.030	-0.009
	(2.100)	(-2.110)	(1.520)	(0.310)	(-0.070)
(A)	0.037	-0.018	-0.038*	-0.014	0.001
	(1.230)	(-0.820)	(-1.950)	(-0.830)	(0.030)
E-2	0.507	0.533	-0.276	-0.712	-
	(1.390)	(1.390)	(-0.420)	(-0.880)	-
E-3	1.035***	0.670*	0.159	-0.391	0.171
	(2.810)	(1.870)	(0.250)	(-0.510)	(0.250)
E-4	1.553***	0.753**	0.344	-0.151	0.581
	(3.910)	(2.050)	(0.530)	(-0.190)	(0.840)
E-5	1.711***	1.102**	0.392	-0.262	0.473
	(3.360)	(2.430)	(0.580)	(-0.330)	(0.670)
E-6	2.203	0.612	-0.102	0.065	-0.592
	(1.590)	(0.840)	(-0.140)	(0.080)	(-0.670)
E-7	1.680***	1.213***	0.669	-0.166	0.209
	(3.810)	(3.060)	(1.010)	(-0.210)	(0.310)
E-8	1.412***	1.323***	0.561	-0.147	0.250
	(2.150)	(3.180)	(0.850)	(-0.190)	(0.370)
E-9	-	1.240*	0.737	0.005	0.319
	-	(1.670)	(1.020)	(0.010)	(0.420)
M	-0.093	-0.208	-0.257	-0.127	-0.076
	(-0.410)	(-1.040)	(-1.270)	(-0.910)	(-0.470)
H	-0.151	-0.237	-0.160	(-0.356***)	(-0.419***)
	(-0.680)	(-1.520)	(-1.090)	(-3.130)	(-3.280)
W	0.022	0.477***	-0.200	-0.183	(-0.232*)
	(0.100)	(3.260)	(-1.230)	(-1.280)	(-1.690)
东中西-2	-0.349**	0.013	0.049	0.121	0.096
	(-1.720)	(0.090)	(0.360)	(1.090)	(0.690)
东中西-3	-0.037	0.212	0.221	0.237*	-0.030
	(-0.180)	(1.430)	(1.600)	(1.900)	(-0.210)
常数项	-3.590	0.577	-0.063	0.194	-0.570
	(-1.460)	(0.360)	(-0.050)	(0.170)	(-0.490)
观测值	292.000	366.000	419.000	542.000	505.000
R ²	0.292	0.352	0.389	0.315	0.239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

表 4 不同收入来源对文化消费支出的代际影响

年代	工资性收入 影响系数	显著性	经营性收入 影响系数	显著性	财产性收入 影响系数	显著性	转移性收入 影响系数	显著性
50 后	0.061989	0.665	0.294718	0.098	-0.1001	0.655	0.21577	0.006
60 后	0.042188	0.601	0.058038	0.332	0.144777	0.076	0.066402	0.195
70 后	0.276561	0.005	-0.1141	0.186	0.273484	0.006	-0.00503	0.932
80 后	-0.07568	0.229	-0.00429	0.949	0.113235	0.064	0.039852	0.402
90 后	0.02828	0.724	0.179698	0.012	0.16418	0.113	0.173791	0.006

表 5 生活压力调节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2）					模型（3）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IN	0.671***	0.609***	0.787***	0.736***	0.708***	0.617***	0.543***	0.794***	0.662***	0.763***
	(5.38)	(7.01)	(9.99)	(11.13)	(9.05)	(4.22)	(4.97)	(7.75)	(7.55)	(7.42)
LP	-0.049	-0.116***	-0.047	0.012	-0.049	-0.429	-0.506	-0.004	-0.364	0.317
	(-1.26)	(-3.89)	(-1.59)	(0.52)	(-1.46)	(-0.8)	(-1.29)	(-0.01)	(-1.23)	(0.72)
IN * LP	-	-	-	-	-	0.039	0.039	-0.004	0.036	-0.036
	-	-	-	-	-	(0.71)	(1)	(-0.11)	(1.27)	(-0.83)
观测值	292	366	419	542	505	292	366	419	542	505
R ²	0.296	0.379	0.392	0.315	0.243	0.298	0.381	0.392	0.317	0.244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就业状态、地区的影响。

表 6 社会经济地位调节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2）					模型（3）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IN	0.706***	0.625***	0.811***	0.731***	0.717***	1.072***	0.387	0.619**	0.603***	0.662***
	(5.74)	(6.96)	(10.31)	(11.03)	(9.22)	(2.83)	(1.64)	(2.57)	(3.09)	(3.1)
ES	-0.009	(0.117*)	0.007	0.002	0.068	1.293	-0.749	-0.696	-0.517	-0.149
	(-0.1)	(1.67)	(0.09)	(0.04)	(1.06)	(1.01)	(-0.94)	(-0.83)	(-0.69)	(-0.19)
IN * ES	-	-	-	-	-	-0.131	0.084	0.069	0.050	0.021
	-	-	-	-	-	(-1.02)	(1.09)	(0.84)	(0.69)	(0.28)
观测值	292	366	419	542	505	292	366	419	542	505
R ²	0.292	0.357	0.389	0.315	0.241	0.295	0.359	0.390	0.316	0.241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就业状态、地区的影响。

好的教育福利，有 1/3 的“90 后”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文化消费水平和层次。假设 H4 得到验证。

（3）文化活动满意度对文化消费的代际差异显著。如表 8 所示，从模型 2 可以看出，“50 后”“60 后”“80 后”“90 后”等 4 个年代出生组的文化活动满意度系数显著，说明对于这 4 个出生组而言，文化活动满意度直接影响其文化消费支出。从模型（3）中可以看出，“80 后”收入与文化活动满意度交互系数正向显著，而其余出生组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更高的文化活动满意度会增强

“80 后”居民收入对于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即“80 后”更加关注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品质，在乎其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体验。假设 H5 得到验证。

表 7 社会保障满意度调节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2）					模型（3）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IN	0.704***	0.675***	0.813***	0.731***	0.733***	0.813**	0.696***	0.2329648	0.9312373	0.178577
	(5.77)	(7.65)	(10.52)	(11.17)	(9.47)	(1.99)	(2.94)	(1.04)	(4.3)	(0.69)
SS	-0.038	-0.035	0.000	-0.010	-0.030	0.106	-0.004	-0.925***	0.307	-0.872**
	(-0.95)	(-1.33)	(-0.01)	(-0.44)	(-0.96)	(0.2)	(-0.01)	(-2.74)	(0.94)	(-2.3)
IN * SS	-	-	-	-	-	-0.015	-0.003	0.091***	-0.031	0.082**
	-	-	-	-	-	-0.28	-0.1	(2.75)	(-0.97)	(2.23)
观测值	292	366	419	542	505	292	366	419	542	505
R ²	0.295	0.355	0.389	0.315	0.241	0.295	0.355	0.400	0.317	0.249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就业状态、地区的影响。

表 8 文化活动满意度调节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2）					模型（3）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IN	0.682***	0.644***	0.806***	0.727***	0.709***	0.611*	0.595***	0.550***	0.984***	0.733***
	(5.64)	(7.39)	(10.44)	(11.16)	(9.29)	(1.8)	(2.83)	(2.56)	(5.82)	(3.61)
CA	0.086***	0.065***	0.038	0.055**	0.097***	-0.015	-0.008	-0.372	0.520*	0.137
	(2.64)	(2.61)	(1.57)	(2.51)	(3.58)	(-0.03)	(-0.03)	(-1.16)	(1.84)	(0.42)
IN * CA	-	-	-	-	-	0.0102	0.0073	0.0408	-0.045*	-0.0039
	-	-	-	-	-	(0.22)	(0.26)	(1.28)	(-1.65)	(-0.13)
观测值	292	366	419	542	505	292	366	419	542	505
R ²	0.310	0.365	0.392	0.323	0.259	0.310	0.365	0.395	0.327	0.259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就业状态、地区的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

1.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以上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用 2018 年户主个人总收入代替 2018 年家庭人均总收入，采用单一方程重新估算以上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 9a ~ 9e 的估计结果都表明：各核心变量的显著性和正负符号均没有出现明显变化。这充分证明本文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2. 内生性检验

本文使用 DWH 方法检验内生性对模型（1）和模型（2）的可靠性的影响。^① 经过反复实验，本文选取“工作性质”作为变量，工作性质可以体现在专业技能上。专业技能越高，其工作者的收入也

①本文针对家庭人均年收入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测，且只需针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检测，因为模型（3）相对于模型（2），仅仅增加了调节变量和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如果模型（2）存在内生性问题，则模型（3）也一定存在内生性问题，反之，如果模型（2）不存在内生问题，则模型（3）也不存在。

表 9a 户主个人收入影响文化娱乐旅游消费的回归分析结果：代际差异

变量	模型（1）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IIN	0.385 **	0.425 ***	0.507 ***	0.336 ***	0.445 ***
	(0.155)	(0.0986)	(0.0767)	(0.0721)	(0.0853)
观测值	283	327	393	509	396
R ²	0.234	0.259	0.301	0.193	0.139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性标准差。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就业状态、地区的影响。

表 9b 生活压力调节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解释变量：个人收入）

变量	模型（2）					模型（3）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IIN	0.335 **	0.375 ***	0.466 ***	0.338 ***	0.419 ***	0.340 *	0.346 ***	0.432 ***	0.287 ***	0.458 ***
	(0.157)	(0.0972)	(0.0790)	(0.0733)	(0.0857)	(0.178)	(0.122)	(0.0962)	(0.0915)	(0.111)
LP	-0.0791	-0.130 ***	-0.0657 **	0.00376	-0.0962	-0.0434	-0.280	-0.283	-0.270	0.205
	(0.0449)	(0.0330)	(0.0324)	(0.0270)	(0.0433)	(0.613)	(0.369)	(0.358)	(0.298)	(0.553)
IIN * LP	-	-	-	-	-	-0.00357	0.0144	0.0206	0.0250	-0.0282
	-	-	-	-	-	(0.0611)	(0.0353)	(0.0337)	(0.0271)	(0.0516)
观测值	283	327	393	509	396	283	327	393	509	396
R ²	0.243	0.295	0.309	0.193	0.150	0.243	0.295	0.309	0.194	0.151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性标准差。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就业状态、地区的影响。

表 9c 社会经济地位调节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解释变量：个人收入）

变量	模型（2）					模型（3）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IIN	0.395 **	0.399 ***	0.507 ***	0.330 ***	0.431 ***	1.232 ***	0.0310	0.285	0.395 *	0.336
	(0.157)	(0.0985)	(0.0784)	(0.0722)	(0.0863)	(0.411)	(0.260)	(0.213)	(0.218)	(0.232)
ES	-0.0404	0.189 **	-0.000211	0.0757	0.0836	2.918 **	-1.178	-0.861	0.336	-0.285
	(0.102)	(0.0798)	(0.0773)	(0.0646)	(0.0771)	(1.348)	(0.896)	(0.772)	(0.836)	(0.837)
IIN * ES						-0.289	0.131	0.0805	-0.0240	0.0345
						(0.131)	(0.0854)	(0.0718)	(0.0767)	(0.0781)
观测值	283	327	393	509	396	283	327	393	509	396
R ²	0.235	0.273	0.301	0.195	0.142	0.249	0.278	0.303	0.195	0.142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性标准差。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就业状态、地区的影响。

越高，从而影响该个体的文化、娱乐、旅游消费水平，而工作的专业技能往往不会直接影响个体的文化、娱乐、旅游消费。如表 10 和表 11 所示，工具变量系数联合显著性的 F 统计量均较大，可以认为工具变量非弱工具变量。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 DWH 检验，发现 p 值均较大，无法拒绝原假设 H_0 ：“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变量”。此外，通过该内生性检验和对模型设计的多次实验，基本可以排除该检验发生Ⅱ类错误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在计量模型选择和设置时，已充分考虑内生性问

题，不影响模型的可靠性。

表 9d 社会保障满意度调节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解释变量：个人收入）

变量	模型（2）					模型（3）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IIN	0.380**	0.433***	0.506***	0.337***	0.442***	0.865*	0.807***	0.144	0.452**	0.497*
	(0.156)	(0.0989)	(0.0769)	(0.0721)	(0.0853)	(0.493)	(0.268)	(0.200)	(0.195)	(0.279)
SS	0.0132	-0.0303	-0.00660	-0.0179	0.0439	0.648	0.529	-0.636**	0.175	0.131
	(0.0455)	(0.0301)	(0.0282)	(0.0263)	(0.0369)	(0.614)	(0.373)	(0.322)	(0.304)	(0.422)
IIN * SS						-0.0636	-0.0540	0.0589*	-0.0179	0.00819*
						(0.0613)	(0.0359)	(0.0300)	(0.0280)	(0.0395)
观测值	283	327	393	509	396	283	327	393	509	396
R ²	0.235	0.262	0.301	0.194	0.143	0.238	0.267	0.308	0.194	0.143

注：***、**、*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性标准差。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就业状态、地区的影响。

表 9e 文化活动满意度调节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解释变量：个人收入）

变量	模型（2）					模型（3）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50 后	60 后	70 后	80 后	90 后
IIN	0.347**	0.416***	0.507***	0.339***	0.436***	0.116	0.161	0.406**	0.531***	0.379*
	(0.155)	(0.0989)	(0.0761)	(0.0719)	(0.0844)	(0.423)	(0.227)	(0.192)	(0.168)	(0.211)
CA	0.0824**	0.0356	0.0730***	0.0495**	0.0944***	-0.259	-0.375	-0.102	0.404	-0.00689
	(0.0373)	(0.0286)	(0.0270)	(0.0242)	(0.0309)	(0.583)	(0.331)	(0.308)	(0.283)	(0.342)
IN * CA						0.0335	0.0393	0.0165	0.0325*	0.00937
						(0.0571)	(0.0316)	(0.0288)	(0.0258)	(0.0315)
观测值	283	327	393	509	396	283	327	393	509	396
R ²	0.248	0.263	0.314	0.200	0.160	0.249	0.267	0.315	0.202	0.160

注：***、**、*分别代表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性标准差。限于篇幅，表中未报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就业状态、地区的影响。

表 10 工具变量显著性（模型 1、模型 2）

模型	第一阶段回归工 具变量显著性	结论	工具变量系数 联合显著性	结论
模型 1	p < 0.001	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F = 20.4098 > 10	工具变量非弱工具变量
模型 2LP	p < 0.001	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F = 19.2046 > 10	工具变量非弱工具变量
模型 2ES	p < 0.001	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F = 14.3208 > 10	工具变量非弱工具变量
模型 2SS	p < 0.001	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F = 20.2847 > 10	工具变量非弱工具变量
模型 2CA	p < 0.001	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F = 20.493 > 10	工具变量非弱工具变量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文化消费影响因素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有明显差异，我国的文化消费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对于所有年龄的群体来说，收入都是文化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它直接影响着人

表 11 DWH 检验结果（模型 1、模型 2）

模型	检验	原假设	检验结果	检验结论
模型 1	Durbin 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不存在内生变量）	chi2（1） =0. 260797, p =0. 6096	接受原假设
（无调节变量）	Wu – Hausman 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不存在内生变量）	F（1, 1303） =0. 257294, p =0. 6121	接受原假设
模型 2	Durbin 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不存在内生变量）	chi2（1） =0. 254582, p =0. 6139	接受原假设
调节变量 LP	Wu – Hausman 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不存在内生变量）	F（1, 1302） =0. 250969, p =0. 6165	接受原假设
模型 2	Durbin 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不存在内生变量）	chi2（1） =0. 168476, p =0. 6815	接受原假设
调节变量 ES	Wu – Hausman 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不存在内生变量）	F（1, 1302） =0. 166074, p =0. 6837	接受原假设
模型 2	Durbin 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不存在内生变量）	chi2（1） =0. 281645, p =0. 5956	接受原假设
调节变量 SS	Wu – Hausman 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不存在内生变量）	F（1, 1302） =0. 277654, p =0. 5983	接受原假设
模型 2	Durbin 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不存在内生变量）	chi2（1） =0. 286456, p =0. 5925	接受原假设
调节变量 CA	Wu – Hausman 检验	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不存在内生变量）	F（1, 1302） =0. 282398, p =0. 5952	接受原假设

群的文化消费水平。从收入来源看，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60 后”“70 后”“80 后”文化消费的代际影响最显著。“60 后”的群体即将退休，在职期间的低收入已经增加生活压力，为了应对退休之后的生活，便会减少文化消费的支出。社会经济地位高通常意味着收入较高且稳定，退休后的生活品质有保障，因此，“60 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也越多。“70 后”经历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保障满意度会增强“70 后”居民收入对于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而“90 后”一代享有更好的教育福利，有 1/3 的“90 后”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保障意识更强，有机会享受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满意度越强，越愿意进行文化消费支出。“80 后”更加关注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品质，在乎其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文化活动满意度既直接影响其文化消费支出，又可以通过调整收入与文化消费的关系间接影响文化消费支出。文化消费已经成为“90 后”的必需品。“50 后”由于消费观念以及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调节变量中只有文化活动满意度影响其文化消费支出，“50 后”的文化消费支出大多是对公共文化产品的消费，这与我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断提高有关。

为更好满足不同群体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优化文化消费结构，让文化产品（或服务）供给侧匹配需求侧，让文化消费需求侧倒逼文化供给侧改革，扩大国内文化消费市场，加速国内大循环，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收入是文化消费的决定因素，应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保持工资性收入的主体地位，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让全体居民收入增加步伐跟上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从根源上提升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能力；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丰富金融理财工具和产产品，多渠道增加金融产品投资收入，提升“60 后”“70 后”“80 后”的文化消费支付能力；针对于农村居民，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农业补贴等政策体系，提高农民的创收能力，大力增加农业人口的转移性收入，使农村居民有底气、有勇气将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进行文化消费。二是解除后顾之忧。提升不同地区的医疗、社会保障水平，以减少“60 后”“70 后”的预防性储蓄，解决其后顾之忧，进而间接地提高其可支配收入，让“60 后”“70 后”敢于进行文化消费。三是提升不同群体文化消费体验。文化消费日益成为“90 后”的生活必需性消费，他们十分在乎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产品品质和用户体验感。因此在供给侧，应大力发展新兴业态，通过 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等技术，向“90 后”提供沉浸式娱乐、智慧旅游等新文化产品和服务，通过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高“90 后”的文化消费满意度。另外，提升大众文化消费便捷性，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式发展，让“90 后”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轻松获取文化消费服务，使得文化产品和服务便捷高效、轻松

触达。针对“80后”“90后”群体，应提供具有价格优势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针对“50后”“60后”群体，应做好公共文化消费的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消费体验。

参考文献：

1. 余玲铮：《中国城镇家庭消费及不平等的动态演进：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中国人口科学》，2015年第6期。
2. 文立杰、张杰、李少多：《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个体因素视角和对应分析模型》，《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 林晓珊、张翼：《制度变迁与消费分层：消费不平等的一个分析视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 朱伟：《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17期。
5. 赵菡、程毅：《家庭经济、文化资本与大学生消费分层——基于上海四所高校的实证分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6. 王艳华：《进城农民工文化消费出现代际转型》，《上海城市管理》，2007年第9期。
7. 方福前、张艳丽：《城乡居民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变动趋势分析》，《财贸经济》，2011年第4期。
8. 吕寒、姜照君：《城镇居民分项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基于2002—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9. 方匡南、章紫艺：《社会保障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统计研究》，2013年第3期。
10. Diniz, S. C. and Machado A. F., Analysis of the Consumption of Artistic –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in Brazil,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vol. 35, 2011.
11. Van, E. K., The Impact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A Sibling Analysis, Poetics, vol. 25, 1997.
12. Brito, P. and Barros, C., Learning – by – Consuming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Demand and Prices of Cultural Good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vol. 29, 2005.
13. Chan, T. and Goldthorpe, J.,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Music in England,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3, 2007.
14. Eastman, J. K., Goldsmith, R. E. and Flynn, L. R., Status Consumption in Consumer Behavior: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7, 1999.
15. Holt, D. B., Does Cultural Capital Structure American Consump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25, 1998.
16. Richards, G.,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uropean Cultural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23, 1996.
17. Gilovich, T., A Wonderful Life: Experiential Consumption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vol. 25, 2015.
18. Schmiedeberg, C. and Schroder, J., Leisure Activitie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 Analysis with German Panel Data, Applied Research Quality Life, vol. 12, 2017.

责任编辑：郭霞

· 产业 发展 ·

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李 锋 韩燕妮 马晓玲 王 婷

摘要：低轨卫星互联网拥有覆盖广、成本低、私密性强等突出优势，部分性能已媲美 4G 网络，不仅能解决地面移动互联网全球覆盖难的瓶颈，还能满足航空、军事等特殊场景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成为全球主要国家互联网竞争的新焦点。目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相对缓慢，在轨卫星数量较少，商业模式不清晰，尚未形成与地面移动通信网络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在全球主要国家大规模推动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加大投入力度，加快低轨卫星发射进程，抢占近空领域卫星轨道和频率资源，推动低轨卫星互联网与地面移动通信网络融合发展，确保我国移动通信的国际领先优势和国家互联网安全。

关键词：低轨卫星 互联网 5G 网络 全球一体化

作者简介：李 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韩燕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马晓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王 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近两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卫星制造技术持续进步，火箭发射成本不断下降，其低轨卫星互联网计划——星链（Starlink）系统加速实施，现已在北美地区实现部分商用，计划发射共 4.2 万颗卫星为全球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① 欲形成“一网通天下”的优势地位。低轨卫星互联网尽管短期内无法与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网络竞争，但能满足航海、航空、军事等特殊场景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还能与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形成互补，构建天地一体的新型互联网。本文在研究低轨卫星互联网未来发展前景，以及与 5G 网络相互演进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制约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的对策建议。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21 年基金课题“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在课题撰写过程中给予了悉心指导，在此致谢！

^① 余南平、严佳杰：《国际和国家安全视角下的美国“星链”计划及其影响》，《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71 页。

一、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基本内涵、发展前景及态势

（一）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基本内涵

低轨卫星一般指高度在 500 公里至 1500 公里，重量在 100 公斤至 1000 公斤的现代卫星，具备通信、导航、遥感等多种功能，具有造价低、研制周期短、生产可批量化的优势，通过组网的方式能够实现甚至超越传统大卫星的功能。低轨卫星互联网是指利用低轨卫星实现局部或全球互联网链接服务的无线通信网络。随着国际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网络接入需求越来越多。现有卫星通信主要通过地球静止轨道卫星（GEO）进行传输，频率轨道资源非常有限，且卫星造价昂贵。低轨卫星离地表近，信号强度、可使用频率、数据带宽、应用领域等都远胜 GEO。采用低轨卫星组成的星座进行通信，可实现真正的全球覆盖。总之，与中轨和高轨卫星互联网相比，低轨卫星传输时延更短、路径损耗更小；与地面移动通信网络相比，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成本更低、覆盖区域更广。

（二）低轨卫星互联网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首先，航天技术的迭代升级使卫星制造和发射成本大幅降低。卫星研制引入工业化技术，可批量制造的标准模块化接口、3D 打印技术、机器人生产线以及飞机批量制造经验被广泛应用于卫星制造，推动卫星实现批量化生产和商业化应用。英国一网（OneWeb）公司将卫星制造速度从每颗 12 ~ 18 个月，提升到了每天 2 颗；SpaceX 更是借助成熟的汽车工业体系将卫星制造能力提升到每月产出 120 颗，平均每天 4 颗。^① 商业化的一箭多星发射和可重复利用技术，也大幅降低了低轨卫星的发射成本。这些因素都赋予了低轨卫星大规模部署的可能性，也增强了其商业竞争优势。其次，互联网应用的快速发展催生卫星通信服务的新商机。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一大批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应用，当互联网场景向飞机、游轮、汽车、野外等特殊环境拓展时，亟需提高数据服务的广度与深度，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最后，科技巨头的跨界加盟推动卫星产业链加速成熟。当前，在众多科技巨头的推动下，低轨卫星互联网探索出更多商业模式，直接带动了卫星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行业跨界到商业航天领域最具有典型性，亚马逊、脸书、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现都在研究低轨卫星互联网。

（三）低轨卫星互联网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近 20 年以来，“星链”“一网”“鸿雁”“虹云”等为代表的数十个星座计划掀起了发展低轨卫星互联网的高潮。SpaceX 的 Starlink 系统不断拓展近地轨道空间，截至 2022 年 8 月，已发射卫星 3108 颗，并将低轨卫星广泛应用于北美等全球多个地区的通信网络接入。^② 2021 年 4 月 22 日，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正式成立，整合相关资源，大力发展低轨卫星互联网。

二、低轨卫星互联网可与 5G 网络实现优势互补

受信号传输距离长、链路损耗大、信号易被干扰以及轨道和频率资源有限等因素影响，低轨卫星

^①吕栋：《SpaceX 平均日产卫星 4 颗，中国企业加速追赶》，观察者网，2022 年 3 月 25 日，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22_03_25_631826.shtml。

^②佚名：《SpaceX 再发射 53 颗“星链”卫星，目前总计 3108 颗》，新浪财经，2022 年 8 月 20 日，<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698823241/6541fc49020016jpp? sudaref= www. baidu. com&display=0&retcode=0>。

互联网目前还无法达到 5G 网络的通信质量。同时，地面移动蜂窝网络技术更迭速度更快、应用范围更广，低轨卫星互联网很难在短时间内替代 5G 网络，两者将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

（一）具有广覆盖优势，但通信质量远低于 5G 网络

低轨卫星互联网能够低成本覆盖沙漠、海洋等地广人稀地区，但网络传输链路损耗较大，频谱效率较低，容量较小，与 5G 网络有较大差距，不能有效满足人口密集地区用户的高速率、低时延网络需求。调查数据显示，美国 SpaceX 的 Starlink 时延最快为 20 毫秒（ms），峰值速率最快可达每秒 600 兆比特（600Mbps）；5G 时延最快为 1ms，是 Starlink 的 1/20，峰值速率可达每秒 10 ~ 20 千兆比特（10 ~ 20Gbps），是 Starlink 的 15 ~ 30 倍。Starlink 单星容量约为 9Gbps，全球总容量预计为每秒 370 百万兆字节（370Tbps）；5G 每平方公里就能达到 10Tbps。^① 此外，在每平方公里连接数、频谱效率等方面，低轨卫星互联网也明显落后于 5G 网络。

（二）具有特殊场景应用价值，可弥补 5G 网络的短板

面向不同应用场景，低轨卫星通信和 5G 各有优势。一方面，低轨卫星互联网以其广覆盖和低功耗特性，可以服务未接入宽带的飞机、邮轮以及野外科考、环境监测等特殊应用场景，还能对远郊农村、高山峻岭、沙漠和森林等局部热点地区提供互联网服务，扩大地面移动通信服务的地理范围。另一方面，由于覆盖能力广、安全和私密性较强以及不受地面障碍物和灾害等影响，低轨卫星互联网经常用于政府和军队的特需服务，在应用场景上能与 5G 实现互补。低轨卫星互联网性能虽比中高轨卫星网络有所提升，但仍无法充分满足高密度人群、行业 and 区域的高流量需求。而 5G 网络可以实现用户高速率网络接入，满足超高清视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智慧物流、智慧城市等复杂场景的需求。

（三）具有低成本优势，但短期内不可能对 5G 网络构成重大挑战

美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及运维成本较 5G 网络低，资费水平与 4G 持平。如 Starlink 的卫星制造成本和发射费用约为 300 亿美元，后期卫星置换费用每年约为 50 亿美元。我国 5G 网络建设费用约为 2000 多亿美元，虽然明显高于美国的低轨卫星互联网，但 5G 单位流量成本较低，在满足用户高流量需求方面，拥有明显竞争优势。Starlink 目前推出的流量资费为每月 99 美元，相当于美国主流运营商的 4G 资费标准，但需额外支付 499 美元购买地面信号接收设备。Starlink 最新推出的高级套餐包括终端机每套售价 2500 美元，预定押金 500 美元，每月资费 500 美元，但其下载网速仅为 150 ~ 500Mbps，延迟 20 ~ 40ms，网络性能和整体费用远不及我国 5G 具有竞争优势。

（四）拥有广阔发展前景，可与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协同发展

国际电信联盟（ITU）、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等机构均提出了多种星地融合的应用场景。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打造全球覆盖、高效运行的通信、导航、遥感空间基础设施体系。一方面，低轨卫星互联网与 5G 移动网络融合能够将先进的蜂窝网络技术引入卫星通信，有效解决卫星通信面临的容量、工程部署和移动性等问题。另一方面，低轨卫星互联网能够利用卫星链路，大力拓展 5G 基站的部署空间范围，在地面网络建设成本高的区域快速推进 5G 基站部署，助力 5G 基站按需布站，节约建站成本和空间。低轨

^①ITU. Setting the Scene for 5G: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2018, p. 5.

卫星互联网还能够与 5G 共同承载相关网络业务，结合网络切片等技术，提高总体网络效能和安全性。同时，低轨卫星互联网与 5G 网络的融合，也是发展 6G 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必然发展趋势。低轨卫星互联网与陆地无线移动通信网络、中高轨卫星互联网融合，可以建立空、天、地、海泛在覆盖的网络连接，助力 6G 实现全球无缝覆盖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

表 1 低轨卫星互联网与 5G 网络性能比较

指标	低轨卫星互联网	5G 网络	比值
峰值速率	400Mbps（OneWeb） 600Mbps（Starlink）（实测）	20Gbps/10Gbps（理论） 1Gbps（实测）	3/5
时延	20ms（或 <50ms）	1ms	1/20
连接密度	每平方公里仅分配有 0.47Mbps，连接数远少于 5G	10 ⁶ 个连接/平方公里	<1/100
网络容量	10Tbs（OneWeb） 64Tbs（Starlink）	每平方公里能支持 10Tbs 的容量	<1/100
频谱效率	2.5 比特/秒/赫兹（bit/s/Hz）	10 bit/s/Hz	1/4

数据来源：作者 2021 年 6 月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调研；ITU. Setting the Scene for 5G：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2018, p. 5.

三、我国发展低轨卫星互联网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存在卫星发射缓慢，商业模式不清晰，以及与地面移动通信网络优势互补不够等问题。

（一）美国加速抢占轨道和频率资源，我国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利用 ITU 频轨同时申请、先申先得、先发先得的规则，加速抢占总量有限的低轨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据中国信通院 2021 年 6 月发布的《6G 总体愿景与潜在关键技术白皮书》估算，地球近地轨道共可容纳约 10 万颗卫星。截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美国已申请低轨卫星 50626 颗，是我国申请数量（14220 颗）的 3.6 倍。同时，美国借助 SpaceX 等民营航天公司决策快、成本低的优势，加速发射低轨卫星。SpaceX 以每天 6 颗的速度量产 Starlink 卫星，猎鹰系列运载火箭实现了“一箭 60 星”并可回收重复利用，单星制造和发射成本仅为 153 万美元。SpaceX 2021 年上半年已发射 14 次共 840 颗低轨卫星，相当于 2020 年全年

表 2 世界各国低轨卫星星座申请情况

国家	公司名称（星座名称）	数目（颗）	已发射
中国	星网公司（GW）	12922	—
	航天科技（鸿雁）	72	3
	航天科工（虹云）	156	1
	银河航天（星座名称不详）	650	7
	中国电科（天象）	120	2
美国	SpaceX（Starlink）	42000	2335
	亚马逊（Project Kuiper）	3236	0
	Lynk Global（星座名称不详）	5000	5
	AST SpaceMobile（Space Mobile）	243	—
	波音公司（星座名称不详）	147	—
英国/印度	OneWeb（一网计划）	6372	254
波兰	SatRevolution（星座名称不详）	1024	2
俄罗斯	俄罗斯航天集团（球体）	600	—
加拿大	Telesat（Lightspeed）	1671	1
	开普勒通信公司（立方体卫星星座计划）	140	2
合计	—	74353	261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注：表中数据截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其中 AST & SCIENCE 是美国低轨卫星设计和制造商，2017 年成立，2021 年更名为 AST SpaceMobile 公司，并在纳斯达克上市。OneWeb 由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和印度巴蒂全球集团（Bharti Global）共同持股。

的发射量。截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SpaceX 已经累计发射 2335 颗，在轨 2110 颗，发射数量远超其他国家之和。美国已占用低轨卫星通信的黄金频段（Ku 频段），我国申请的频段分布在 Ka 和 V 频段上，虽频率更高、可用频段更大，但雨衰更大，对信号接收器要求更高。总的来看，我国低轨卫星星座申报时间较晚，缺少具有拦截性、高优先级和使用便利的频轨资源，在国际规则制定和合作上处于不利地位。同时，ITU 正在针对卫星互联网弥补规则和措施的不足。依据 ITU “新规则和措施不追及以往”的原则，我国申请网络资料会更为困难。此外，美国千方百计拉拢盟友使用其低轨卫星互联网，企图“一网通全球”。

（二）卫星发射缓慢，按时完成申请计划难度非常大

按照 ITU 规定的频谱权利以及部署卫星的时间要求，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需在 2027 年 11 月前发射已申请的 12922 颗卫星，否则需对申请的卫星数量进行相应调减。截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我国航天科技（鸿雁）、航天科工（虹云）、银河航天、中国电科（天象）合计发射 11 颗低轨卫星。我国航天工业以保障国防安全为宗旨，不计成本确保卫星发射百分之百成功，而商业应用则需要在高可靠和低成本之间选择平衡点。SpaceX 容忍失败，降低对成功率的要求，显著降低了单颗卫星制造和发射成本，大幅提升了卫星发射速度。在发射能力、发射成本和重复使用等方面，我国低轨卫星主力运载火箭与 SpaceX 公司的“猎鹰 9 号”还有较大差距。“猎鹰 9 号”具有超出长征 7 号级别的运载力，然而其发射周期与成本甚至小于长征 3 号乙。“猎鹰 9 号”的商业报价比我国最便宜的“长征 3 号”运载火箭还要低 60%。同时，我国卫星生产能力明显不足，卫星制造以传统的单星研制和小批量生产为主，以目前的生产速度完成上万颗的发射任务几乎不可能。^①

（三）供应链配套体系亟待优化，难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

我国航天产业供应链配套体系是围绕国家重大工程而构建的，成本巨大，不适应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要求，供应效率有待提升，供应成本有待降低。美国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公开采访中表示，设计火箭并不难，困难在于建立一条生产线，而这种生产线的建设需要上下游数量众多的配套企业来支撑。^② 在阿波罗计划中，参与“猎户座”飞船和“航天发射系统”重型火箭项目的主要承包商就超过 1400 家。这些承包商通过参与政府大型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新兴航天公司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良好配套基础。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构建尚在起步阶段，整体处于技术积累的初始阶段，存在技术创新薄弱、开发应用能力不足等问题。大多数民营企业集中在系统总体集成方面，产业链配套企业较少，现代航天产业供应链配套体系亟待转型升级。

（四）商业模式不清晰，难以形成持续发展能力

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商业化应用能够增加其“造血”能力，长期依靠国家财政补贴的非市场化运营方式难以为继。SpaceX Starlink 的商业模式较为清晰，初期为美国、加拿大提供低轨卫星互联网商用服务，中后期逐步实现全球商用，预计年盈利可达 30 亿至 500 亿美元。此外，Starlink 的低延迟特性可以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高频交易提供网络服务，预计收益可观。我国光纤优势明显，低轨卫星互联网很难与地面移动通信网络竞争，亟需创新商业模式。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实现国外运营也面临较大挑战，既有国外公司的激烈市场竞争，又有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低轨卫星互联网要实现国外运营，频

^①笔者 2021 年 6 月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调研。

^②Eric Lofgren. Production can be 1, 000% harder than design, says Elon Musk, March 16, 2020, <https://acquisitiontalk.com/2020/03/production-can-be-1000-harder-than-design-says-elon-musk/>.

率“走出去”是重要环节。目前，各国对频率落地使用的规则各不相同，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走出去”需寻求东道国的认可和支持。随着频轨资源竞争日益白热化，各国对低轨卫星互联网的立场不同，也对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走出去”构成挑战。

表 3 全球主要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国家	公司名称/星座名称	商业模式
中国	星网公司/GW	军用、政府用、行业用
美国	SpaceX/Starlink	为 C 端用户提供卫星互联网接入服务
	亚马逊/Project Kuiper	为 C 端用户提供卫星互联网接入服务
	全球链接公司（Lynk Global）/不详	提供“太空基站”服务，为移动网络运营商提供漫游服务，以及将智能手机连接到太空
	AST Space Mobile/Space Mobile	计划 2023 年在 49 个国家/地区提供商业服务
波兰	SatRevolution/不详	实时和超精密地面观测服务
英国	OneWeb/一网计划	为 C 端用户提供卫星互联网接入服务
俄罗斯	俄罗斯航天集团/球体计划	为 C 端用户提供卫星互联网接入服务
加拿大	通信卫星公司（Telesat）/Lightspeed	提供骨干网络，只满足专业服务的需求
	开普勒通信公司/立方体卫星星座计划	海事、航空、地球观测、太空旅游，以及政府使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注：表中数据截至 2022 年 3 月底。

（五）统筹协调不够，尚未与地面网络形成互补发展格局

2016 年，我国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集团分别提出了“鸿雁”和“虹云”低轨卫星通信星座计划。由于缺乏长期发展规划及行业标准，无法为国家相关重大项目实施提供决策依据，无法为行业参与者提供规划参考。低轨卫星互联网不仅能与 5G 网络互补发展，还将与 6G 网络实现融合发展，亟需出台统筹低轨卫星互联网与地面移动通信网络、中高轨卫星网络协同发展的战略。此外，基于低轨卫星互联网的比较优势，我国偏远地区地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及我国与东盟之间的跨境海底光缆建设计划需要重新评估建设方案。

四、加快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主要国家大规模发展低轨卫星互联网的背景下，我国应加大投入力度，加快低轨卫星发射进程，尽快抢占近空领域卫星轨道和频率资源，培育竞争和反制能力，防止形成美国“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同时，应积极推动低轨卫星互联网与地面移动通信网络融合发展，形成空天地一体化网格发展的新优势。

（一）加强协调，系统构建低轨卫星全国“一张网”

低轨卫星互联网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与航天、智能制造等技术紧密联系，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一要加强多部门协作联动，做好国家低轨卫星互联网重大战略规划的衔接，形成统一的技术发展长期路线图。统筹规划“鸿雁”“虹云”“天象”等在内的低轨卫星星座建设计划，做好“高低轨”“宽窄带”“区域与全球”“军用与民用”等方案的统一论证。二要研究构建低轨卫星互联网新型举国体制，汇集科研院所、国内一流宇航公司和信息通信企业等多方力量，攻克一批真正制约我国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建设的关键技术，建设国际一流的低轨卫星互联网，

探索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方案。

（二）加紧布局，尽快抢占低轨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

2025 年前是空间互联网部署的关键时期，也是各大空间互联网星座系统抢占频轨资源的关键时期。一是坚持“赶紧建、赶紧抢、赶紧用”原则，尽可能多地完成我国已向 ITU 申请的卫星发射数量，加速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二是积极申报与储备低轨空间不同轨道高度的星座频率资源，以滚动申报、扩展申报为主，备份申报为辅，实现对中低轨道和极低轨道的 Ka、V、E、W 频段全覆盖。三是优化空间频率资源分配与管理机制，对军用和民用卫星频率资源分配与管理进行顶层规划，加强国内国际轨道协调，确保我国卫星互联网频率轨道资源可用。四是坚持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主导的基本原则，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际频率轨道资源竞争，全面推进我国非静止轨道宽带卫星星座系统在不同轨道的布局。随着中国卫星不断“走出去”，以及欧美国家卫星运营商向亚太地区扩张，国际频率协调日益增多，我国要实现低轨星座互联网建设计划与国际规则的动态匹配，保障频率轨道资料有效性，提升国际话语权，保障我国频率协调利益。

（三）加大投入，努力降低卫星制造成本和发射费用

自动化大批量生产是降低卫星制造成本的关键，我国亟待集中力量进行卫星生产线建设，大幅提升卫星航天信息技术研制效率，适应星座大规模组网建设需求。因此，要加强卫星生产技术攻关，支持整星批量生产线建设，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填补适合低轨卫星的柔性生产线空白。在降低运载火箭发射费用方面，要加快航天运输工业体系由研制型转向批产型，建设基于 5G 的脉动式总装测试生产线，尽快实现中型运载火箭产能大幅增长。加强星箭联合设计，形成更科学的发射布局方案，实现运载能力、整流罩包络的充分利用，更好发挥新一代助力中型运载火箭的组网优势。同时，要按照“军管民建”的思路，在文昌、宁波、海阳等地论证商业发射工位，通过军民融合手段建设商业发射场，形成对现有发射场能力的有力补充。

（四）放宽准入，大力支持低轨卫星企业创新商业模式

适当放宽对民营企业在频率分配、卫星轨位、空间分辨率等方面的限制，尽快制定低轨卫星互联网商业化的实施细则和法规，简化监管框架、政策和审批流程。推动电信运营资质试点，优先向领先民营企业颁发《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试点资质，支持低轨卫星企业有序开展卫星通信基础电信业务，探索民营企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充分调动和发挥民营企业的力量与优势。结合下一代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及工业制造、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发展情况，探索卫星互联网多元化、智能化应用。鼓励国有和民营企业共同探索低轨卫星互联网在航空、航海、环境监测、抢险救灾等领域的应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五）统一标准，加快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标准体系

借鉴我国地面 4G、5G 的成功经验，统筹推进我国卫星互联网标准体系建设，加速推进业务需求、网络、测试、信息安全、应用等系列标准的制定，提高我国低轨卫星企业自身实力。建议相关部门组织行业内知名国企、民企及高校成立我国空间互联网标准体系联盟，下设频率规范组、平台及载荷规范组、协议体系规范组。由联盟单位就关键技术提出草案，组织专家组进行研讨，最终形成标准方案。成立相关认证和评测机构，负责对卫星平台及载荷进行标准认证以及发放发射许可。此外，鼓励和支持相关企业深入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强自主标准体系在国际移动通信、民航、海事等重要领域

的应用与推广，提升我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

（六）强化融合，推动与 5G 网络互补发展、与 6G 网络融合发展

当前，3GPP 在 Rel-16 标准中已经对 5G 卫星接入进行了规范，下一步要积极推进以地面移动通信网络为基础的全球化连接的互联网建设。构建一体化的架构、功能、接口、流程，全面促进低轨卫星与 5G 的终端融合、网络融合、中台融合、网管融合、业务融合，实现用户全球无缝通信连接。支持运营商优先在大城市建设 5G 网络，在偏远地区及跨境区域应用低轨卫星互联网，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达到整体效费比最优。积极探索低轨卫星互联网与 6G 融合体系的构建，支持通信业务多样性接入，满足不同应用和服务需求，充分考虑低轨卫星互联网和 6G 核心网体系架构、通信协议、终端形态和服务方式的融合，探索采用统一的技术架构、技术体制和标准规范综合组网。

（七）倡导开放，推动低轨卫星互联网国际协商与合作

一是遵循开放、协作、共享的原则，倡导各国加强低轨卫星互联网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化发展，避免形成技术壁垒以及空间网络资源浪费。二是推动低轨空间环境治理问题的协商与合作，提炼出低轨卫星在轨服务面临的碎片减缓、污染监管、落区控制等关键法律问题，尽快将其纳入全球治理的法治轨道。三是增强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全球服务能力。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遥感、导航、通信卫星信息的应用需求和市场分析，优先考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跨境物流、船舶通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应急通信等领域提供服务。协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助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

参考文献：

1. 方芳、吴明阁：《“星链”低轨星座的主要发展动向及分析》，《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2021 年第 9 期。
2. 李峰、禹航、丁睿、王宁远、王雨琦、周志成：《我国空间互联网星座系统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工程科学》，2021 年第 4 期。
3. 李喆、孙冀伟、尚炜、李京京：《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对我国商业火箭发展的影响浅析》，《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20 年第 9 期。
4. 李虹、孙一中、贺玉：《低轨卫星互联网融合 5G 信息网络分析与应用》，《卫星应用》，2022 年第 1 期。
5. 兰田、李博：《全球低轨卫星网络最新态势研判》，《国际太空》，2021 年第 10 期。
6. 刘佳：《低轨宽带卫星通信产业发展及前景分析》，《中国新通信》，2021 年第 1 期。
7. 石玉龙、秦迎：《卫星互联网+5G 融合测试及应用前景展望》，《数字通信世界》，2020 年第 8 期。
8. 吴奇龙、龙坤、朱启超：《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领域国际竞争：态势、动因及参与策略》，《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20 年第 6 期。
9. 章罗娜、马忠成、饶建兵、李心蕊、高利春、高铭阳：《低轨卫星互联网发展趋势及市场展望》，《国际太空》，2020 年第 11 期。

责任编辑：郭 霞

推动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的政策建议^{*}

綦鲁明

摘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日益明显，对共同富裕形成重要助力。但从总体看，我国流通体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物流强国的目标要求还不适应，仍面临商品要素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科技赋能水平不高，流通业立法不足，流通服务支撑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以及体制机制改革、市场监管、规划引导、政策支持水平亟需提升等突出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服务新发展格局，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中的关键性引导作用。政府应坚持问题导向，运用产业链供应链“链式”思维，统筹运用政府与市场两方面力量，重点推进建设现代市场体系，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和实施科技赋能，着力完善现代流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加大改革和监管力度，综合施策，有效推动现代流通体系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关键词：现代流通体系 科技赋能 新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綦鲁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研究员。

2020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健全现代流通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论述为新时期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进入新时代，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助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发展现状和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的机遇大于挑战。正确认识我国流通体系的发展现状，把握存在的痛点难点，是发挥政府作用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

^{*} 本文内容为 2021 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建设现代流通体系 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部分研究成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姜增伟副理事长、陈文玲总经济师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对本文内容给予了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一）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一是强大国内市场助力共同富裕局面加快形成。1978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 1559 亿元，2008 年突破 10 万亿元，2019 年为 40.8 万亿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 2020 年，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仍达 39.2 万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32.2 万亿元。^① 可以说，流通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条件和良好基础。二是现代物流的基础作用愈发重要。我国基础设施加快整合、统一发展，物流需求不断增加，一批竞争力较强的现代物流企业快速成长。2020 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300 万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 14.7%。^② 在“十四五”结束后，我国物流总体规模预计将达 360 万亿元，将比 2020 年增加 60 万亿元。^③ 三是综合交通运输能力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超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格局，综合运输大通道正在加快建设，“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取得重要进展，铁路货运量、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快递业务量等指标均稳居世界第一位。四是数字技术应用初见成效。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是现代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目前，我国在综合运输体系、商贸流通体系、社会信用体系、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物流体系等领域的数字赋能越来越多，为更好发挥现代流通体系连接生产与消费、扩大社会交易的功能，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支撑。

（二）建设现代流通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

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流通体系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但面向新阶段，也存在诸多新旧问题，较为突出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商品要素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这主要体现为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垄断行业领域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资金、土地、劳动力、数据等关键要素市场化改革空间巨大。能源、粮食、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供应链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市场价格不能充分体现资源环境成本，生态价值补偿和环境治理激励不足。市场准入隐性壁垒问题仍普遍存在，特别是民营和外资企业在进入一些垄断领域时难以获得同等便利的市场准入条件。流通领域仍存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现象，公平竞争机制远未建立。

二是流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首先，我国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在流通领域的差异尤为明显。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流通体系和供应链发达，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流通网络。中西部地区的流通设施和物流网点，除成都、重庆等一些重点城市外，整体布局仍有较大优化空间。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向西开放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东优西劣”的情况严重制约了我国流通体系的长远发展。其次，城乡流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商业网点建设滞后于消费升级发展需要。农村由于商贸流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以及流通网络布局不完善，特别是“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消费水平远低于城市。

三是流通产业的现代科技支撑依然偏弱。我国不少先进流通企业已采用机器人、大数据、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等现代信息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效益。但从总体看，我国流通体系的科技含量仍然较低，流通产业靠人力及资本驱动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扭转。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市场经营者面临低收益和低盈利带来的生存及发展压力，对需要较大投入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不强，数字化建

①数据来源：万得（Wind）。

②数据来源：Wind。

③佚名：《头条 | 新格局下的挑战与机遇——在 2021 全国汽车零部件物流大会上的致辞》，网易号，2021 年 6 月 12 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GCA9ERGF05507HPG.html>。

设能力也不足。数字化建设不足导致难以形成产地、批发市场和社区超市三者之间的供需数据链，不能实现有效协同互动，由市场需求引导生产的良性局面也就难以形成。

四是物流企业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大。我国物流企业与国际上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物流企业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物流运输效率差距明显，物流成本难以降低。在现阶段，我国大多数物流企业仍沿用传统的粗放式运营方式，规模偏小且分散，物流业的系统性、协调性较低。这导致我国物流企业在国际物流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足，服务能力不足以支撑国内企业“走出去”对物流的需求，甚至难以适应国家经济安全发展的需要。

五是我国流通业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流通业的法律制度建设仍较滞后，对其重视程度也不够，导致流通法律制度不能适应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流通业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层次低、范围窄、形式散，大多以“条例”“办法”等形式存在。从立法层次看，大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属于法律层面的相对较少，法律规范效力不足，标准化程度低。在流通的诸多活动中，如运输、仓储等流通环节，还没有制定完善的流通行业规范，这不仅加大了流通发展的成本，也难以形成行业优势。另外，各部门立法相对独立，并且原则性过强，可操作性不足，导致立法资源浪费。从立法范围看，所涉内容较为狭窄，特别是市场主体准入门槛，消费者安全、健康、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涉及较少，无法满足信息时代流通和消费快速发展的需要。从立法形式看，涉及到流通业的法律条文大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各个章节部分，没有形成一部完整成型的流通行业专业性法律法规。

六是流通标准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在我国流通领域的标准体系建设中，存在着相关标准制修订周期较长、“标龄”高等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问题。发达国家流通体系标准制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3 年，标准的修订一般也在原有标准发布后 5 年内进行。我国相关标准之间还存在不统一的现象，包装、检验等方面标准不统一、不衔接的难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此外，我国流通企业标准化意识不强，很少能够主动将标准化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发达国家的流通企业多将其公司标准作为自身核心技术、企业形象以及商品或服务品牌战略所在。

七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未到位。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提升流通效率，离不开流通体系信用建设。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各地信用建设发展程度不一，各地从事该项工作的具体机构职能还未完善，各地信用信息归集质量及应用情况差异较大。联合惩戒工作还处在探索阶段，缺乏系统协同性和规范性。另外，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诚信修养依然欠缺，社会中尚未形成“不敢失信”的氛围，信用交易风险问题仍然突出。

八是亟需大力提升体制机制改革和市场监管水平。政府对自身在流通中发挥作用的阶段性变化缺乏足够的自觉性。一些政府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存在某种施政惯性，改革初期的一些做法被沿袭下来甚至形成了路径依赖，对改革中的一些过渡性政策没有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推陈出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流通环境、流通结构、流体主体、流通功能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监管手段和治理切入点都有可能失效。适应数字化流通机制创新的监管与治理体系仍不健全，对规范市场、鼓励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支撑作用不强。平台经济监管效果不佳，线上线下监管衔接不畅。

九是亟需大力提升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水平。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流通体系建设，通过发布规划和政策主动担负起市场再造的历史使命。在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流通让位于国际化大生产，政府对流通曾有的规划职能逐渐弱化。例如，政府原有的商业网点规划建设职能消失，导致商业网点建设失控，布局不合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消费不便利。从政策上看，由于流通体系本身带有公益性、社会性等基本属性，需要给予进一步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需要

加大落实保障力度。

二、充分发挥政府在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中关键性引导作用的建议

现代流通能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应进一步强化流通体系支撑作用，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方式，推进流通体系高质量发展，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有力支撑。

（一）借助产业链供应链思维，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促使两者形成分工协作

从历史演变看，流通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但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快速发展和蔓延，流通已经承担起延迟生产的价值生成功能和价值形式转换功能。这意味着流通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各个部分形成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由此，产业链供应链自身兼具的市场属性和公共品属性，也就自然传递赋予了流通。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新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流通领域运行，还是需要本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原则。即在流通领域，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应坚持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应干预；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充分发挥应有作用，弥补市场失灵。

政府需根据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和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需要，积极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政府在现代流通体系中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更好助力构建统一大市场，促进我国流通体系实现系统性全面成长；二是有助于维护现代物流体系乃至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安全发展；三是有助于推进科技赋能流通体系建设，促进流通体系自立自强；四是有助于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解决体制机制瓶颈制约，更好发挥“两只手”的协同作用。不同企业作为产业链供应链上不同业务流程的承担者，则应担负起流通体系的市场属性职责，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实力，按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原则，通过诚信经营，努力开展流通业务，拓展市场空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和现代流通体系健康成长的内生活力；通过不同业务流程的差异性及由之带来的协作可能性，加大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协同推进现代流通体系高质量发展，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需要明确的是，在建设现代流通体系过程中，市场与政府之间不是从属关系，而是根据发展需要发挥各自的应有作用，形成合力。

（二）构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高标准国内统一大市场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建设自由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一是推进重点领域市场化改革。推进铁路、民航、邮政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推动大型流通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市场主体结构。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积极参与流通领域要素市场交易，提供融资、担保、保险等综合服务。完善流通领域数据资源确权、交易、应用等规定，加快培育流通大数据交易平台，保障流通大数据安全，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促进数据资源合规交易、高效利用。

二是提高重要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能力。推进全国性能源、粮食、矿石等资源性产品交易平台建设，稳步扩大上市交易品种范围，形成要素资源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发展跨国大型贸易商，增强其资源整合能力，扩大其经营网络覆盖范围，提高其对大宗商品大规模集中采购进口的掌控能力和对国际价格的影响力。研发推出化工产品、金属材料等大宗商品的航运指数期货等创新产品。推进流通企业商事服务规范化、便利化，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建立商事服务质量第三方评价制度。

三是完善市场准入。落实带有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的“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避免各部门、各地方自行发布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继续放宽准入限制，支持有条件地区开展放宽准入试点。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加快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研究流通领域通用性资格资质清单，统一规范认证程序及管理办法，提升全国互通互认互用效力。

四是大力推进市场公平竞争审查。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实施机制，统筹做好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研究完善流通领域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指引，提升其科学性和规范性，推进流通领域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有效落实。鼓励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审查机制，协助定期评估。

五是加强反垄断执法和立法。反垄断本质上就是反不正当竞争。应依法开展反垄断执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流通企业合规经营。引导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强化跨区域行政执法协同配合机制，形成反垄断执法合力。畅通不正当竞争问题反映和举报通道，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三）加快构建高效、绿色、智能、安全的现代物流体系

遵循物流运行网络化发展趋势，推进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建设，加快构建体现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高质量现代物流体系。一是构建畅通高效的网络化现代物流基础设施。畅通干线物流通道，加快布局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加速补齐经济后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形成一体高效的全国骨干物流设施网络，构建“通道+枢纽”为基础的物流网络运行体系，实现国内国际物流网络融合。加强与国家物流枢纽运行衔接，推进构建冷链物流骨干网络。对接国家物流枢纽，完善区域物流服务网络。大力发展共同配送，提高城市配送效率。强化城乡物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提升末端配送服务能力。

二是创新物流服务模式，拓宽物流服务范围。促进高铁与普铁快运设施网络化协调发展，开展多样式、大批量快件运输试点，加强与存储、分拨、配送等设施衔接，推动铁路快运服务创新。推进高铁快运与电商快递、生产制造等融合发展。推进物流与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营造物流与产业互促发展生态。推广物流集约绿色发展新模式。加快发展智慧物流，提升物流自动化、无人化、智能化水平。支持、鼓励和引导各市场主体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物流服务。

三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群体。支持骨干物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联盟合作等方式加强资源整合。引导龙头企业加快境内外节点设施布局。重点提高大型物流企业在矿石、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国内外采购、运输、仓储等规模化协同化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推进中小微物流企业立足“专精特新”定位及专业服务，构建完善的物流生态体系支撑。全面提升物流企业的全球物流组织管理能力。通过加大全球物流经营战略和策略的科学制定，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推进海外物流园区、仓储中心、配送中心、分拨中心建设，努力打造高标准、高水平的国际智慧物流与供应链服务平台，推动建成统筹国内外、覆盖全世界的富有影响力、绿色低碳的物流网络，提升国际物流供应链的服务效率、国际认可度和自主可控性，全力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培养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经营人才。

四是加强高效应急物流体系建设。完善平急结合应急物资储备系统，重点加强粮食能源、抢险救援、医疗用品等物资储备。优化应急物资储备布局，重点建设完善一批综合应急物资储备库，打造层次分明、类型合理、协同高效的应急物资储备节点网络，确保储备物资常储常新。开拓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有效防范能源、粮食和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产品断供风险。

（四）强化科技赋能现代流通体系

一是大力提升以数字技术为重点的科技应用水平。加快实施流通科技创新战略，推广应用新型流通设施和设备，提高流通全行业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全面系统推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业务数字化转型。引导企业强化数字化思维，加快形成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能力，提升员工数字技能和数据管理能力。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引导城乡实体商业企业积极上线上云，推进线上线下生产消费融合。丰富 5G 物流应用场景，推动实现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智慧物流模式转型，车、货、仓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互动。加快数字化终端设备的普及应用。大力推进“交通新基建”建设。

二是注重提升流通主体科技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鼓励流通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和人力资本投入，推进技术、产品、组织模式、管理模式、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骨干流通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与科研机构建立流通研究院、流通产业创新中心、联合技术中心等，构建产学研用协作新模式，突破流通关键共性技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创新，全面提升流通对产业的支撑作用。打造区域流通业科技创新综合体，带动传统企业实施创新转型。

三是培育科技赋能服务生态。科技赋能现代流通体系，根本是要解决广大流通企业面临的“不会”“不能”“不敢”使用科技的难题。这需要由政府出面，组织建立公共服务与市场化服务双轮驱动，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多要素支撑的科技赋能服务生态。面向流通企业转型升级需求，培育推广一批科技赋能解决方案。聚焦转型咨询、标准制定、测试评估等方向，培育一批第三方专业化服务机构。支持高校、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加强协同，建设综合测试验证环境，加强流通产业共性解决方案供给。建设科技赋能促进中心，衔接集聚各类资源条件，提供科技赋能公共服务。

（五）加快现代流通体系法制建设

按照建立科学有序、持续和谐发展的市场流通体系的要求，重点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家流通业建设、管理和发展的有益经验，制定和颁布与国际接轨、具有国家法律地位的流通业相关法律法规，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和管理纳入法治轨道。探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法》，从行业性质定位到规划布局、政府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准入、运营交易行为、流通秩序、规范标准、商品流通保障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明确各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监管职责，规范引导流通业转型升级，提高服务质量和能力，同时引导企业公平有序竞争，并在竞争中加强协作。立法还应体现和发挥好行业协会作用，明确其性质、地位、设立条件、与政府关系等，明确其工作方式及权利和合规范范围，明确有利于行业协会开展服务的优惠税收制度，明确行业协会的社会公信力。逐步建立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推动行业发展的工作机制。

（六）深化流通重点领域改革

流通体系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大关键薄弱环节改革，更好地推陈出新。一是构建适应数字流通需要的监管与服务。首先，加大对数字化自营零售商的监管与服务，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有序竞争。数字化自营零售商掌握着大量消费者数据，其经营活动又要建立在大数据分析上。数据本身在权利确定和使用规范上的模糊性，不仅会影响流通主体对数据价值的充分开发，也容易出现信息滥用和隐私侵犯行为。此外，零售扩张还暗含着垄断风险，其垄断形式在数字技术帮助下更加隐蔽。这些都需要进行及时有效的防范和治理。其次，加大对零售企业与优质供应商、制造商匹配的服务与监管。由于信息不对称，需要支持供应链服务商的加速孵化，推动供应链公共信息服务和供应链公共平台的供给优

化。适应互联网品牌开发的零售制造趋势，需对零售商资源整合、供应商服务、制造商生产监管上加以统筹规划和重点支持。在以互联网品牌孵化为目标的商业生态构建中，需引入诸如审批、监管、“一站式”以及“点对点”服务等多种创业支持资源。最后，加大全链条、数字化流通机制创新。为促进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数字供应链发展，在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时，需要政府对线上的支付与信息安全、信用认证、网络推广、商品溯源等提供完善的配套支持，从线下的商圈数字化改造、网络基础设施服务、用地规划、周边智能交通建设等方面，给予有效支持。同时，建立跨区域流通合作的协商管理机制，进行流通领域数字资源整合和政府管理职能的优化。设立流通体制改革工作台账，完善评估机制，抓好流通体制改革重大决策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二是以改革推动内外贸流通一体化发展。当前，推进内外贸流通一体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既在于内外生产力水平上存有差异，更重要的则在于内外制度对接和内外市场联动上缺乏有效安排。因此，应加强宏观调控，着重从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衔接上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要按照“同线同标同质”要求生产既能出口又可内销的产品，并扩大适用范围，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实现内外销转型。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和数字服务贸易，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能。加强内外贸一体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此外，要大力推动自贸港、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推动自贸港、自贸试验区开展内外贸一体化探索，再将试点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

（七）大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支撑的流通系统，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体验化、定制化、品牌化、连锁化、去中间化、统一化等趋势。现代流通体系需要有高水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与之相匹配。这就需要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跨区域经营、迁移设置的不合理条件，破除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对外地企业设置的隐性门槛和壁垒；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方便市场主体办理名称登记、信息变更、银行开户、注销等相关手续；持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推进社会投资项目“用地清单制”改革，推动分阶段整合规划、土地、房产、交通、绿化、人防等测绘测量事项；更好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探索适应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的准入准营标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与部分重要贸易伙伴口岸间相关单证联网核查，开展“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优化外商投资和国际人才服务管理，加强涉外商事法律服务；优化经常性涉企服务，推行涉企事项“一照通办”，全面实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快速兑现。同时，防止资本推动大型企业野蛮生长，避免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政府承诺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政府失信补偿、赔偿与追究制度，畅通政府失信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推进政策评估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八）构建社会信用、规则标准以及现代金融战略支撑体系

一是加大现代流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依规归集整合市场主体各类信用信息，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建立行业信用评价模型，分享使用评价结果，支持依法开展形式多样的市场化信用评价，以大数据为支撑实现市场主体精准“信用画像”。建立完善流通企业信用信息记录和披露制度，依法发布失信企业“黑名单”。完善第三方信用评价机制。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以信用建设推进流通安全。

二是着力推进现代流通标准体系建设。由政府主管部门进行顶层设计，行业领军企业和专家参

与，共同推进解决产品运输、包装、检验等方面标准不统一、不衔接等行业发展难题。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标准，完善商品命名、编码、计量等规则和规格、品级等标准，提高流通透明度和效率。推动国家、行业、团体地方和企业标准相互配套、相互补充。建立健全流通数据资源采集传输、链接等规则，提高数据质量和交易规范性。推动基础通用和产业共性物流技术标准优化升级。加大流通领域规则标准实施应用力度，鼓励中介组织发挥行业推动作用，引导产业技术联盟率先推广，支持骨干核心企业示范引领，激发企业应用积极性。推动流通领域加强与生产领域规则标准对接。推动国内外流通规则标准对接，营造高水平经贸规则标准应用软环境。完善流通标准实施的监督和评价制度。

三是强化金融支撑作用。为适应流通对金融支付的特殊需求，应强化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消费金融，以消费金融创新推动加快消费升级步伐，提供更多直达各流通环节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在规范中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能力。

（九）加大政府规划和政策支持力度

满足流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政府应研究制定更适合流通体系发展的规划与相关政策。一是做好科学规划。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凝聚共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推动现代流通体系硬件软件主体框架建设。应做好现代物流体系、综合交通体系等方面的全国布局设计。特别注重布局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商业网点及其业态结构，打造集商业、医疗、家政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生活社区。国家有关部委应本着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目标，遵循市场规律，利用统筹规划、顶层管控、区域竞合、市场协调机制制定《城市网点法规》，明确社区服务体系必须占建筑面积的比重，形成各类生产生活要素有序集聚与流动的社区治理结构。做好科技赋能流通体系的整体设计，包括流通节能降耗的目标设定和绿色低碳发展的总体设计。谋划好国内与国际流通对接融合，国内外两个市场有机衔接、两种资源高效流通的顶层设计。同时，有效发挥各类商会、行业协会的市场监管监督作用。组织高校、智库等科研力量，强化现代流通理论与实践研究，逐步建立与现代流通体系相关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加强流通人才培养。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流通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点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慢，效益不高。政府要从财税、金融、土地等政策上对符合规划的建设项目予以支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特别是对居民日常消费所涉及的社区便利店、菜市场、大众餐饮店、洗衣店、家政生活服务等，留出一定面积的网点建设土地，并给予适当财税支持。在实现流通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改善小城镇和乡村的物流基础设施，以及推进和改善乡村道路的等级和质量等方面，也要根据各地情况，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给予适当支持。

参考文献：

1. 陈文玲：《打通双循环的关键堵点》，《北京日报》，2021年1月4日。
2. 祝合良：《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经济日报》，2020年12月21日。
3. 王先庆：《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重心与政策选择——关于现代流通体系理论探索的新框架》，《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第11期。
4. 刘瑞：《打通消除阻碍国内大循环的流通堵点》，《人民论坛》，2021年1月中旬。
5. 王晓东、谢莉娟：《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6. 纪宝成、谢莉娟：《新时代商品流通渠道再考察》，《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7期。

责任编辑：郭霞

加快推动我国服装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探讨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黎智威 胡 雨

摘要：纺织服装产业作为我国产业链完整、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之一，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着不同层面的挑战和机遇。我国服装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缺乏技术创新能力，难以突破国外贸易壁垒。本文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介绍服装产业发展现状，总结其主要特点，深入研究制约服装产业发展的瓶颈，梳理分析出服装产业主要存在综合成本上升明显、产业数字化程度不高、招工困难且不稳定、产业政策支持不到位、仓储物流配套不足、纺织服装企业融资难、品牌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并针对后疫情时代国内服装产业的发展环境，提出壮大服装产业链、强化政策支持、引导产业集聚、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供应链金融、优化仓储物流配套、打造服装区域品牌等对策建议，探索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我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思路。

关键词：纺织服装 时尚产业 产业数字化 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黎智威，广州市番禺区招商办公室投资引进部部长、高级经济师；
胡 雨，广州市番禺区招商办公室投资引进部职员。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服装消费国和生产国。近几年，我国服装产业发展加快，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出口创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服装作为基础可选消费品，行业增长与宏观经济具有较强的关联性。随着后疫情时代服装产业综合成本上升、消费需求不够旺盛等因素影响，服装产业增长较为缓慢。2021 年我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类商品零售额达 9974.6 亿元，同比增长 13.04%，两年平均增长 2.4%，仍低于 2019 年同期增速 0.2 个百分点。但是我国服装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克服了物流不畅、运费飙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诸多困难，表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1 年中国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额达 1702.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93%，两年平均增长 7.7%。纺织服装产业作为我国产业链完整、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之一，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着不同层面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企业成本压力剧增，因疫情造成的原材料采购困难、价格上涨、物流停滞等不利因素导致部分服装生产滞后、工厂无法按期交货等。另一方面我国服装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缺乏技术创新能力，难以突破国外贸易壁垒。因此如何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服装产业数字化转

型，促进我国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纺织服装产业新发展格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课题。

纺织服装产业是广东省广州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制造品类齐全，产业链条完整，交易规模庞大。随着传统制造环节利润缩减，广州市纺织服装产业不断加大资源整合、设计开发、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投入，力争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向产品和服务创新要效益，向资源整合、产业协同要增长，不断弥补产业短板。其中，广州市番禺区是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服装产业集群基地，聚集了一大批服装制造厂和服装制造工人，形成了强大服装供应链，中国高尔夫服饰第一股比音勒芬、全球独角兽企业希音（SHEIN）公司等国内外知名服装企业均在番禺区设立了总部或生产基地。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摸查服装产业现状，剖析制约服装产业发展的瓶颈，探索服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有利于丰富我国服装产业转型发展的理论研究。

一、番禺区服装产业发展现状

（一）服装产业总体概况

服装产业是广州市传统优势产业，纺织服装产业链是番禺区重点打造的 13 条现代产业链之一，也是广州市 21 条重点产业链中时尚产业的重要内容。番禺区拥有较为完整的服装制造产业生态链，形成了从上游纤维加工到研发设计、成衣制造、营销渠道、品牌管理等一系列完善的产业体系。番禺区聚集着一大批中小服装工厂和服装产业工人，这些服装加工厂承担了全国乃至全球快时尚服装相当一部分产能。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3 月，番禺区共有经营范围与服装相关的市场主体 34689 家，其中服装制造类市场主体 7281 家，服装销售类市场主体 27408 家。番禺区服装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南村镇、大龙街、大石街、洛浦街、石碁镇等镇街，尤其是在南村镇塘步东村方圆 3 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中小服装工厂上千家，是广州 13 行等众多专业批发市场及希音供应链的源头工厂（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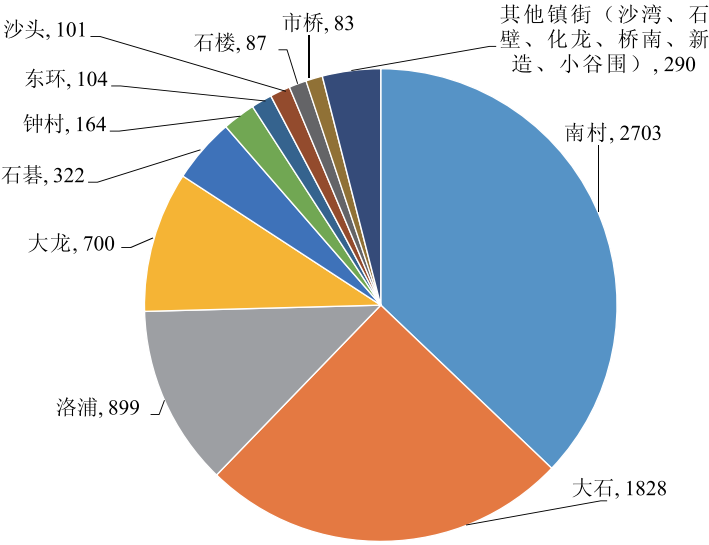


图 1 截至 2022 年 3 月番禺区服装制造类市场主体分布图（个）

数据来源：番禺区统计局及各相关镇街统计办。

（二）服装产业“四上”^①企业情况

据摸查，目前番禺区服装产业“四上”企业共有 199 家，其中 41 家企业是新上规企业，占比 20.6%，表明近年番禺区服装产业增长发展较快。2019 年至 2021 年，番禺区服装产业 199 家“四上”

^①“四上企业”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统计系统的专用称谓，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四类规模以上企业的统称。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分别约为 121.42 亿元、132.50 亿元、185.0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约 9.12% 和 39.62%（详见图 2）；纳税总额分别约为 3.54 亿元、3.95 亿元、5.62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约 11.38% 和 42.44%（详见图 3）。

1. 服装产业“四上”企业营收情况分析

番禺区服装产业“四上”企业 2021 年营收为 20 亿~25 亿元的有比音勒芬 1 家企业，约占 0.5%；15 亿~20 亿元的有广州希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 家企业，约占 0.5%；10 亿~15 亿元的有亘嘉服饰 1 家企业，约占 0.5%；5 亿~10 亿元的有广州希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广检集团等 2 家企业，约占 1%；3 亿~5 亿元的有汇璟服饰、韵华服饰、恒和服饰等 3 家企业，约占 1.5%；2 亿~3 亿元的有布言布语服饰、猜想服饰、细刻网络等 10 家企业，约占 5%；1 亿~2 亿元的有南柒星无纺布、戴利服装、龙倡花边、环亚制衣等 21 家企业，约占 10.6%；5000 万~1 亿元的有捷进制衣、佳达制衣、北欧时刻等 34 家企业，约占 17.1%；5000 万元以下的有冠田纺织、阅尚服饰、哲霖制衣等 126 家企业，约占 63.3%。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番禺区服装产业呈金字塔型分布，处于金字塔顶部的 8 家龙头企业营收约占服装产业“四上”企业营收总额的 43%，龙头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处于金字塔腰部的企业只有 31 家，其余大部分企业营收在 5000 万元以下，说明传统服装企业大部分规模不大（详见图 4）。

2. 服装产业“四上”企业纳税情况分析

番禺区服装产业“四上”企业 2021 年纳税额在 1 亿元以上的有比音勒芬 1 家企业，约占 0.5%；5000 万~1 亿元的有广州希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 1 家企业，约占 0.5%；1000 万~5000 万元的有广州希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广检集团、布言布语服饰等 3 家企业，约占 1.5%；500 万~1000 万元的有猜想服饰、捷进制衣、汇晔电商、赏之析服装等 4 家，约占 2%；100 万~500 万元的有奶糖派服装、天物新材料、朗欧服饰等 59 家，约占 29.7%；100 万元以下的有戴利服装、雅达菲服装、意韵服饰等 131 家，约占 65.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番禺区服装产业的纳税情况与营收情况相匹配，也呈金字塔型分布。纳税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 9 家企业处于金字塔顶部，约占服装产业“四上”企业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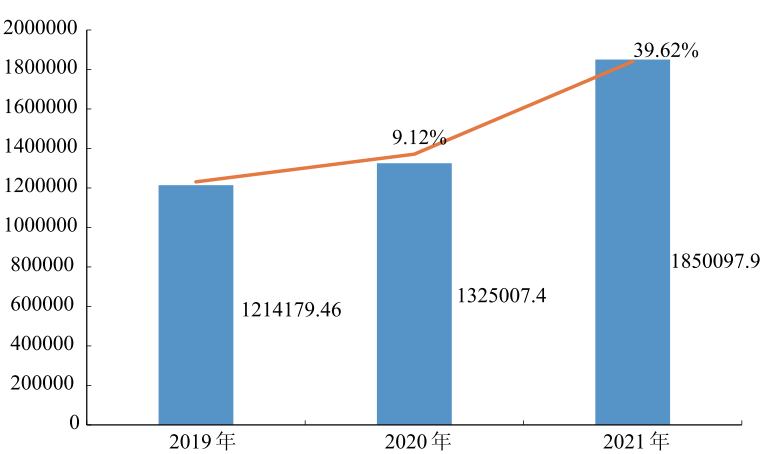


图 2 2019—2021 年番禺区服装产业“四上”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数据来源：番禺区统计局及各相关镇街统计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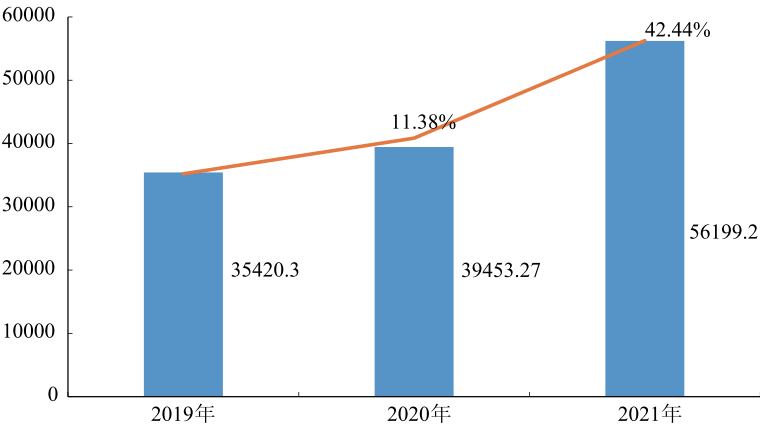


图 3 2019—2021 年番禺区服装产业“四上”企业纳税总额（万元）

数据来源：番禺区税务局。

税总额的 72%，龙头企业税收贡献突出；纳税 100 万元以下的企业占服装产业“四上”企业的绝大部分，说明传统服装企业创税能力较弱（详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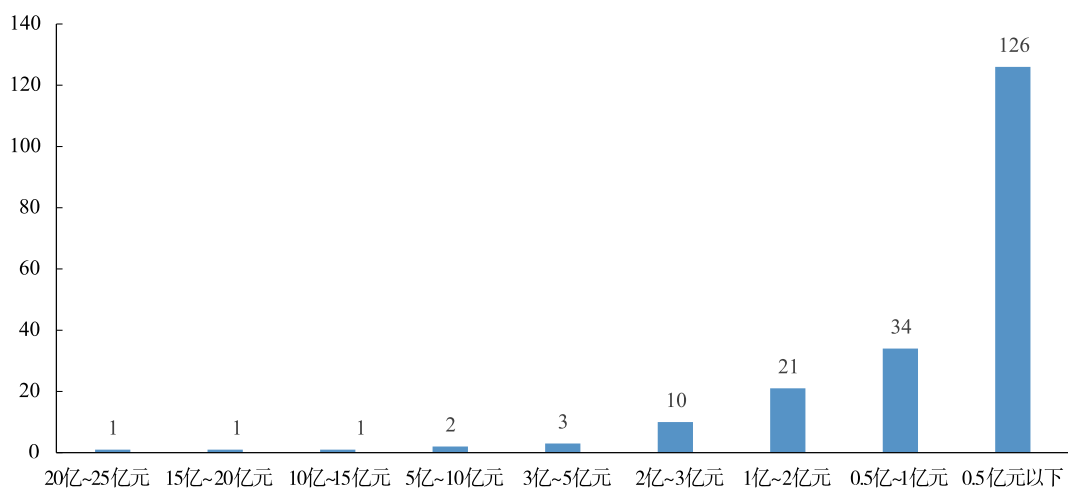


图 4 2021 年番禺区服装产业“四上”企业营收区间结构（个）

数据来源：番禺区统计局及各相关镇街统计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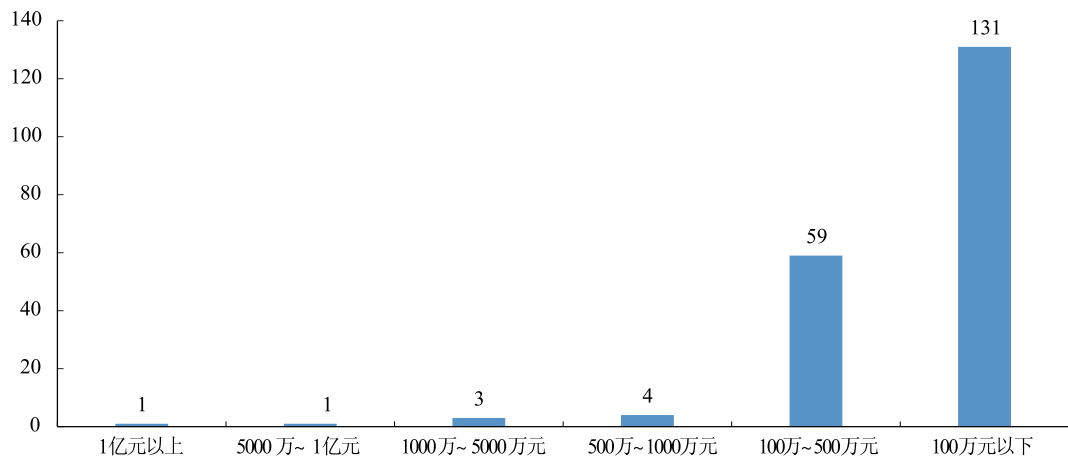


图 5 2021 年番禺区服装行业“四上”企业纳税区间结构（个）

数据来源：番禺区税务局。

二、番禺区服装产业的主要特点

（一）服装产业基础雄厚，产业集聚优势突显

番禺区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服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目前超 3.4 万家服装企业集聚在番禺区，其中有 7281 家为服装制造企业，主要集聚在南村镇、大龙街、大石街、洛浦街、石碁镇等镇街。佳达制衣、捷进制衣、环亚制衣等一批专注于服装制造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实力雄厚；服装批发零售企业、品牌贸易商等在番禺区也分布广泛。番禺区宜业宜居的环境集聚了一大批服装产业的优秀人才，为服装产业集聚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基于服装制造产业基础、区位交通、对外贸易等方面的优势，

番禺区服装制造企业加快向产品设计研发、供应链反应速度、品牌营销等方面转型升级。

（二）服装品牌不断涌现，品牌影响日益提升

番禺区服装品牌经过几十年的沉淀，涌现出一批聚焦快时尚服装产业的新兴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如高尔夫服装龙头企业——比音勒芬；集商品设计、仓储供应链、互联网研发及线上运营于一体的服装出口跨境电商互联网公司——希音公司、细刻网络；淘宝童装第一品牌——辰辰妈；集设计、生产、营销为一体的国内知名女装品牌——诺曼琦、达衣岩、谜底；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在线预约、免费上门量体、全品类服装个性定制生产的商务男装定制品牌——众投科技；为服装企业提供 IE 软件以及精益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整体解决方案——春晓科技；服装数字化龙头服务机构——众创衣联等等。比音勒芬、希音、辰辰妈、诺曼琦、尚捷云等 5 家企业均成为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这些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成为番禺践行“老城市新活力”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实践。

（三）龙头企业带动力强，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服装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是番禺区服装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对服装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日趋明显。如比音勒芬通过赛道精耕、特色创新、科技赋能等方式实现了近 10 年业绩的持续高增长，成为高尔夫运动服饰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具有“专精特新”企业特征。比音勒芬着力打造服装柔性供应链产业集群，建设服装文化产业园区，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服装零售行业智能化发展。希音公司通过自建的数字化供应链与网站、APP 销售自营品牌，目前直接服务全球超 150 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并入选《2021 年全球独角兽榜单》。希音的品牌出海已获得全球海外用户的认可，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产品销售持续增长。希音公司在番禺区拥有一批粘性极高且合作多年的供应商。该公司要求其供应商合规经营，提高服装生产标准，改善生产环境，从而带动番禺区服装制造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四）服装产业链较完备，小单快反的能力强

番禺区拥有强大的服装供应链生态系统，以完整的服装产业链和较低的生活成本集聚了大批优质服装生产工人，保证了服装设计、打样、加工、销售等程序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为服装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奠定基础。而类似希音的跨境电商平台基本是以小批量、多产品、高频次的下单模式，只有番禺区的柔性制造、敏捷供应链才能跟得上。这也是希音公司选择在番禺建立供应链中心的重要原因。如今番禺区已拥有研究、设计、投料、生产、定制、引进、批发、销售等环节配套的完整服装产业链，完成整个服装产业流程最多需时两周，最快只需 7 天，而其他地区至少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番禺区快速、高效、联动等服装供应链优势，是北京、上海等城市难以超越的。

三、当前制约番禺区服装产业发展的瓶颈

（一）综合成本上升明显

服装行业成本不断上升。以往服装面料价格比较稳定，很少出现明显的波动，受疫情和地缘政治危机的影响，占面料生产最多的棉纱和各类化纤制品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从 2021 年初至今，棉花价格上涨了近 1 倍，化纤制品价格涨幅也在 30% 至 50% 之间。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服装企业却往往不敢涨价，无法将成本上升的压力传导至终端销售市场。面临着两头承压的困境，生产企业普遍陷

入利润大幅缩水甚至亏损的境地。番禺区服装企业受扩大生产空间不足、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其他城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因素影响，存在部分企业外迁的风险。

（二）产业数字化程度不高

据统计，番禺区服装企业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的只有 7 家，占服装制造企业不到 1‰。服装制造业目前还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大量中小型服装生产企业，部分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存在，没有现代化的管理体系，难以进行正规的产业管理。服装生产工人学历水平普遍不高，只有小部分服装制造企业配备先进的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和智能制造设备，较高的系统维护与升级成本也成为工厂的较大负担。

（三）招工困难且不稳定

据实地调查，番禺区服装生产企业普遍反映目前服装行业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等现象，一方面部分纺织服装企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使得番禺区纺织服装企业劳动力短缺。目前番禺区服装生产工人以 70 后、80 后为主，年轻一代不愿意进厂工作，导致服装工人出现断代现象。另一方面不少服装生产企业劳动合同制度不健全，为减少用工成本，未及时给工人购买社保、医保、意外保险等，而且工人每天工时较长，收入不高，造成工人工作不稳定。

（四）产业政策支持不到位

番禺区目前还没有出台服装行业相关扶持政策，对服装产业规划、业态定位研究引导不够，相对于广东省其他市区在政府扶持方面较为薄弱。如深圳市在 2020 年发布《深圳市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计划操作规程》，单个项目资助金额最高可达 800 万元；广州市黄埔区在 2022 年 4 月发布了《广州市黄埔区商务局 广州开发区商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扶持奖励最高可达 300 万元；广州市增城区正在制订《广州市增城区服装产业监管和扶持办法》。

（五）仓储物流配套不足

番禺区服装企业普遍反映仓储空间供给不足，成本远高于广州周边城市，而且企业各自租用仓库，未能实现资源的高效共享、协同利用。近期因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成品油价格年初以来也出现多次上调，外贸出口运费持续高企，多家快递物流公司上调运费；再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地区物流不能及时送达，导致客户退货。

（六）纺织服装企业融资难

纺织服装产业是高度市场化竞争的行业，市场集中度低，小微企业数量庞大，行业利润率低，企业生存压力大，处于供应链边缘的中小纺织服装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尤为突出。番禺区纺织服装产业的金融融资体系不够健全，企业资金主要用于原料采购、设备投入和研发生产，多以现金（个人账户）结算为主。以个人账户进行支付结算的收入不能并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流水，导致应税营业收入减少，未能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进而银行难以获取企业真实的经营数据，贷款授信难以审批。

（七）产业集约化程度低

番禺区的服装企业大多分布在南村镇、大石街、洛浦街等城中村内，规模不大、管理不够规范，

产业集约化程度低。由于城中村内住宿、吃饭等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服装产业工人多在此集聚，服装企业开在城中村内也容易招工。南村镇塘步东村、里仁洞村、罗边村、新基村、南村村等纳入旧改范围，城市更新将对番禺区服装产业生态产生较大的影响，城中村内大批与跨境电商平台配套的小微服装工厂必将迎来一轮升级或外迁。

（八）品牌宣传力度不够

目前番禺区服装推介活动较少，缺乏区域品牌整体形象的塑造，除了比音勒芬、希音等几家大品牌，区内大部分服装品牌宣传力度偏少，没有形成宣传效应，时尚之都的定位没有得到强化，难以向国内外展现番禺品牌知名度、产业特色以及完善的服装产业链。

四、推动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

为推动时尚产业发展，我国应发挥服装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大力构建“链长制”，既要切实解决好当前服装企业面临的资金不足、成本上升、企业外迁等问题，又要全力推动服装企业提质量、创品牌、拓市场，加快服装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转型升级，强化产业链招商，打造时尚产业集群，努力形成老产业激活新动能的生动局面。

（一）壮大服装产业链，推动企业规范经营

一是具有服装产业基础的地区可推动服装产业“链长制”构建工作，发挥“链主”的牵引作用，培育一批知名服装龙头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加强顶层设计，实施“一链一策”“一群一策”，汇聚产业链资源，推动数字建“链”、绿色强“链”，共同构建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产业链行业联盟，切实推进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规范服装企业生产经营。部分服装龙头企业正抓紧开展合规性审查工作，要求其供应链企业规范经营、诚信纳税，打造样板工厂，要求今后其供应链企业要按照样板工厂的标准来生产运营。各地应指导服装企业进一步规范经营管理，推动服装行业转型升级。通过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健全社保医保制度，加强工人劳动保障等措施，提高服装工人工作生活幸福感、获得感。各地可探索为服装企业招聘技术工人提供补贴，降低企业人力成本，并在评选劳动模范时给予服装产业工人代表一定的名额，在服装技术人才入户、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支持，增强服装产业工人的荣誉感，提升其社会地位。

（二）强化政策引导支持，培育服装产业龙头

一是围绕鼓励自主创新、人才培养、产业集聚、合规经营、产业数字化、以投促引、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跨境电商等方面，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制订服装产业专项扶持政策，对行业龙头企业予以扶持，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推动有能力的服装供应链企业做强做大，引导企业提高生产、管理、技术、装备水平，构建以质量、创新、人才、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竞争力。二是深入推进服装产业“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一批细分行业和细分市场领军企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三是整理服装行业名优产品名录，加强优质服装产业链供应商与服装品牌企业对接，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实现整条产业链良性发展。

（三）建设服装产业园区，引导产业集聚发展

通过新增工业用地，盘活村级工业园、村留用地，改造升级旧厂房等途径建设服装产业园。各地政府可出台扶持政策，鼓励村集体、持有土地物业的民企、社会资本与服装龙头企业合作，建设服装产业园，在产业区块调整、容积率提升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对园区开发方、入园企业分别给予一定的奖补。完善园区周边交通设施、生活配套和商业服务配套，降低企业及工人的生产、生活成本。遴选适配服装产业链企业进驻，发挥国内服装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集聚中小企业，形成产业链配套完善、中小企业特色鲜明、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完善的新型特色专业园区。

（四）校企合作科研转化，培养服装产业人才

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根据服装产业特点，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一是发挥各地高校、职中资源的优势，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服装企业与学校建立教学实践基地，采取订单式培养服装设计、智能制造等熟手技工；鼓励学校科研团队与服装企业开展项目深度合作，加快技术研究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二是加大就业服务平台的建设力度，鼓励校企举办纺织服装专场招聘会，支持服装相关专业学生在纺织服装企业实习就业。三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遴选服装行业的专业培训机构、知名院校等，面向服装企业免费提供专业人才、跨领域人才、数字化人才以及高管人员的培训服务。四是支持国内外知名设计师、设计机构设立研发基地总部，在产品创意设计等时尚产业上游建立产业型梯队。

（五）加快服装产业数字化，深化工业互联网赋能

在新一轮数字经济革命中，服装产业应以消费者为中心、数字化技术为驱动的全新产业生态进行重组优化。一是鼓励技术创新。支持服装制造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鼓励企业开展智能化成套装备、自动化生产线和生产车间、生产经营信息化及供应链流程重组等改造，各地政府可对服装企业购买高端智能化设备给予一定的补贴，促进传统优势产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机。二是推动智能化改造。利用政策引导，加快服装设计、制造、管理、仓储、物流配送等环节数字化系统集成应用，推动传统服装制造向先进制造、高端制造转型。实施“智造”“定制”“上云”“赋能”计划，加快服装等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三是开展数字化营销。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构建不同的场景，引入云货架、AR 试镜等新兴技术，从视觉、触觉体验入手，力求给消费者“沉浸式”体验的门店服务。支持品牌服装企业通过人工智能改造线下实体店，通过数字化技术对消费者的体验进行管理分析，实现服务智慧化。

（六）以投带引促强链，发展供应链金融

一是实施以投带引，以“招商+投资”为抓手，以“引链”“补链”“强链”为产业投资目标，重点围绕服装产业链缺失环节、薄弱环节开展招商和产业投资，鼓励引导基金投资公司投资服装产业成长性、合规性较好的企业，引导企业品牌经营，上市发展。二是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对接纺织服装企业，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针对本地服装企业的订单、仓单、预付款、应收账款等开发合适的供应链金融产品，支持服装龙头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合理利用产业链数据资源为金融风控提供精准依据，为服装供应链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并加速中小服装企业合规经营、扩大税基。

（七）优化仓储物流配套，服装检测降本提速

一是物流业与纺织服装业实现协同与融合发展，有利于纺织服装业降低成本，深化产业链的分工

合作，优化产业结构。建设现代物流与供应链体系越来越成为服装产业升级和增强竞争力的重点。鼓励建设服装物流仓库，各地政府可探索通过补贴的方式引导国有企业、社会资本利用村级工业园、村留用地、土地物业等，建设服装物流园区或共享云仓。各地政府可牵线本地物流公司与服装企业合作，利用其仓库、车辆、关务、人力及设备资源为广大服装企业提供全流程物流服务，务求降低服装企业仓储、运输成本。二是支持服装企业与本地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签订质检合作协议，以抱团采购的方式降低服装质检价格，缩短质检时间，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八）打造服装区域品牌，拓宽服装销售渠道

一是评选“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县）、特色城（镇）”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为推进服装产业集群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自 2002 年开展至今，已在全国认定了 197 个产业集群。各具有服装产业优势的地方政府可紧抓时尚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启动“中国服装名城”“中国服装名镇”等申报工作，整合产业发展力量，以打造数字时尚先行区为特色，创建区域品牌，助力本地服装产业实现新突破。二是推动区域品牌宣传，着力把重点商圈打造成为服装创新策源地、名牌服装集聚地、时尚潮流引领地，通过引入“时装周”，创办“品牌服装直播大赛”，打造服装品牌一条街、产品展示馆、全球卖家综合服务平台等，提升区域服装品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集中展现服装创新力量、设计力量、品牌力量，擦亮服装产业城市新名片。三是支持外贸新业态对接传统产业链，加快推进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吸引知名直播和跨境电商平台，在拓展国外市场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市场渠道，发展个性化服装品牌，助力打造定制之都，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着力开拓国内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纺织服装产业新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1. 陈雨倩、孙虹、葛王蓉：《数字经济下服装品牌营销策略研究》，《经营与管理》，2021 年第 11 期。
2. 桂晓千：《快时尚品牌 SHEIN 海外营销增长策略分析》，《纺织报告》，2021 年第 7 期。
3. 刘梦晨、刘安、王一珉：《广东构建服装可持续供应链必要性及发展策略》，《纺织报告》，2021 年第 10 期。
4. 缪顾贤、徐和平、冯定忠：《数字经济驱动下长三角纺织服装产业数字化提升路径研究》，《染整技术》2020 年第 3 期。
5. 汪舒明蕊、麦静仪、王亚、刘佳怡、陈娇：《京津冀服装产业链的创新与协同发展对策研究》，《区域经济》，2021 年第 16 期。
6. 鄢飞、雷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区域纺织服装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研究》，《研究与技术》，2021 年第 2 期。
7. 胡小玲：《跨境快时尚品牌 SHEIN 的品牌建设与崛起之道》，《对外经贸实务》，2021 年第 12 期。
8. 殷庆坎、杨熙：《长三角共建世界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推进路径》，《浙江经济》，2021 年第 9 期。
9. 李永华：《跨境电商迅猛崛起背后是中国柔性制造的竞争力》，《中国经济周刊》，2021 年第 22 期。
10. 邢万忠、谭志强、温洪宪、郑建科：《探索珠三角纺织服装产品集群问题》，《西部皮革》，2018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 数字经济 ·

加快农业数字化探索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04—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数字化”内容解读

李 钰 韩一军 刘乃郗 郑天月

摘要：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9 年关注农业数字化，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 6 次提到数字化发展相关问题。加快农业数字化探索，对于缓解中国更加严峻的产业结构、人口、土地、资本的矛盾，保障农业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 2004—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农业数字化的政策，从要素现代化、生产现代化、组织现代化、流通现代化、绿色现代化、融合现代化六个方面剖析了农业数字化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总结了中国农业数字化的发展基础与严峻挑战。总体来看，中国农业数字化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同时也面临土地碎片化程度高、人力资本缺乏、数字农业技术创新不足、数据鸿沟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本文针对加快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提出了加强政策研究与顶层规划、聚焦重点项目与示范推广、加大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多措并举强化保障体系四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数字化 数字技术 数字农业 农业现代化

作者简介：李 钰，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韩一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刘乃郗，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讲师；
郑天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硕士研究生。

引 言

纵观全球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历程，在经历了传统人力畜力农业、生物化学农业、机械农业之后，正大步迈入数字农业的新时代（李道亮，2016；赵春江，2021）。在新发展阶段中，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加上现有互联网已经积累的巨大大网络价值效应，能够更好地应对更加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市场的多重约束，将给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带来巨大变革（阮俊虎等，2020；董春岩等，2020）。全球农业数字化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加快中国农业数字化探索，为中国赶超发达国家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农业对外投资风险防范对策研究”（19AZD012）支持成果。

家，抢占世界农业发展新高地提供了巨大机遇（阮俊虎等，2020）。

关于农业数字化发展的研究也处于初级阶段，但近年来呈现逐渐加速的发展态势。在中国知网以“数字农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① 相关文献共有 2239 篇，其中农业经济领域共有 1307 篇，占比达到 58.37%。近年来农业经济领域关于数字农业的研究迅速增长，2017 年仅有 28 篇，而 2021 年已增加至 387 篇。国内关于数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农业数字发展的经验借鉴（钱静斐、陈秧分，2021；钟文晶等，2021），二是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实践应用，三是数字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汪旭晖等，2020），四是数字农业内在逻辑探讨（阮俊虎等，2020）。而国外学者则更多从技术层面探讨农业数字化，认为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将会给农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减少化肥、农药、劳动力等投入的同时，能够实现产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升，为应对人口增长、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中国人多地少，资源极其紧张，粮食与农产品安全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农业数字化发展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线之一，不仅仅是技术应用层面的生产率提升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系统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9 年提到农业数字化发展问题，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更是 6 次提到农业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发展关键问题。而目前关于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的战略研究仍然较少，农业数字化发展的经济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国情国策背景下实施农业数字化发展有何战略意义，如何实现传统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均值得持续深入地探究。

一、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9 年关注农业数字化发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 2004 年开始，连续 19 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这 19 个中央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三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中之重的地位以及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对中国的“三农”发展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回顾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与农业数字化发展相关的政策表述，对其关键词进行总结，发现 2004—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农业数字化的政策演变具有以下三点特征。

一是农业数字化发展是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连续 19 年提到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经历信息化、智慧化、数字化三个阶段。2004—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信息化建设，探索农业信息化发展路径。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智慧农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2018 年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数字农业”，此后连续 4 年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数字化。从 202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来看，6 次提到数字化，5 次提到智能化，5 次提到信息化，对农业数字化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是从关键词出现频率来看，信息技术装备与农村基础设施是提及次数最多的。通过梳理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频率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信息技术装备与农村基础设施（14 次）、农业信息/数据服务（13 次）、农村信息化示范（7 次）、农业气象（7 次）。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演变，各类关键词的表述也在发生变化。如信息技术装备的内涵不断丰富，2016 年中央一号文

^① 搜索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件首次提及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2017 年首次提出农业装备智能化，2020 年首次提及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5G）。2016 年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变成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2020 年再升级为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此外还将农村信息化示范升级、农业气象升级为数字乡村试点、智慧气象等等。

三是从农业数字化的内容来看，中央一号文件中农业数字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2004—2008 年，中央一号文件侧重于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共提及 4 次。2009—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在于信息技术装备与农村基础设施（8 次）、农业信息服务体系（5 次）。2019—2022 年，信息技术装备与农村基础设施（4 次）、农业信息/数据服务（4 次）、农村信息化示范（3 次）、农业气象（2 次）这 4 类关键词都是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内容，2022 年还增加了数字化培训的内容。由此可见，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数字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中农业数字化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

二、数字化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传统农业普遍存在生产效率低、交易链条冗长、产销信息不对称、产业数字化程度低等问题（汪旭晖等，2020）。21 世纪以来，新兴数字技术已经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与商业生态，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轨式”跨越发展。通过将信息采集技术、网络通信技术、计算技术、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手段与农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土壤学等农业技术有机结合，在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中实现深度融合，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数字化改造（刘海启，2017；阮俊虎等，2020），达到高效配置农业资源，节本增效的目的。具体来看，农业数字化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六方面重要作用。

（一）数字化推动农业要素现代化发展

2013 年、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较为关注农业要素现代化。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导农户采用现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数字技术能够将知识、信息转化为数据，并通过其渗透性、替代性和协同性降低要素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提升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从而促进其他要素流向农业领域。具体来看，农业要素现代化发展主要体现在新的生产要素和促进现代要素聚集两个方面。

一是数据成为新的农业生产要素。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农业生产要素的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字化知识及信息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刘海启，2017；阮俊虎等，2020），为改善农业“弱质性”提供了可能。农业数字化知识及信息包括农业要素数字化和农业模型数字化两部分。农业要素数字化是指将农业生物要素、环境要素、技术要素、社会经济要素等转化为数字资源（阮俊虎等，2020），为实时快速应对环境变化提供基础（汪懋华，2019）。农业模型数字化是指农业过程中的内在规律与外在关系，例如作物（畜禽等）生长规律、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农产品产量与价格的关系等（阮俊虎等，2020）。这些往往属于农业现有知识和涉农专家技术人员的经验，能够为农业运营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二是数字化促进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领域聚集。数字经济本身具有高技术性和高成长性特征，相比于工业和服务业，农业数字化基础最为薄弱，在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中会流入大量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另外，数字经济具有网络化特征，其所构建的高度互联互通的网络化结构具有正外部效应和规模效应。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渗透和农业数字化的不断成熟，也为技术、资本、人才等各类要素的集聚、转移和应用创造良好条件。

（二）数字化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

2021、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两年提到农业生产现代化，即“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数字化能够降低生产环节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通过与传统要素融合，减少农业自然风险损失，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品质。具体来看，农业生产数字化主要体现在生产环境监测和管控、生产资料精准控制、自然风险预警三个方面。一是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产量和品质具有直接影响。农业数字化通过对环境信息、农产品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分析与预测，依托物联网控制系统实现对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管控，实现节本增效。二是生产资料的精准控制有助于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依托无人机遥感与飞防一体化系统、农业信息全景感知的移动传感系统和农业生产要素在线优化调度系统等，可实现对农药、化肥、水资源等要素的优化配置（阮俊虎等，2020）。三是有助于降低自然风险带来的损失。通过自建或接入气象部门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及时预警农业自然风险的发生（何可、宋洪远，2021），提供风险应对方案，最大程度减少病虫害、动物疫病、极端天气等带来的损失。

（三）数字化推动生产组织现代化发展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体系，推动建立统一的农产品供需信息发布制度”。数字化能够有效改善农业投入产出结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减少供需信息不对称，推动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发展。具体来看，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善农业投入产出结构。利用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气象、土壤墒情、作物长势等信息，利用农业大数据模型、人工智能等进行分析和预测，实现农业生产资料的精准施用，强化节本增收效果。二是降低产业链各环节交易成本。数字技术加速了农业产业链的纵向融合，有效降低了农资采购、农业生产、仓储物流、农产品销售等环节的交易成本，进一步优化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和农产品供需结构。三是减少供需信息不对称。借助电子商务平台、社交软件等获取消费者需求信息用以指导作物生产，从而满足市场上定制化、多元化、优质化的消费需求，实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与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数字化推动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发展

中央一号文件高度关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开展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提升行动”。长期以来，中国农产品供需时空错配十分显著，农产品流通结构十分复杂，加之流通基础设施薄弱，数字化水平低，导致流通成本高、产品腐损多、价格波动大，而数字流通发展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短板问题。农产品流通数字化体现在物流数字化、信息数字化和资金流数字化三个方面。一是物流数字化。基于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对仓储和运输两种场景下环境信息、产品信息进行实时精准监测与管控，以达到实现保障品质、减少损耗的目标（阮俊虎等，2020）。二是信息流数字化。在物流数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提升供需信息匹配效率，强化产销对接互联互通，通过平行计算技术避免形成信息聚合垄断，优化供应链的业务流程、交互模式、形成机制，进一步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阮俊虎等，2020）。三是资金流数字化。相较于传统供应链资金流，数字化整合了线上线下大量生产数据和交易数据，建立了更加全局化、个性化的信用评估模型，有助于降低资金流动与交易成本，优化资金使用与风险管理，

提升资金流系统运行效率。

（五）数字化推动农业绿色现代化发展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 3 次提到“绿色”，分别是“大力开展绿色高质高效行动”“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绿色食品和生态农业”，足以看出发展绿色低碳农业的重要性。长期粗放型的农业发展方式导致中国当下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问题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局面，严重制约了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刘泽莹、韩一军，2020；殷浩栋等，2021）。农业数字化利用农业物联网系统精准监测农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阮俊虎等，2020），采用边缘计算、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设计最小化环境负面影响的农业活动实施方案，最后通过配套的控制设施系统实现具体场景中的精准执行。通过改变传统高投入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向集约型精细化生产，有助于缓解当前自然资源 and 生态环境的约束，为促进农业绿色低碳生产提供可行路径。

（六）数字化推动产业融合现代化发展

2015—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 26 次提到“产业融合”，其中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 6 次提到“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指随着不同产业的技术知识、产品业务、消费市场或价值链交叉整合，使得这些产业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的过程（阮俊虎等，2020）。数字化技术推动农业领域形成产业集聚，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演化，最后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一是农业数字化推动农业产业集聚。数字化程度的加深会加快生产要素的低成本集聚性和流动性，加速人才、资本等现代生产要素流向农业部门，提升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农业产业集聚。二是农业数字化促进农业产业集群。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能够实现要素和信息的实时在线化，促进上下游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生产者与消费之间的实时交互，打破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壁垒，实现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三是农业数字化驱动产业融合发展。以具有高渗透性的数字技术为基础，转变传统以工促农的工业化发展逻辑，考虑城乡劳动力资本存在的差异，通过降低专业化门槛允许更多的行业人员参与，从而实现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三、中国农业数字化具有紧迫性

农业数字化是现代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深度应用的结果（刘海启，2017），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线之一。然而中国农业数字化起步较晚，与美日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老龄化兼业化程度加深、缺乏现代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发展滞后等现实困境，应用数字化方案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一）国际视角

1. 谁能解决未来吃饭问题，谁就拥有主动权：全球粮食与食物安全面临更严峻挑战，各国大力攻关突破农业生产时空约束战略制高点

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不可持续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钟文晶等，2021），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全球粮食市场异常波动，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程国强、朱满德，2020；司伟等，2020）。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即农业数字化被认为是缓解粮食安全问题的方案。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农业起步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广播电视、通

信技术、计算机的产生。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0 年 47 个世界主要国家中，英国（29.9%）、德国（24.8%）、韩国（17.4%）第一产业数字经济占比位列前三。中国第一产业数字经济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① 相比于工业和服务业，农业数字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但发展潜力巨大。随着全球数字化的不断推进，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先后推出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计划，以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钱静斐、陈秧分，2021）。为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加快推动中国农业数字化进程迫在眉睫。

2. 谁能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谁就占据优势位：全球农业产业结构重大调整机遇期来临，各国加快数字农业创新打造价值链新高地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李伟、隆国强等，2018），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进数字化创新发展。2019 年日本农林水产省上线“农业数据协作平台”，在大数据模型预测、农机资源共享、农场智能管理等方面应用效果显著，区域覆盖率达到 85%（董春岩等，2020）。2021 年美国开始实施“农业创新议程”，将数字化和自动化作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创新工具（钱静斐、陈秧分，2021）。目前，国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数字种植业、以德国为代表的数字养殖业、以荷兰为代表的智能温室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小型智能装备已经发展相对成熟（赵春江，2021），而中国数字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新兴数字技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全球农业产业格局将被重塑，中国农业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加快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抢占农业价值链新高地刻不容缓。

3. 谁能掌握育种基因信息，谁就掌握安全码：全球农作物育种基因编码科技加速集聚，各国加强育种基因数据治理构建安全防线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生物育种技术是发展现代种业、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支撑。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生物育种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种业进入育种“4.0 时代”。《生物育种产业专利导航研究成果》数据显示，生物育种产业近十年来专利数量快速增长，中国生物育种专利申请量达到 17.2 万件，排名第一，占专利申请总量的 27%。^② 但中国核心专利数量较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且专利主要布局在国内，全球竞争能力不足。在各国加强生物育种技术专利壁垒的严峻形势下，抢占生物育种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制高点，对于实现国家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尤为重要。

（二）国内视角

1. 谁来种地：老龄化兼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数字化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力

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尤其是在“十四五”以后，“65 后”进入 60 岁，“75 后”进入 50 岁，“85 后”进入 40 岁，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将缺少会农务、知农艺、懂农业的劳动力。工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单位时间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吸引农村年轻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返乡务农的高龄劳动力将会增多，成为小规模兼业农户（叶兴庆，2021）。数字技术能够实现农业标准化、专

^①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2019 年中国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 8.2%，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 13.3%。

^②李铎：《〈生物育种产业专利导航研究成果〉报告发布，亮点有哪些》，人民资讯，2021 年 11 月 16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549709238727408&wfr=baike>。

业化生产，提升生产效率与规模集约化水平，缓解人的矛盾。如智能决策系统有机结合了农机农艺与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生产从主观经验主导向客观数据支撑方向升级，避免传统农业依靠个人经验积累来决策和执行所带来的整体生产环节波动性大、效率低下及质量无法控制等难题。

2. 用什么地来种地：土地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数字化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外流等趋势下，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零碎的、质量较差的耕地容易被撂荒。再结合中国地少人多、小农经营的基本国情，通过土地整合实现规模化生产经营的成本较高，农业土地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数字化发展通过数据信息整合，进一步突破农业生产的时空约束，提高市场配置效率，缓解地的矛盾。通过引入土地信息管理平台，利用物联网、区块链、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监测土地数量和质量、土地所有权、土地利用性质等信息，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增加经济效益。

3. 用什么资本来种地：农业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不健全，数字化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农业生产长期存在非标准化、专业化不足等问题，无法实现与现代金融资本市场的有效衔接，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外逃、服务非农等现象普遍发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21 年四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等农合机构和村镇银行在所有机构类型中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为 186 家和 103 家，资产占本类型机构的 5%、7%。农村金融发展困境主要有三点：一是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Stiglitz and Weiss，1981）；二是基础金融服务不足，交易成本高；三是缺少风险分担机制。数字技术能够为农村金融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利用互联网获取农户农业生产、个人信用等信息，优化风险管理策略；二是通过手机银行为农户提供实时在线服务，并根据农户需求实施精准营销；三是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有效确保交易真实性，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模型。

4. 如何更高效种地：农业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数字化能够加快推进产业现代化转型

农业数字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中国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8.2%、19.5% 和 37.8%。固定成本低、交易成本高的服务业更易于进行数字化转型，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车辆、能源行业应用的发展也加快了工业数字化的步伐。考虑到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生产经营方式单一等行业属性，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壁垒较高，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补齐农业数字化短板，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产业结构矛盾，推动工业和服务业进一步迈向现代化，助力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四、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的良好基础与艰巨挑战

数字化是破解农业发展瓶颈的重要手段。随着数字化技术不断成熟，中国二三产业数字化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农村地区光纤、4G 等数字基础设施全面覆盖，农业生产机械化规模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领域数字化应用成效显著。总体来看，中国农业数字化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同时也面临土地碎片化程度高、人力资本缺乏、数字农业技术创新不足、数据鸿沟加剧等一系列挑战。

（一）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具备良好基础

一是中国工业数字化与服务业数字化发展全球领先。随着数字化革命加速渗透和中国营商环境持

续改善，中国工业数字化与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迅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目前全球有超过 300 个工业互联网平台，^① 而中国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150 家，接入设备总量超过 7600 万台套，已经形成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体系化布局。^②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球服务业数字化率爆发性增长，2020 年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占比达到 43.9%。^③ 从发展趋势上来看，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生活性服务业向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加速拓展。根据安永数据，全球金融科技用户平均采用率由 2015 年的 16% 上升至 2019 年的 64%，中国和印度的金融科技采用率达到 87%，并列全球第一。

二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供给能力基本建成。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依赖于对数据的获取、流通和应用能力，而这主要取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数字化是数字化与农业融合发展的结果，需要较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持。近年来，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的渗透发展速度非常快，城乡差距持续缩小（李灯华、许世卫，2022）。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目前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的比例均超过了 99%。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 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7.6%，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 2017 年缩小 12.9 个百分点。^④

三是农业生产规模化与机械化迈上新台阶。当前中国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进入新阶段。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2016 年耕地规模化比重为 28.6%，而生猪、家禽养殖规模化比重分别为 62.9% 和 73.9%。截至 2021 年 9 月底，中国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为 134.3 亩，^⑤ 经营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26.61%。中国农业生产已进入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2020 年中国各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超过 80%，小麦、水稻、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超 95%、85%、90%。^⑥ 根据《2020 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1.25%，其中机耕率、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 85.49%、58.98%、64.56%。

四是农业数字化技术与模式探索应用蓬勃发展。近年来，中国农业数字化技术研发成效显著，在农业环境传感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农机、大型温室等设施设备基本实现自主技术自主生产，在农业大数据挖掘、智能算法、预训练模型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大田种植、设施农业、信息服务等领域进行了初步探索应用。在东北、西北、黄淮海平原等大田生产领域，通过广泛应用遥感监测、农机北斗导航作业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实现大田精准作业（赵春江，2021）。在设施养殖领域，开展基于个体生长特征监测的饲料自动配置、精准饲喂，基于个体生理信息实时监测的疾病诊断和面向群体养殖的疫情预测预报（李道亮，2015）。在设施园艺领域，目前所有的现代玻璃温室和 40% 的日光温室均采用了环境监测、水肥一体化技术；设施食用菌产业也广泛应用了信息技术进行产

①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年）》，全球已有超过 300 个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国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平台接近 100 个。

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2022 年 2 月 25 日。

③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年）》，中国信通院网站，2022 年 7 月。

④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情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2022 年 2 月 25 日。

⑤佚名：《家庭农场超 380 万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 223 万家》，中国农民合作社网，2021 年 12 月 23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9865243748766755&wfr=spider&for=pc>。

⑥佚名：《中国农民挑起“金扁担”》，人民网，2021 年 8 月 10 日。

量和品质的控制。在农业农村信息服务领域，通过机器学习、时空大数据挖掘、知识图谱构建，语音智能识别等技术的应用，实现个性化精准服务（赵春江，2021）。

（二）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面临艰巨挑战

一是耕地碎片化比例大，土地集约化经营成本高。“大国小农”仍是中国基本国情农情。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土地流转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途径。农业农村部家庭农场监测数据显示，全国约有67.4%的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来自农村土地流转。土地细碎化、分散化经营，增加了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集约化经营的成本，对农业经营收入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影响。

二是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缺乏，农业数字化应用能力不高。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不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劳动力老龄化与兼业化趋势愈发显著。从劳动力年龄结构来看，农村地区已经率先进入中度老龄化。^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达到23.81%、17.72%，比城镇高出7.99、6.61个百分点。^②从劳动力兼业结构来看，农业内部呈现纯农户和高度兼业农户比例不断下降、非农户比例不断上升的分化态势。2003年中国非农户占比仅为33.28%，2016年非农户占比增加到64.04%，年均增长率为5.16%。农户家庭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从2003年的44.06%下降到2016年的29.81%。另一方面大多数涉农主体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尚不具备从事高科技型农业的素质和能力。既不能接受农业数字化转型、又不能驾驭数字农业，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刘元胜，2020）。

三是数字农业技术创新不足，技术普适性与经济可行性差。相比于工业和服务业，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研发瓶颈尚未突破，缺乏经济可行性和技术普适性。目前市场上已有的农业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售价过高，考虑到农业生产周期较长，无法在短期内收回投资成本，农业经营主体采用农业数字化技术的意愿不强。大多数农业装备业尚未实现数字化转型，仍以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的传统思维组织生产，导致产品无法满足农业数字化转型要求（刘元胜，2020）。数字技术研发人员仍以专业电子信息技术人员为主，更多专注于技术研发，对农业问题缺乏全方位精准的理解，无法把握农业再生产规模，造成数字技术研发成果不适用于农业再生产全过程。具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从业人员对数字技术缺乏深度认识，不能驾驭数字技术从事农业再生产，使农业再生产的数字化科技含量不高（殷浩栋等，2021）。

四是信息有效性供给不足，导致数字鸿沟加剧。目前中国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信息的可接入性即“一级数字鸿沟”已基本填平，但农户的信息利用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农业数字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地区的“二级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加剧了东西部农村地区的不平等。东西部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黄季焜，2021），由高到低明显呈现“东—中—西”的阶梯型空间分布格局；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的数字农业发展处于中等以下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二是加剧了同一地区内部的不平等，如规模种植农户和小农户之间的矛盾。

^①徐阳晨：《七普数据透视破解农村老龄化问题应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形成“养老合力”》，中国妇女网，2021年5月26日，http://www.cnwomen.com.cn/2021/05/26/wap_99226391.html。

^②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1年）。

尽管农业数字化发展有助于农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但却不利于小农获益。数字农业技术需要更高的土地规模和财力，从而将小农排除在收益之外（钟文晶等，2020）。

五、结论与建议

21 世纪以来，全球数字农业的进程不断加快，以美国、日本、德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数字农业发展相对成熟，中国数字农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2004—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9 年强调数字化，足以看出对农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视。农业数字化以数据作为新要素投入，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利用新兴数字化技术对生产环节、流通环节进行实时准确监测与管控，实现绿色、高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带动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加快农业数字化探索，对于缓解中国更加严峻的产业结构、人口、土地、资本的矛盾，保障农业安全、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看，中国工业数字化与服务业数字化发展全球领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供给能力基本建成；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迈上新台阶，农业数字化技术与模式探索应用蓬勃发展，农业数字化发展具备良好基础，但仍然面临土地集约化成本高、数字化应用能力不高、数字化创新能力不足、数字鸿沟加剧等一系列挑战。综上，针对加快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政策研究与顶层规划。全面深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同步推进原则，参照《“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与《“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加快推动《“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与《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实施落地，充分利用产业数字化夯实数字产业化节本增效发展基础，充分利用数字产业化反过来不断提升产业数字化建设水平，积极研究制定出台各层级与区域性特色优势产业数字农业发展政策，强化数字农业发展财政引导与金融支持。同时，需加快农业数据安全立法，加大农业数据安全监管力度，明晰农业数字产权边界，降低农业数据泄露、非法利用的风险。二是聚焦重点项目与示范推广。聚焦粮食安全、食物安全、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发展，加强国家与省市县各级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与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建设，持续打造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实现相关技术产品集成应用示范、中试熟化、标准验证等功能，建设各级特色优势产业大数据平台，推动产业数据汇总集成和开放共享，助力全国农产品统一大市场与农资统一大市场发展，为全国提供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齐头并进的节本增效模式。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开展重点项目示范、专业技能培训等工作，多管齐下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打造农业数字化经营队伍，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升级。三是加大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围绕物联网信息采集技术（高精度环境传感器、红外感应器、物理传感技术、光谱技术、无人机等）、云计算技术（云计算、边缘计算和区块链等）、农业大数据技术（多元融合、数据清洗、数据挖掘、数据繁殖等）、网络通信技术（5G、近场通信、本地互联等）、人工智能（图论算法、运筹优化、遗传算法、机器学习、自组织控制、预训练大模型研发）等方面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鼓励科研院校学科交叉融合，校企合作、产研融合，协同攻关农业产业数字化与农业数字产业化中的“卡脖子”问题，强化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同时也加强推动产业发展成效的科研成果转化，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或创新项目给予产业投融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例外支持，为中国繁杂的农业应用场景提供高效率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也为全球数字农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四是多措并举强化保障体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推进数字发展所需公

共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加快制订及修订各领域、各环节、各品类的农业数字化标准体系。通过财税金融支持引导农业经营主体接入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农业大数据平台，进一步完善数字农业教育、科研、培训、推广体系，在科研项目设立、科研经费分配与人才编制待遇等方面，给予中国数字农业建设所急需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创新人才、农业数字化工程建设人才、农业数字化产业发展人才等优势队伍建设一定的倾斜支持。

参考文献：

1. 李道亮：《互联网+农业：助推农业走进4.0时代》，《农业工程技术》，2016年第3期。
2. 赵春江：《智慧农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3. 阮俊虎、刘天军、冯晓春、乔志伟、霍学喜、朱玉春、胡祥培：《数字农业运营管理：关键问题、理论方法与示范工程》，《管理世界》，2020年第8期。
4. 董春岩、刘佳佳、王小兵：《日本农业数据协作平台建设运营的做法与启示》，《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年第1期。
5. 钱静斐、陈秧分：《典型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建设对我国农业“新基建”的启示》，《科技管理研究》，2021年第23期。
6. 钟文晶、罗必良、谢琳：《数字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改革》，2021年第5期。
7. 汪旭晖、赵博、王新：《数字农业模式创新研究——基于网易味央猪的案例》，《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8期。
8. 刘海启：《加快数字农业建设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增添新动能》，《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年第12期。
9. 汪懋华：《助力乡村振兴 推进“智慧农业”创新发展》，《智慧农业》，2019年第1期。
10. 何可、宋洪远：《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粮食安全：内涵、挑战与政策取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1. 刘泽莹、韩一军：《乡村振兴战略下粮食供给面临的困境与出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2. 殷浩栋、霍鹏、肖荣美、高雨晨：《智慧农业发展的底层逻辑、现实约束与突破路径》，《改革》，2021年第11期。
13. 程国强、朱满德：《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趋势、影响与应对》，《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5期。
14. 司伟、张玉梅、樊胜根：《从全球视角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保障食物和营养安全》，《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3期。
15. 李伟、隆国强、张琦、赵晋平、王金照、赵福军：《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
16. 叶兴庆：《迈向2035年的中国乡村：愿景、挑战与策略》，《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
17. 李灯华、许世卫：《农业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现状研究及展望》，《中国科技论坛》，2022年第2期。
18. 刘元胜：《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效能分析及应对策略》，《经济纵横》，2020年第7期。
19. 黄季焜：《以数字技术引领农业农村创新发展》，《农村工作通讯》，2021年第5期。
20. Stiglitz, J.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

责任编辑：谷 岳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模式与路径研究^{*}

肖 宇 史 楠

摘要：数字时代快速而广泛的产业数字化给商业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客户行为习惯和行业竞争格局，以及国际环境变化是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探索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中国商业银行逐渐探索出了全能金融航母、专业服务外包和纯互联网基因三种模式。从国际范围来看，高度重视银行服务数字化趋势，放宽准入鼓励市场竞争，增加投入应对数字化挑战，建立敏捷柔性的银行服务体系，创新监管方式应对风险新形态，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应对数字化冲击的标准动作。但作为一个新事物，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还存在着数字战略与实际业务联系不够紧密、资源投入不足、软硬件实力和西方相比仍有差距以及监管相对滞后等短板。在对国际经验进行归纳分析后，本文提出从加强基础技术研发，强化数字赋能和构建数字治理体系三个角度采取有力措施推动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商业银行 数字赋能 敏捷银行 开放银行 数字治理

作者简介：肖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史楠，中国银河证券广东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一、引言与文献评述

在数字技术加速创新的推动下，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组织方式变革。起源于公元前 6 世纪古巴比伦货币兑换，萌芽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贸易，到成型于 17 世纪早期金匠铺发行“兑换卷”，再到 20 世纪中后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壮大的银行服务业，正在走向时代变革的风口浪尖。这主要是因为，网络和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服务业低效率的性质（江小涓、罗立彬，2019），愈加普遍的金融脱媒和不断涌现的跨界竞争，使得商业银行不得不走上了数字化发展的激烈赛道。尤其是 2020 年在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迫切和必要。就微观主体而言，商业银行业务离柜率不断攀升，过去赖以依存的物理网点，正在从利润创造中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双循环与中国周边经济战略体系构建”（2022YQNQD054）的阶段性成果。

心转变为成本中心。数字化时代商业银行该向何处去，已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历史沿革显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基本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个人计算机（PC）出现第一阶段，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第二阶段，以及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第三阶段（肖宇等，2020）。从技术演进视角来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源于金融脱媒。在互联网新势力和消费者习惯改变的步步紧逼之下，各大商业银行都把“触网”转型作为未来战略转型的主攻方向予以推进。尤其是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应用日益广泛，利用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重构银行服务和业务流程愈加紧迫和必要。在学术研究层面，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潜在影响和发展路径等方面做了积极探索。

首先，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字技术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相融合，催生了大量包括安全性和隐私、数据技术、硬件和基础结构、应用程序和管理以及服务模型的金融科技（Keke G et al.，2018），而这些金融科技的出现对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基于国内外日益明显的金融脱媒现象，有国内学者利用2011—2018年210家中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在非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金融科技发展显著削弱了银行绩效（王蕊、康靖，2021）。这主要是由于，作为金融创新和金融技术发展的新品种，金融科技（FinTech）的出现挑战了现有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Dimitrios S & Anne - laure M，2018）。

其次，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和作用路径分析。在围绕如何提质增效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采用先进的系统和技术，可以帮助提升所提供产品的市场治理效能并显著降低生产成本（Teece D. J.，1997）。数字化发展降低了交易双方的信息匹配成本，提升了沟通效率（范鑫，2020）。进一步的研究明确，金融数字化对银行的影响路径，主要是数字金融发展导致的“经济压力”促进银行产品创新，而“社会压力”机制则对银行在管理和产品上的数字化创新均产生积极影响（王诗卉、谢绚丽，2021）。不难发现，现有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的主要影响在于降低成本和提升创新能力。

最后，关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选择和存在问题的研究。至于不同商业银行自身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存在异质性，有研究从商业银行不同资产规模出发，认为大中型银行应该选择闭环生态型或开放生态型银行战略，小型银行最好是选择细分市场型或垂直分工型银行战略（谢治春等，2018）。这也就是说，即使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来说非常重要，但考虑到不同商业银行资源禀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统一模式。这需要商业银行基于自身的发展需要进行有针对性地探索。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目前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还存在着AI能力碎片化、人员技能老化、数据大规模协助困难和建模工具杂乱导致业务上推广困难等多个问题（陈宇翔，2021）。综合来看，中国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还处于行业发展的初期，虽然大量商业银行都认识到了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尚处于探索期。

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就商业银行而言，随着中国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直接融资模式日渐兴起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整体提速的大环境，使得留给中国商业银行的“垄断红利”已经不多，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应该是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最为迫切的紧要任务。

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内涵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根本原因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者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商业银行作为资金融通的中介，是整个经济循环体系中生产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的生产关系中，商业银行依托物理网点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为生产者和资金供给方提供撮合服务。但是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资金的融通正在日益突破原有的物理和时空限制。这直接导致了银行物理网点从原有的利润创造中心向成本中心转变。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企业和居民个人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依托数字渠道消费金融产品。对于商业银行自身来说，数字化也给自己的传统业务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从银行战略布局来看，过去赖以生存的物理网点获客来源锐减，大量业务流量来源于数字化和便利化的互联网终端和数字媒介；另一方面，管理模式也开始面临数字化的深度重构。从负债端来看，货币基金的出现使得商业银行的成本上升。而在资产端，借助于大数据的客户画像，资产管理的效率得以提高。从物理端口解放出的大量人力资源，带来了资产管理成本的结构性变化。在资产和负债两端的发展趋势，折射出了背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革的时代特征。

可以看出，数字化使得商业银行传统业务模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有的生产组织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数字时代获客渠道变化、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和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变革，迫切需要对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和管理架构进行一场数字化的深刻变革。实际上，作为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生产关系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所进行的调整，是社会生产的基本规律。正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和循环往复，最终推动了社会生产不断走向更高阶段和更深层次。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主动进行业务模式和管理架构的调整，是适应数字时代不断变革的全新生产力表现形式，确保社会生产关系与之适应，最终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走向更高水平均衡的正确路径。

（二）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商业银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地位日益突出

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需要的各种经济资源和条件的基本规律显示，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及企业家才能，都是维系社会主体生产经营活动所必备的基本要素。一般来说，投入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产出产品与服务，这种投入产出活动是社会生产的基本逻辑。

商业银行业务虽然名目繁多，但资金中介的本质决定了其依托物理网点获取负债，并经过对资产的期限配置和头寸的精准管理实现收益。在这种商业模式下，获取负债和做大资产规模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生产经营任务。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商业银行需要在投入端进行资金、人力的投放。但是，在数字时代，生产力变化导致了生产关系深度调整，原有生产投入并不能保证过去同等效益产出。

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模式下，数字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所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这主要是因为，借助于先进的数字技术，商业银行可以将其传统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数字化赋能，并继而进行内部生态的数字化改造。从而在内部流程优化再造、客户场景服务和友好有力的外部生态方面，形成全新、开放和高效的现代银行生态体系。

就商业银行而言，进行数字化改造之后更强的数据抓取、存储、分类整理和计算分析，能够大大增强银行业务的数字化能力。比如，通过便携式服务终端，可以让客户享受 24 小时便捷高效的银行服务，而借助于先进的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延伸出的金融科技，还可以实现精准的客户画像，从而提前研判违约风险，大大提高人工授信的效率。

可以说，作为新时代的“石油”，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投入到商业银行中，对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模式、管理方式和生态体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作用恰好是商业银行适应市场需要变化，在供给端所做的主动性调整。而且这种在供给侧进行的结构性调整显然有助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三）推动数字化转型是商业银行应对数字时代市场化竞争的有力手段

以市场机制的发挥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从而实现社会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典型模式。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告诉我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保障。

就银行业而言，经过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深度变革，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中国商业银行从“大一统”格局起步，先后经历了专业化（1978—1993 年）、商业化（1994—2003 年）和市场化（2004—2016 年）改革，逐渐形成了以央行为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平竞争、协调发展新体系（卓尚进，2019）。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在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触及根本核心的改革有两项。其一，毫无疑问当属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此之前，由于存贷款利率的两端限制，商业银行凭借自身渠道优势，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利润。从取消贷款利率浮动下限，到调整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再到改革完善贷款基准利率（LPR）报价机制，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可以说，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息差收窄”，迫使商业银行不得不改变过去粗放型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推动了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也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二，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另一项触及商业银行市场格局的重大改革，当属银行经营牌照的开放。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允许民营企业通过发起设立、认购新股、受让股权、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商业银行增资扩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商业银行重组。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支持民营企业投资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开始，再到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强势崛起，中国商业银行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市场竞争格局。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商业银行外部环境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量金融新势力的崛起，使得商业银行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可以通过数字化赋能，有效盘活存量客户，增强对长尾客户的覆盖能力，通过知识图谱的搭建，全面重塑客户维护、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控制等业务流程，增强银行业务的全场景服务能力，维持和提升自身在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力。

（四）加快数字化转型是全面开放背景下提升中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有着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和发展实践支撑。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讲，扩大开放可以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而借助于外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发展本国经济。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推动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分

工，将自身比较优势最大化的必由之路。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从而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加入世贸组织（WTO）初期，为了保护国内相对弱势的银行服务业，通过对外资银行的展业地域和营业许可进行了循序渐进的开放管理措施。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程度的日益深化，不断扩大的生产要素和产品跨境流动，对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和外资商业银行“引进来”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扩大金融业的开放既是中国引领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更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形势使然。实际上，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跃升，不仅中资企业走出国门的步伐在加快，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实体经济的跨境经营，对中国商业银行全球化运营提出了新的挑战。

放眼全球，考虑到数字化对商业银行服务和业务流程的影响，各大商业银行都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中长期战略予以推进。根据安永的调查，全球 85% 左右的银行都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工作计划的重点，目前有超过 20% 的银行已开展了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布局，并以此推进大规模的数字化转型（王乃嘉，2019）。统计数据发现，银行只要聚焦 20 ~ 30 个核心客户流程改造，就可以大幅降低运营成本（覆盖 40% ~ 50% 成本），并显著提升客户体验（覆盖 80% ~ 90% 的客户活动）（姚瑶，2017）。

在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力度势必会稳步提升。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20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推出了 11 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此背景下，中资企业“走出去”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新需求和外资商业银行进入中国所带来的客观压力，要求商业银行必须直面挑战，抓住产业数字化和时代机遇，真正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国内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模式和突出短板

数字化转型主要是指利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先进的算法等对本企业的传统业务模式进行深度重构，从而提升效力，重塑竞争优势的一种行为模式。布莱特·金（2018）在《银行 4.0》中明确指出，4.0 时代的商业银行服务将无处不在，但就是不在物理网点。在数字化时代，商业银行业务将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柜台服务。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0 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业平均电子渠道分流率为 90.88%。^①

（一）国内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模式

1. 全能金融航母式

这种模式的突出特征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业务模式进行数字化重塑，同时成立金融科技公司，向外输入金融科技产品。采取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国内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大行及部分全国性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工商银行为例，近年来，工商银行大手笔对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了优化，在原有业务架构基础上，整合设立总行金融科技部和业务研发中心，新设全资子公司工银科技（自主经营、市场化运作）和软件开发中心成都、西安研发部，组建金融科技研究院，构建了“一部

^①中国银行业协会：《2020 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21 年。

三中心一公司一研究院”的新格局（马雁，2021），力图通过智慧银行生态系统（ECOS），对整个业务流程进行全面的数字化重构。

四大行之一的中国建设银行早在 2018 年就正式发布《金融科技战略规划》，明确要通过技术与数据的双轮驱动，对内构建协同和进化，对外拓展开放和共享的智慧化、生态化特征明显的现代领先商业银行。根据该战略规划，建设银行 2019 年按照“建生态、搭场景、扩用户”的数字化经营思路，开始了全面数字化经营探索。2020 年以来，建设银行按照打造“业务、数据和技术”三大中台的推进策略，稳步推进信贷数字化工厂建设，开启了金融生态场景化、平台化和数字化再造进程。同时，通过全资子公司建信金科，专注于金融机构核心系统建设、大数据智能风控和互联网金融，以金融科技助力数字化转型。

此外，农业银行数字化战略是按照“互联网化、数据化、智能化和开放化”的思路，力图通过数字化转型，再造一个农业银行。其结合自身服务三农特征，全面推进 5G 智慧网点，通过设立移动服务车，为金融服务空白的偏远地区提供移动金融服务。而中国银行通过“数字中银”战略，利用云计算、区块链、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打造了“数通全球”“数惠民生”“数融 5G”等多项数字化转型和金融服务创新领域成果，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务能力和客户体验。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走在前列的，还有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等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些大型商业银行同样通过自身雄厚的资源储备，利用 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在为本集团提供科技研发和数字化创新工作的同时，也对外提供全方位数字化解决方案。

2. 专业服务外包式

采用这种模式的商业银行主要是以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地区农商银行等区域性银行为主。采用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是自身资源储备无法支撑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而在此过程中大量涌现出的金融科技专业公司，又通过其专业化的服务，满足了市场上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业务需求。考虑到数字化转型所涉及的大量资源投入、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等多种因素，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采用这种模式不仅节省了成本，而且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专业化分工也在无形之中促进了整个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由于客户习惯和行业技术的颠覆性变化，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已经不仅仅是大型银行的主动选择，更是大量中小股份制银行和区域性商业银行为适应时代变化所不得不进行的主动调整。从行业异质性来看，虽然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大量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性农商银行也有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但从能力来看，投入大量研发资金，组建科技团队并不能实现自身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帕累托最优。相反，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势力迅速崛起之后，移动应用程序（APP）逐渐淘汰了流程相对复杂、需要电脑设备才能接入的传统网上银行。这种迎合客户需求，又能通过服务外包降低银行成本的方式，逐渐成为了当前大部分中小股份制和区域性商业银行的首选。

实际上，得益于中国多层次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客户需求的这一变化和中小商业银行转型趋势的另外一个支撑，是中国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的强势崛起。通过购买专业化服务，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性商业银行，可以利用更小成本，实现数字时代的业务流程重塑。

3. 纯互联网基因式

与商业银行基于数字技术对传统生产组织方式的信息技术（IT）改造，以及由此而涌现出的金融电子化、信息化并继而全面数字化不同，纯互联网基因式的商业银行，从诞生开始就是采用了与传统

商业银行截然不同的组织架构和商业模式。在组织架构上，这类商业银行的 IT 人员的重要性要远高于传统商业银行。在风控模式上，依托大数据客户画像，摆脱了过去倚重押品放贷传统模式。同时依托场景建设，也摆脱了无物理实体网点对自身资产和负债管理的局限。

采用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成立于 2016 年，由新希望集团、小米和红旗连锁等股东发起设立的四川首家民营银行新网银行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还有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正式开业的网商银行，由腾讯、百业源和立业等多家企业发起设立，于 2014 年 12 月获得由深圳银监局颁发的金融许可证的国内首家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以及成立于 2017 年，由中信银行和百度联合发起设立的第一家国有控股互联网银行百信银行。如表 1 所示，与传统银行不同的是，纯互联网基因的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开始就通过业务全流程的数字化，实现了弯道超车。比如，与传统商业银行重视物理渠道获客和聘请大量营销人员相比，新网银行的科技人员占比就超过了 50%，设置了技术工程师、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和反欺诈专家等新兴岗位。针对传统银行过于依赖抵押物放款模式，微众银行借助于 AI、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开发了无需抵押和质押，全线上 0 资料，最快 1 分钟到账的“微业贷”，很好地满足了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融资需求。综合来看，借助于数字化技术，纯互联网基因式的商业银行，依托和传统商业银行完全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探索出了一条金融科技应用和开放银行创新的全新路径。

表 1 新型互联网银行业务模式

银行名称	战略定位	典型特征
新网银行	数字科技普惠银行	坚持“移动互联、普惠补位、开放连接”，聚集金融科技和大数据风控，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力量做普惠金融的补位者和探索者
网商银行	互联网银行探索者和普惠金融实践者	将核心系统架构在金融云上。基于金融云计算平台，处理高并发金融交易、海量大数据和弹性扩容，给更多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微众银行	为大众和微小企业提供特色明显的金融服务	通过 AI、区块链底层开源平台、供应链金融和司法存证等区块链技术，以及基于分布式架构的银行核心系统、高扩展性金融云和大数据风控，发展普惠金融
百信银行	AI 驱动的数字普惠银行	致力通过 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探索金融科技和开放银行创新；业务覆盖消费金融、财富管理、汽车金融、小微金融和金融同业等

资料来源：各银行官网。

（二）当前国内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突出短板

一是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业务的实际融合度有待提升。为了应对日益广泛和迅速的数字化转型趋势，从“工农中建”四大行到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再到区域性商业银行，无一例外都把数字化转型作为应对金融脱媒和数字时代跨界竞争的重要战略予以推进。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如何从客户需求出发，将数字化改造与基层的业务实际结合起来，切实把数字化转型与引流、营销与风控结合起来。把数字化转型从战略层面落实到真正的战术级别，真正利用数字化对业务全流程进行数字再造，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都还存在短板。大量同质化的产品与基层营销人员的感知存在差异，为了完成业务指标而硬性摊牌任务的情况还较为普遍。整体来看，数字化转型的碎片化现象严重，高效整合能力不足还较为常见。在构建敏捷高效的资产负债管理、客户关系维护和风险防控体系方面，国内商业银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在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投入上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从科技投入占比来看，国内互联网公司及

互联网商业银行近年来在科技投入方面下足了力气。年报数据显示，以 2019 年为例，微众银行科技投入占营收比重为 8.20%，腾讯、阿里和网商银行同期值均在 8% 以上。相比之下，当年同期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四大行科技投入占营收比重分别为 1.9%、2.5%、2.0% 和 2.1%。在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最大的是招商银行，同期数据为 3.7%。对比之下，为了抢占数字时代战略制高点，将国内规则国际化是美国近年来不断强化数字经济领域资源投入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美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数字化战略，以此鼓励支持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肖宇、夏杰长，2021）。公开数据显示，仅在 2019 年，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营业收入中科技投入占比就已经达到了 8.5%，同期花旗银行（Citibank）的数据是 9.5%。对比来看，中国商业银行在科技投入上的差距较为明显。

三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业银行数字软硬件实力尚存差距。互联网技术兴起于美国，自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一直是计算机软硬件研发和商业化应用的国际规则制定者。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不仅涉及硬件领域的通讯技术和计算机芯片，也涉及应用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等。如，大量商业场景应用需要移动通讯设备做支撑。虽然近年来中国在移动终端研发制造和 5G 新技术研发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核心芯片却一直受制于人。而在软实力方面，由于中国的产业数字化起步较晚，目前只能是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的被动适应者。软实力的匮乏，使得中国商业银行在跨国经营、参与国际竞争方面只能被动适应西方既有规则。面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在日益普遍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态势面前，积极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科技实力和数字规则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是监管与吸纳能力和市场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存在鸿沟。虽然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近年来得到了国家空前重视。但不容置疑地是，作为一个新事物，考虑到“一放就乱”的中国金融改革史，监管部门通常对新兴业务持有谨慎态度，这显然不利于金融创新的发展。为了鼓励创新，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从放宽市场准入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但在新旧行业业态和交叉业务较为普遍的探索期，我们在统一监管规则、确保资本金投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这直接导致了一些行业乱象（郑鑫等，2020）。突出表现在互联网非法集资、大数据杀熟、侵犯消费者个人隐私、数字企业垄断等方面。对于监管层来说，如何在保护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事关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成败。因此，通过监管理念与监管手段的创新，及时吸纳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并根据业务实质，将其纳入金融监管体系。是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监管部门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四、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国际经验

为了应对数字化转型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挑战，西方各国都高度重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从国家、行业到企业层面的积极探索来看，形成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是高度重视银行服务数字化趋势。英国早在 2017 年 3 月就发布了《英国数字化战略》，明确要打造世界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公民的数字素养，支持和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值得强调的是，在该战略规划中，英国政府还明确要不断增强网络安全能力，要通过数字规则制定，确保英国成为全球在线生活和工作最安全的地区。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摩根大通就提出了“移动优先，万物数字化”（Mobile First, Digital Everything）倡议，希望建立与新一代消费者消费行为模式相适应的服务模式。为了应对日益普遍的货币数字化趋势，世界第五大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UFG）计划在 2020

年下半年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综合来看，世界主要国家和全球各大商业银行都将数字化转型上升到了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二是放宽准入鼓励市场竞争。基于对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和金融风险的考量，欧美国家普遍对互联网企业从事金融业务持谨慎态度。但日益普遍的数字化转型，也让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巨大前景。苏格兰银行早在 2013 年就通过简化银行牌照获取流程，降低商业银行新进入者的资本金要求，来推动本国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截至目前，在英国境内已经出现了专注于金融科技和创新的数字银行斯塔林（Statling Bank）和原子银行（Atom Bank），通过数字化终端提供新兴、便捷银行服务。同时为了鼓励开放银行生态体系建设，欧盟发布了《开放银行框架》，明确在经过客户同意后，欧洲银行需要向第三方支付机构开放支付服务和相关客户数据。这为不同的商业生态与银行资源对接搭建了基础性的平台，从而有助于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和敏捷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三是增加投入应对数字化挑战。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广泛的数字化转型，让大部分商业银行认识到了数字化转型的巨大前景。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业高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金融脱媒等多方影响之下，全球主要商业银行都试图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提升自身效益。麦肯锡的调研报告指出，全球领先商业银行每年用于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的投入基本占税前利润的 17% ~ 20%。摩根大通银行于 2016 年提出的“移动优先，万物数字化”战略口号实施至今，摩根大通每年科技投入约占公司营业收入 10%，净利润 40%，公司每年技术研发预算投入都近百亿美元（潘子杰，2020）。

四是建立敏捷柔性的银行服务体系。聚焦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快速地给予反馈是数字化银行与传统银行最大区别。借助于领先的数字化技术为客户提供无缝的体验，已经可以实现让客户决定如何及何时与银行进行互动。典型如被称为“美国最便捷银行”的北美零售银行 TD Bank，其通过互联网、移动和互动工具，极大地便利了银行产品的销售。考虑到商业银行传统组织架构对市场快速变化感知不足问题，荷兰国际集团（ING）将敏捷组织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为此荷兰国际集团借鉴了互联网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将传统职能部门按照数据分析、产品经理和 IT 人员等机构重新组合成了多个“部落和小队”（张石，2019）。采取这一策略的还有老牌银行汇丰银行（HSBC），力图通过 IT 开发和运营全新融合，解决“大象跳舞”问题。通过从原来侧重本地、独立、瀑布式运营的 IT 模式，汇丰银行逐渐转变为“以‘云’为先”、开发和运营综合体（DevOps）式协作组合和敏捷交付的数字银行（Chloe Q，2021）。

五是创新监管方式应对风险新形态。商业银行数字化往往都处于监管空白或者边缘地带，监管不当极易滋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待这一问题，西方国家在鼓励市场创新基础上，普遍采用牌照式监管方法，如在对待没有物理网点的数字银行监管方面，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审慎监管局（PRA）通过颁发银行牌照方式，将数字银行纳入监管体系，规定其必须接受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审慎监管局（PRA）监管。为了保护金融新业态，寻求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还设立了“监管沙盒”，以帮助企业以真实消费者为对象进行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测试。

五、推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为应对快速而广泛的数字化转型，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已是一道必答题。

第一，在宏观层面构建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趋势相适应的系统化规范化数字治理体系。数字经

济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蓬勃发展的传统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新业态，在提高社会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也给政府监管带来了一定挑战。突出表现在消费者隐私保护、数字平台垄断和跨境数据流动所带来的安全议题等领域。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构建与数字特征相适应的治理体系。首先，加强银行数字化转型中的网络空间场治理。随着金融脱媒现象加剧，互联网金融新势力不断崛起，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引流媒介可能带来的金融数据安全、消费者隐私保护、算法陷阱和“信息茧房”等短板需要尽快规范。可通过跨部门政策协调，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可能涉及的金融风险进行沙盘推演，建立“负面清单”和跨部门协调机制，指定统筹负责部门，营造开放、健康、安全数字发展生态体系，防范数字化转型对金融系统可能带来的风险冲击。其次，打造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平衡好创新与数字垄断的关系。对于互联网金融这一新业态，必须秉持服务实体经济，防止监管套利原则。根据金融事实，秉持“实质性原则”，实现银行业务市场准入标准、监管标准和风险管理要求的统一，强化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最后，提升中国数字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加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规则治理，强化算法规则、安全评估和伦理论证等领域的标准制定，探索数字时代商业银行新的监测标准和行为规范，以防范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积极探索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隐私和商业化推广的新规则，探索数字治理国际话语权的“中国版本”。

第二，在中观层面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整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21年底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都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在当前中国直接融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无疑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推动整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首先，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动5G新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庞大数据传输的支撑能力，通过对信息基础设施和对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提升整个行业的自动化容灾监测和秒级切换等能力保障。其次，培育完善的数据交易市场。数据生产要素的估值和市场化交易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如何确保数据流过程中的价值保持，公共普惠数据商业化转换、数据确权模糊、数据开放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多个问题。建立与数字时代要素特征相匹配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通过完善规则提升数据流通效率，探索“数据可用不可见，原始数据不流失”等分级分类交易体系和数据要素的分配规则。最后，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行业标准制定。建立健全以技术管技术和以技术治技术的数字化治理体系，推动完善数字伦理道德规范，建立高效的市场容错反馈机制。构建高效有序的应急响应和处置机制。

第三，在微观层面提升商业银行利用数字技术对业务和管理架构进行数字化赋能再造水平。首先，利用数字技术深度重塑传统业务。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与现有产品和管理架构深度融合。以“体验+安全”“算法+数据”以及“网络+操作”和“生态+开放”理念为基本遵循，优化业务运转和提升前、中、后台业务敏捷化水平。借助于先进算法和大数据，对银行资产管理过程中赖以生存的“抵押品”业务模式进行数字赋能；依托大数据分析、客户画像，建立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现代化银行开放新生态、快速反应的组织结构和数字化风控管理体系。其次，研发真正与用户需求和业务流程高效衔接的数字化产品。数字化转型就是要打破传统业务部门制壁垒，提升IT和产品协同化水平，把数字化转型真正落到实处。从客户需求出发，从一线业务人员反馈出发，加强现有产品数字化转型步伐，利用数字化工具把业务全流程结合起来，如信贷合同无纸化、信息录入电子化、贷后管理智能化等，从而真正适应数字时代日益普遍的银行交易离柜化趋势，培育完整高效场景生态。

最后，量身定制差异化转型策略。根据自身业务规模，制定与需求相匹配的数字化投入策略，尤其是对于中小城商银行而言，盲目扩张和对表大型商业银行并不可取；相反，成熟的技术外包实可借鉴。可以通过与互联网公司和传统商超合作，以联合代替对抗，通过介入线上消费场景，与各类衣食住行用平台，如百度、阿里、京东、腾讯（BAJT）及线下消费场景开展引流服务。

参考文献：

1. 江小涓、罗立彬：《网络时代的服务全球化——新引擎、加速度和大国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2 期。
2. 肖宇、李诗林、梁博：《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银行业金融科技应用：理论逻辑、实践特征与变革路径》，《金融经济研究》，2020 年第 3 期。
3. 王蕊、康靖：《金融科技发展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负相关关系及异质性分析——基于中国 210 家银行面板数据》，《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4. 范鑫：《数字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效率与贸易不确定性》，《财贸经济》，2020 年第 8 期。
5. 王诗卉、谢绚丽：《经济压力还是社会压力：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数字化创新》，《经济学家》，2021 年第 1 期。
6. 谢治春、赵兴庐、刘媛：《金融科技发展与商业银行的数字化战略转型》，《中国软科学》，2018 年第 8 期。
7. 陈宇翔：《金融业 AI 践行与思考》，IBM 网站，2021 年 4 月 25 日。
8. 卓尚进：《回顾历程：看新中国成立 70 年银行业改革发展》，《现代商业银行》，2019 年第 19 期。
9. 王乃嘉：《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国际经验借鉴》，《中国金融电脑》，2019 年第 11 期。
10. 姚瑶：《国际领先银行投入税前利润的 17% ~ 20%，国内银行仅 1% ~ 3%》，《21 世纪经济报道》，2017 年 5 月 10 日。
11. 布莱特·金：《银行 4.0》，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 年。
12. 马雁：《未来三年工商银行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搜狐网，2021 年 7 月 2 日。
13. 肖宇、夏杰长：《数字贸易的全球规则博弈及中国应对》，《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14. 郑鑫、薛同锐、胡慧乐、蔡秀玲：《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收入多元化对我国银行经营风险影响的分析》，《全球化》，2020 年第 5 期。
15. 潘子杰：《国际领先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比较与启示》，《农村金融研究》，2020 年第 10 期。
16. 张石：《探索数字化平台建设之路——从 ING 银行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新金融》，2019 年第 5 期。
17. Chloe Q：《数字化趋势下，HSBC 敏捷转型是如何成功的？》，runwise 网站，2021 年 6 月 22 日。
18. Keke, G., Meikang Q., Xiaotong S., A survey on FinTech. 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2018 (1): 262 - 273.
19. Dimitrios S., Anne Laure M., FinTech: Harnessing Innovation for Financial Inclusion. Handbook of Blockchain, Digital Finance, and Inclusion, 2018 (2): 451 - 461.
20. Teece D J., Pisano G., 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7): 509 - 533.

责任编辑：谷 岳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估计值	2022 年 预测值	2023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 年 10 月)				
世 界	-3.1	6.0	3.2	2.7
发达国家	-4.5	5.2	2.4	1.1
美 国	-3.4	5.7	1.6	1.0
欧元区	-6.3	5.2	3.1	0.5
日 本	-4.5	1.7	1.7	1.6
发展中国家	-2.0	6.6	3.7	3.7
中 国	2.2	8.1	3.2	4.4
印 度	-6.6	8.7	6.8	6.1
俄罗斯	-2.7	4.7	-3.4	-2.3
巴 西	-3.9	4.6	2.8	1.0
南 非	-6.3	4.9	2.1	1.1
世界银行(WB,2022 年 6 月)				
世 界	-3.3	5.7	2.9	3.0
发达国家	-4.6	5.1	2.6	2.2
美 国	-3.4	5.7	2.5	2.4
欧元区	-6.4	5.4	2.5	1.9
日 本	-4.6	1.7	1.7	1.3
发展中国家	-1.6	6.6	3.4	4.2
中 国	2.2	8.1	4.3	5.2
印 度	-6.6	8.7	7.5	7.1
俄罗斯	-2.7	4.7	-8.9	-2.0
巴 西	-3.9	4.6	1.5	0.8
南 非	-6.4	4.9	2.1	1.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22 年 10 月)				
世 界	-3.1	5.9	2.7	1.7
中 国	2.2	8.1	3.2	4.8
美 国	-3.4	5.9	1.7	0.2
欧元区	-6.5	5.2	3.0	0.0
日 本	-4.6	1.7	1.5	1.5
印 度	-6.6	8.7	7.2	5.8
俄罗斯	-2.7	4.7	-6.9	-2.6
巴 西	-3.9	4.6	1.8	0.8
南 非	-6.3	4.9	2.2	1.6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季度。(2)世界银行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半年度。(3)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月度。其中,南非、俄罗斯和巴西数据来自 8 月份报告。

(4)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估计值	2022 年 预测值	2023 年 预测值
世 界	-8.2	10.1	4.3	2.5
进口				
发达国家	-9.0	9.5	6.0	2.0
发展中国家	-8.0	11.8	2.4	3.0
出口				
发达国家	-9.4	8.7	4.2	2.5
发展中国家	-5.2	11.8	3.3	2.9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2 年 10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估计值	2022 年 预测值	2023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 年 10 月)				
世 界	3.2	4.7	8.8	6.5
发达国家	0.7	3.1	7.2	4.4
发展中国家	5.2	5.9	9.9	8.1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22 年 10 月)				
世 界	1.9	3.6	7.4	4.8
美 国	1.2	4.7	8.0	3.9
欧元区	0.3	2.6	8.3	5.8
日 本	0.0	-0.2	2.2	1.6
印 度	6.2	5.5	6.7	5.0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 %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21 年		3.3	2.4	4.1
	9 月	4.1	2.7	5.0
	10 月	4.5	3.5	5.7
	11 月	5.1	4.5	5.8
	12 月	5.5	4.8	6.2
2022 年	1 月	5.9	4.9	6.9
	2 月	6.6	5.6	7.1
	3 月	7.1	6.4	7.5
	4 月	7.6	7.0	8.5
	5 月	8.0	7.7	9.2
	6 月	8.8	8.4	9.6
	7 月	9.2	8.6	9.8
	8 月	9.1	8.7	9.7
	9 月	9.2	8.9	10.0

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21 年		8.6	6.2	11.4			
	9 月	4.1	2.4	4.8	54.1	52.1	53.9
	10 月	3.5	2.1	4.5	54.3	51.5	53.7
	11 月	4.0	2.9	4.9	54.2	52.6	53.3
	12 月	4.0	3.0	4.8	54.3	53.3	53.4
2022 年	1 月	3.9	1.2	6.7	53.2	51.3	52.2
	2 月	5.1	3.5	6.7	53.7	52.2	53.7
	3 月	3.4	1.7	5.6	52.9	50.9	51.4
	4 月	0.6	1.5	-0.6	52.3	48.6	50.5
	5 月	2.3	2.0	3.2	52.3	49.6	50.9
	6 月	2.8	2.1	4.1	52.2	52.4	50.1
	7 月	2.2	1.2	3.5	51.1	50.0	48.9
	8 月	3.4	2.8	3.1	50.3	49.4	48.2
	9 月				49.8	48.8	47.7

注 : (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和 Markit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 (环比)

单位 :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20 年		-2.8	-3.0	2.6
	3 季度	35.3	43.0	-5.9
	4 季度	3.9	3.9	-0.1
2021 年		5.9	8.3	0.6
	1 季度	6.3	10.8	6.5
	2 季度	7.0	12.1	-3.0
	3 季度	2.7	3.0	-0.2
2022 年	4 季度	7.0	3.1	-1.0
	1 季度	-1.6	1.3	-2.3
	2 季度	-0.6	2.0	-1.6
	3 季度	2.6	1.4	2.4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 (环比)

单位 :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2.3	-13.2	-9.0
	3 季度	29.2	59.5	88.2
	4 季度	16.8	24.2	32.9
2021 年		7.4	6.1	14.1
	1 季度	9.7	0.4	7.6
	2 季度	5.8	4.9	7.9
	3 季度	-1.1	-1.1	6.6
2022 年	4 季度	0.6	23.5	18.6
	1 季度	4.8	-4.6	18.4
	2 季度	-5.0	13.8	2.2
	3 季度	-4.9	14.4	-6.9

注 : 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 (表 6、表 7)。
资料来源 :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 (同比)

单位 :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20 年		-2.8	-3.0	2.6
	3 季度	-2.0	-1.7	1.6
	4 季度	-1.5	-1.4	1.0
2021 年		5.9	8.3	0.6
	1 季度	1.2	2.8	1.8
	2 季度	12.5	16.6	-0.7
	3 季度	5.0	7.4	0.7
2022 年	4 季度	5.7	7.2	0.5
	1 季度	3.7	4.8	-1.6
	2 季度	1.8	2.4	-1.3
	3 季度	1.8	2.0	-0.6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 2. 3	- 13. 2	- 9. 0
	3 季度	- 3. 2	- 14. 6	- 8. 4
	4 季度	1. 0	- 10. 0	0. 4
2021 年		7. 4	6. 1	14. 1
	1 季度	4. 1	- 6. 1	5. 7
	2 季度	15. 0	20. 2	30. 5
	3 季度	7. 6	6. 6	13. 3
	4 季度	3. 7	6. 5	10. 1
2022 年				
	1 季度	2. 5	5. 2	12. 7
	2 季度	- 0. 2	7. 3	11. 2
	3 季度	- 1. 2	11. 3	7. 5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21 年			1. 9	5. 4	674. 3
	9 月	- 3. 9	- 0. 4	4. 7	42. 4
	10 月			4. 6	67. 7
	11 月			4. 2	64. 7
	12 月	6. 3	1. 9	3. 9	58. 8
2022 年					
	1 月			4. 0	50. 4
	2 月			3. 8	71. 4
	3 月	- 7. 4	- 0. 6	3. 6	39. 8
	4 月			3. 6	36. 8
	5 月			3. 6	38. 6
	6 月	- 4. 6	- 2. 4	3. 6	29. 3
	7 月			3. 5	53. 7
	8 月			3. 7	31. 5
	9 月			3. 5	26. 3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21 年	23075		4. 5	35919		14. 0	- 12843
8 月	2158	0. 8	22. 5	2873	1. 3	21. 0	- 714
9 月	2116	- 2. 0	16. 7	2900	0. 9	20. 6	- 783
10 月	2259	6. 8	21. 9	2941	1. 4	18. 8	- 682
11 月	2281	1. 0	21. 1	3061	4. 1	20. 8	- 780
12 月	2324	1. 9	19. 8	3113	1. 7	21. 3	- 789
2022 年							
1 月	2278	- 2. 0	15. 3	3158	1. 4	20. 8	- 880
2 月	2327	2. 2	20. 3	3205	1. 5	23. 9	- 878
3 月	2442	4. 9	17. 8	3511	9. 6	27. 5	- 1069
4 月	2518	3. 1	21. 3	3385	- 3. 6	23. 8	- 867
5 月	2545	1. 1	21. 0	3404	0. 6	22. 9	- 859
6 月	2588	1. 7	21. 9	3396	- 0. 2	19. 7	- 809
7 月	2596	0. 3	21. 2	3300	- 2. 8	16. 4	- 705
8 月	2589	- 0. 3	20. 0	3263	- 1. 1	13. 6	- 674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0 年		950	2045	- 1094
	2 季度	131	1502	- 1372
	3 季度	317	595	- 278
	4 季度	337	- 209	546
2021 年		3892	3500	392
	1 季度	737	890	- 153
	2 季度	737	1408	- 671
	3 季度	1219	599	620
	4 季度	1198	603	596
2022 年				
	1 季度	701	993	- 292
	2 季度	702	1194	- 492

注: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20 年		-6.1	-7.7	1.0
	3 季度	12.4	14.1	5.6
	4 季度	-0.3	-2.9	0.9
2021 年		5.3	3.8	4.3
	1 季度	-0.1	-1.9	-0.1
	2 季度	2.0	3.3	2.1
	3 季度	2.3	4.7	-0.2
	4 季度	0.5	-0.2	0.7
2022 年	1 季度	0.6	-0.1	0.2
	2 季度	0.8	1.0	0.6
	3 季度	0.2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6.2	-8.9	-8.5
	2 季度	-19.1	-19.0	-20.5
	3 季度	15.6	16.7	13.2
	4 季度	3.5	4.5	5.7
2021 年		3.6	10.5	8.3
	1 季度	-2.4	0.9	-0.9
	2 季度	1.8	2.5	3.0
	3 季度	-0.7	2.2	2.3
	4 季度	3.4	2.6	4.7
2022 年	1 季度	-0.8	1.5	-0.2
	2 季度	0.7	1.7	1.6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 率	失业人数 (万人)
		环比	同比		
2021 年			3.9	7.7	1261.6
	8 月			7.5	1232.4
	9 月	1.2	1.5	7.4	1207.0
	10 月			7.3	1193.4
	11 月			7.1	1169.6
	12 月	0.0	2.2	7.0	1156.0
2022 年	1 月			6.9	1143.0
	2 月			6.8	1130.5
	3 月	-0.1	2.4	6.8	1124.6
	4 月			6.7	1115.0
	5 月			6.7	1109.1
	6 月	0.5	1.5	6.7	1105.9
	7 月			6.6	1099.6
	8 月			6.6	1096.6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20 年		-6.1	-7.7	1.0
	3 季度	-3.8	-4.5	2.5
	4 季度	-4.1	-7.4	3.3
2021 年		5.3	3.8	4.3
	1 季度	-0.8	-5.0	3.2
	2 季度	14.2	12.3	8.8
	3 季度	3.9	3.0	2.8
	4 季度	4.8	5.9	2.6
2022 年	1 季度	5.5	7.9	2.9
	2 季度	4.3	5.5	1.3
	3 季度	2.1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6.2	-8.9	-8.5
	2 季度	-20.0	-21.4	-21.0
	3 季度	-2.7	-8.6	-8.7
	4 季度	-8.0	-4.1	-7.6
2021 年		3.6	10.5	8.3
	1 季度	-5.5	-0.3	-5.6
	2 季度	18.9	26.2	22.2
	3 季度	2.1	10.5	10.3
	4 季度	2.0	8.4	9.3
2022 年	1 季度	3.6	9.0	10.0
	2 季度	2.6	8.1	8.6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出口额	(%)	(%)	进口额	(%)	(%)	
2021 年	24359		14.1	23141		21.8	1218
8 月	2026	0.1	19.6	1937	2.4	29.4	89
9 月	2026	0.0	10.3	1977	2.0	22.2	50
10 月	2079	2.6	7.5	2080	5.2	25.4	-2
11 月	2150	3.4	14.8	2186	5.1	33.4	-36
12 月	2141	-0.5	14.2	2267	3.7	38.6	-127
2022 年							
1 月	2232	4.2	20.0	2324	2.5	45.8	-93
2 月	2252	0.9	17.5	2376	2.2	40.2	-124
3 月	2277	1.1	14.7	2472	4.0	36.6	-195
4 月	2311	1.5	12.7	2646	7.1	40.5	-335
5 月	2418	4.6	28.6	2712	2.5	53.5	-294
6 月	2415	-0.1	19.9	2747	1.3	44.1	-332
7 月	2372	-1.8	13.1	2777	1.1	43.8	-405
8 月	2455	3.5	24.0	2928	5.5	53.7	-473

注:仅指货物贸易,不包括欧元区 19 国之间的贸易额。月度数据为经季节调整的名义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1 年		-1327	1620	-2947
	8 月	-507	141	-648
	9 月	43	111	-67
	10 月	41	326	-286
	11 月	579	627	-49
	12 月	-1284	-1029	-256
2022 年				
	1 月	512	408	104
	2 月	-118	151	-269
	3 月	-66	-7	-59
	4 月	218	78	139
	5 月	-152	856	-1008
	6 月	-439	-394	-44
	7 月	198	140	58
	8 月	441	595	-154

注:(1)指欧元区 19 个成员国,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2)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20 年		-4.6	-5.2	2.3
	2 季度	-8.1	-8.8	0.5
	3 季度	5.5	5.5	2.1
	4 季度	1.6	1.5	0.8
2021 年		1.7	1.3	2.1
	1 季度	-0.3	-0.6	-0.8
	2 季度	0.4	0.4	0.9
	3 季度	-0.4	-0.9	1.1
2022 年		1.0	2.4	-0.3
	1 季度	0.1	0.3	0.4
	2 季度	0.9	1.2	0.7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4.9	-11.6	-6.7
	2 季度	-3.8	-17.5	-0.9
	3 季度	-1.0	10.0	-7.1
	4 季度	1.0	9.8	6.0
2021 年		-1.4	11.8	5.1
	1 季度	0.6	2.3	1.8
	2 季度	0.3	3.0	4.4
	3 季度	-2.3	0.0	-1.1
2022 年		-0.9	0.6	0.4
	1 季度	-1.0	0.9	3.5
	2 季度	1.2	0.9	0.6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20 年		-4.6	-5.2	2.3
	2 季度	-10.3	-10.6	1.3
	3 季度	-5.4	-6.7	2.7
	4 季度	-0.9	-1.5	3.5
2021 年		1.7	1.3	2.1
	1 季度	-1.7	-3.0	2.6
	2 季度	7.3	6.8	3.0
	3 季度	1.2	0.4	2.0
2022 年		0.5	1.5	0.9
	1 季度	0.6	2.0	2.1
	2 季度	1.6	3.1	1.9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20 年		-4.9	-11.6	-6.7
	2 季度	-6.3	-21.9	-4.2
	3 季度	-8.6	-14.6	-13.5
	4 季度	-2.4	-5.2	-6.7
2021 年		-1.4	11.8	5.1
	1 季度	-3.4	1.9	-0.6
	2 季度	1.3	27.3	5.1
	3 季度	-0.4	15.6	11.4
2022 年		-2.6	5.9	5.2
	1 季度	-4.0	4.5	7.3
	2 季度	-2.6	2.7	3.2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21 年		4.9	1.13	2.8
	9 月	-1.8	1.15	2.8
	10 月	-2.2	1.16	2.7
	11 月	4.9	1.17	2.8
	12 月	0.8	1.17	2.7
2022 年				
	1 月	-0.5	1.20	2.8
	2 月	1.0	1.21	2.7
	3 月	0.1	1.22	2.6
	4 月	-2.2	1.23	2.5
	5 月	-1.2	1.24	2.6
	6 月	-2.9	1.27	2.6
	7 月	-0.7	1.29	2.6
	8 月	3.6	1.32	2.5
	9 月		1.34	2.6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21 年	830914		21.5	847607		24.6	-16694
9 月	67833	-3.6	13.0	73938	1.2	38.4	-6106
10 月	70230	3.5	9.4	74008	0.1	26.8	-3778
11 月	73391	4.5	20.5	78546	6.1	43.8	-5155
12 月	73956	0.8	17.5	78399	-0.2	41.2	-4443
2022 年							
1 月	74291	0.5	9.6	83534	6.6	38.8	-9243
2 月	74971	0.9	19.1	85108	1.9	34.2	-10136
3 月	76333	1.8	14.7	86141	1.2	31.4	-9808
4 月	77574	1.6	12.5	93133	8.1	28.4	-15560
5 月	79588	2.6	15.8	98562	5.8	49.0	-18974
6 月	82867	4.1	19.3	102276	3.8	46.2	-19410
7 月	84639	2.1	19.0	105945	3.6	47.4	-21307
8 月	84068	-0.7	22.0	107446	1.4	49.9	-23378
9 月	86718	3.2	28.9	106816	-0.6	45.9	-20098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1 年		29640	163684	-134044
	8 月	3213	18825	-15612
	9 月	6958	7970	-1012
	10 月	1763	4704	-2941
	11 月	2793	13840	-11047
	12 月	2713	18229	-15516
2022 年				
	1 月	4944	7013	-2069
	2 月	2286	8202	-5916
	3 月	6448	8734	-2286
	4 月	2823	11164	-8341
	5 月	4268	11060	-6792
	6 月	-1926	14662	-16588
	7 月	3137	10248	-7111
	8 月	2586	12225	-9639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20 年		-5.2	-9.3	-6.4	-4.1	-7.3	-3.0
	2 季度	-12.4	-22.6	-17.8	-10.7	-23.8	-7.4
	3 季度	-4.9	-10.3	-6.2	-3.7	-6.6	-3.3
	4 季度	-3.1	-9.2	-4.2	-0.9	0.7	-1.3
2021 年		4.6	7.5	4.9	4.6	8.7	4.7
	1 季度	0.2	-7.8	-2.6	1.3	2.5	-0.3
	2 季度	11.7	24.3	19.1	12.3	20.1	10.5
	3 季度	3.8	8.5	2.9	4.0	8.4	4.0
	4 季度	3.2	8.9	1.7	1.6	5.4	5.0
2022 年							
	1 季度	2.9	10.9	2.7	1.7	4.1	3.5
	2 季度	4.6	4.4	0.2	3.2	13.5	-4.1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加拿大季度数据为年化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20 年		-0.9	-8.2	-6.5	3.4	2.9	-2.1
	3 季度	-1.0	-8.5	-4.1	4.3	2.7	-3.5
	4 季度	-1.1	-4.4	-3.4	5.3	4.5	-2.2
2021 年		4.0	4.8	6.4	6.5	2.6	3.7
	1 季度	1.9	-3.8	8.0	9.2	4.7	-0.7
	2 季度	6.0	19.9	7.6	7.8	6.7	7.1
	3 季度	4.0	4.5	5.4	4.4	-6.0	3.5
	4 季度	4.2	1.1	4.7	5.3	5.2	5.0
2022 年							
	1 季度	3.0	1.8	-3.9	3.7	5.1	5.0
	2 季度	2.9	2.0	-1.3	3.1	7.7	5.4
	3 季度	3.1				13.7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21 年		7.5	4.6	34.3	13.4	7.8	4.8
	9 月	6.9	4.3	34.9	12.6	6.9	4.3
	10 月	6.7	4.2		12.1	7.7	4.3
	11 月	6.0	4.1		11.6	7.0	4.3
	12 月	6.0	4.1	35.3	11.1	7.9	4.3
2022 年							
	1 月	6.5	3.9		11.2	6.6	4.4
	2 月	5.5	3.8		11.2	8.1	4.1
	3 月	5.3	3.7	34.5	11.1	7.6	4.1
	4 月	5.2	3.8		10.5	7.8	4.0
	5 月	5.1	3.8		9.8	7.1	3.9
	6 月	4.9	3.8	33.9	9.3	7.8	3.9
	7 月	4.9	3.6		9.1	6.8	3.9
	8 月	5.4	3.5		8.9	8.3	3.8
	9 月	5.2				6.4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2021 年		3.7	4.1	5.5	4.0		
	9 月	3.0	4.2	4.4	3.9	4.0	6.5
	10 月	3.2	3.9	4.3	3.8		
	11 月	3.1	3.7	4.1	3.7		
	12 月	3.8	3.5	4.0	3.7	3.6	
2022 年							
	1 月	3.6	3.7	3.9	3.7		
	2 月	2.7	3.7	4.5	3.7		
	3 月	2.7	3.0	5.0	3.7	2.5	5.8
	4 月	2.7	3.0	5.4	3.7		
	5 月	2.8	3.3	5.1	3.7		
	6 月	2.9	3.3	4.7	3.7	2.3	
	7 月	2.9	3.4	4.3	3.7		
	8 月	2.5	3.5	4.1	3.7		
	9 月	2.8		3.9	3.6	2.3	

注:(1)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2)韩国、中国香港数据经季节调整。(3)越南为季度数据,印尼为半年度数据。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5034	4992	42	4680	6944	-2263
8 月	425.2	429.7	-4.4	333.1	546.8	-213.6
9 月	413.9	416.7	-2.7	395.8	621.4	-225.7
10 月	455.8	446.3	9.5	466.3	622.3	-156.1
11 月	466.5	449.9	16.7	407.4	651.9	-244.5
12 月	451.0	451.7	-0.7	462.3	622.0	-159.7
2022 年						
1 月	439.5	393.7	45.8	355.6	682.4	-326.8
2 月	433.9	411.3	22.6	389.5	650.3	-260.8
3 月	552.2	529.8	22.4	450.9	804.6	-353.7
4 月	512.2	506.5	5.7	394.1	677.0	-283.0
5 月	558.3	507.4	50.9	453.9	665.6	-211.7
6 月	562.4	532.9	29.6	406.9	670.2	-263.3
7 月	506.6	487.6	19.0	445.0	664.6	-219.6
8 月	503.1	513.6	-10.5	457.8	659.2	-201.4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1226	930	296	2806	2194	612
9 月	107.3	92.3	15.0	243.8	199.8	44.0
10 月	99.6	86.3	13.3	226.0	205.4	20.6
11 月	104.7	81.7	23.1	205.0	216.1	-11.1
12 月	98.1	79.3	18.7	244.3	204.2	40.1
2022 年						
1 月	84.0	81.8	2.3	198.0	198.2	-0.2
2 月	93.3	89.3	4.0	235.1	188.7	46.3
3 月	123.3	93.3	30.0	294.2	218.1	76.1
4 月	100.8	90.5	10.3	290.1	207.6	82.5
5 月	112.7	94.9	17.8	297.3	247.0	50.3
6 月	116.4	101.4	15.0	328.2	238.7	89.5
7 月	104.9	90.3	14.6	299.0	245.1	53.9
8 月	104.7	100.7	4.0	308.0	266.8	41.2
9 月				289.5	249.6	39.9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3912	5747	-1835	4944	3039	1905
9 月	337.9	563.9	-226.0	453.3	255.0	198.2
10 月	356.5	553.7	-197.2	465.8	268.0	197.8
11 月	300.4	529.4	-229.0	489.6	279.0	210.6
12 月	378.1	594.8	-216.7	574.0	306.8	267.2
2022 年						
1 月	345.0	519.3	-174.3	459.3	247.5	211.7
2 月	345.7	554.5	-208.8			
3 月	422.2	607.4	-185.2			
4 月	401.9	603.0	-201.1			
5 月	389.4	632.2	-242.8			
6 月	401.3	663.1	-261.8			
7 月	362.7	662.7	-300.0			
8 月	339.2	619.0	-279.8			
9 月	354.5	611.6	-257.1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6444	6149	296	4942	5037	-95
9 月	559.2	516.4	42.8	417.6	440.8	-23.2
10 月	556.6	538.4	18.2	418.6	446.6	-28.0
11 月	603.5	573.5	30.0	456.5	457.0	-0.5
12 月	607.3	611.8	-4.5	477.1	471.0	6.1
2022 年						
1 月	553.2	602.1	-48.9	339.1	401.9	-62.8
2 月	539.1	530.7	8.4	462.4	449.5	12.9
3 月	634.8	636.2	-1.4	519.1	518.0	1.1
4 月	576.9	603.5	-26.6	474.8	493.6	-18.8
5 月	615.2	632.2	-17.0	500.1	522.2	-22.2
6 月	577.3	602.0	-24.7	512.3	551.9	-39.6
7 月	607.0	653.7	-46.7	465.0	524.6	-59.6
8 月	566.7	661.5	-94.8	506.7	561.7	-55.0
9 月	574.6	612.3	-37.7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6699	7124	-425	4465	3812	653
9 月	599.3	644.1	-44.8	396.3	331.9	64.4
10 月	575.0	616.8	-41.8	401.2	340.1	61.1
11 月	643.7	651.8	-8.2	415.7	357.2	58.5
12 月	651.4	698.9	-47.5	406.9	349.2	57.7
2022 年						
1 月	610.9	606.9	4.0	399.8	349.7	50.1
2 月	419.7	466.7	-46.9	374.5	316.3	58.2
3 月	502.4	549.2	-46.9	435.0	385.9	46.5
4 月	507.7	565.3	-57.6	414.6	365.5	49.1
5 月	514.5	579.5	-65.1	420.5	396.8	24.1
6 月	518.0	617.9	-99.8	422.1	375.9	46.2
7 月	523.6	556.2	-32.6	432.4	382.2	50.2
8 月	521.8	548.1	-26.3	403.3	373.5	29.8
9 月				375.3	325.1	50.2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21 年	3353	3306	46	2298	1960	338
9 月	270.3	266.7	3.6	206.1	162.3	43.8
10 月	288.7	261.3	27.4	220.3	162.9	57.3
11 月	318.7	306.1	12.6	228.4	193.3	35.1
12 月	345.9	316.2	29.7	223.6	213.5	10.1
2022 年						
1 月	308.4	294.5	13.9	191.6	182.1	9.5
2 月	234.2	253.8	-19.6	204.7	166.4	38.3
3 月	347.1	326.6	20.5	265.0	219.7	45.3
4 月	333.2	324.7	8.5	273.2	197.6	75.6
5 月	309.2	326.2	-17.0	215.1	186.1	29.0
6 月	328.4	323.7	4.7	261.5	210.0	51.5
7 月	306.1	305.3	0.8	255.6	213.5	42.1
8 月	349.2	310.6	38.6	278.6	221.5	57.1
9 月	299.4	288.0	11.4	248.0	198.1	49.9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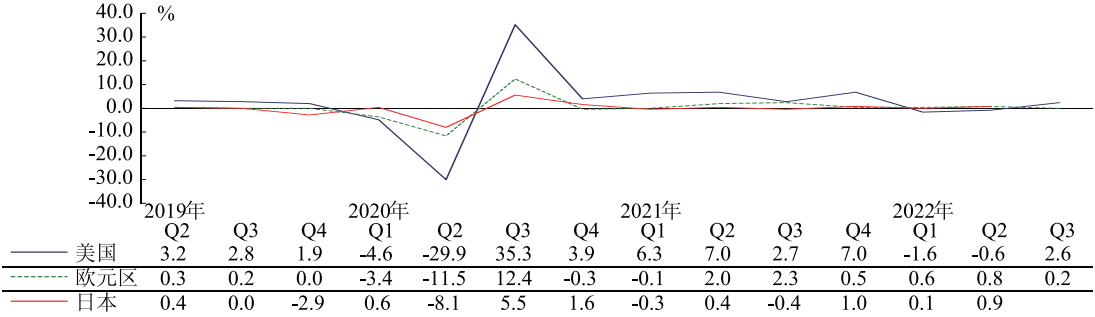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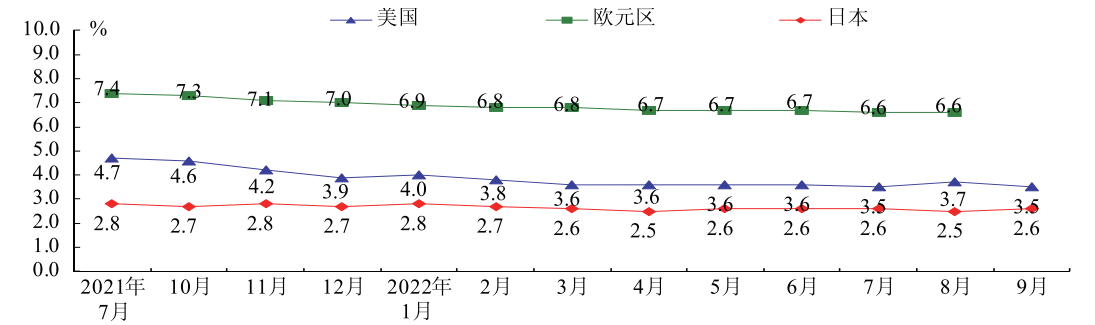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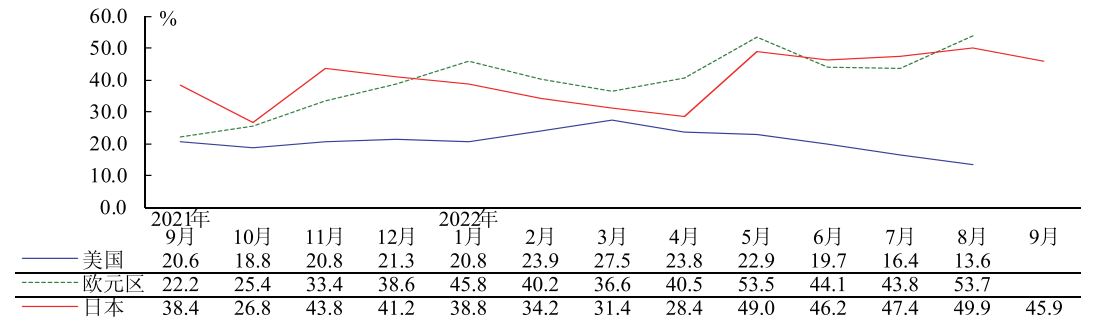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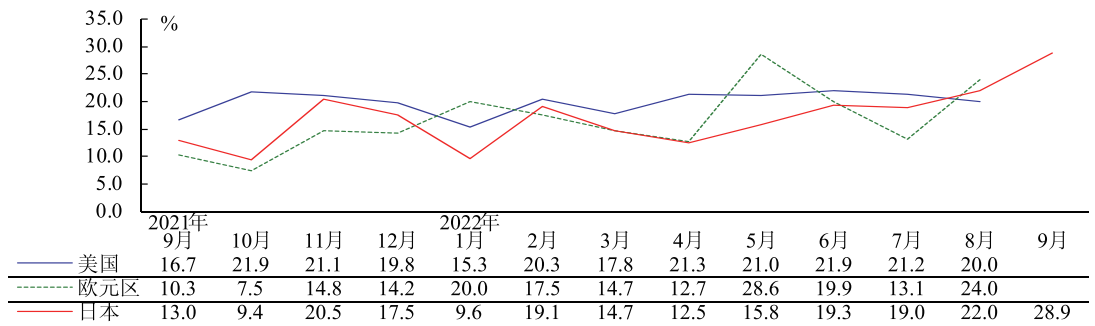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图 1 ~ 图 4)。

ABSTRACTS

(1) Accelerat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regulatory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ong Hai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the role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new growth poi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Compared with other economic zone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a unique foundation for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focus of its financial innovation is to build an open banking system, achieve resource sharing, and first try to carry out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change rate system reform, build a complete financial product and service system serving the economy,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order to avoid the risks brought by the first try,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nova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ust be carried out on the premise of doing a good job of several basic tasks. Through regulatory innovation, standardiz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ill also provide more experience i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for other regions in China to further reform and open up.

(2)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Zhang Shengling , Hao Yu

Since 2020, the global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the greatest uncertainty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due to the repeated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the Ukraine crisis and other factors. Facing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at domestic and abroad,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stable. But it must also be soberly aware that the current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is not only more severe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any time before. Only by correctly judging the sever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clarify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macro economy,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test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alyzing the factor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that affe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clarify the prudent judgment of decision-makers and focus on promoting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go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lv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reflected in the complex social phenomena, then it can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impact of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ccurately grasp the goals and demands of domestic development, solve problems, face difficulties, turn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and move towards a road of stable growth, stable expectation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3) The influ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Japan’s nursing care insuranc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industry

Zhang Jin , Pan Li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ursing Care Insurance Law in Japan,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wer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benefi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insurance system of Japanese nursing care insurance to pay for the rental and purchase of home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for the elderly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funding sources, protection objects, payment content, service delivery, and insurance payment.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e nursing insurance system has played a driving and promo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an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conomic burden of the elder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cultivate a professional talent team. Inspired by the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ursing insurance system in Japan, China should encourage pilot cities for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to include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 in the scope of treatment, formulate a national unified catalogue of assistive device and reference pricing, and in principle focus on services and in-kind payments, and gradually cancel cash payments, set up independent subsidy limits for rehabilitation aids and optimize self-payment

ratios, cultivate and expand professional talent teams, release huge consumption potential, improve cost control policies, and mainta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funds.

(4)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ompetitiveness: indicator construction and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Ni Shuhui , Liu Dongmin

Under the global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only when economies fully understand their own competitiveness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an they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so as to better reflect the contrast and changes in the power of major countrie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s the relative power of various economies to influence the setting of international rul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formal coordination platforms,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gional multilater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ompetitiveness index of 34 major economies is calculat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isting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is still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level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lob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is more concentrat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formal coordination platforms is relatively scattered, and the ranking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gional multilater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has improved most significantly.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China to enhance its own competitiveness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5) The impact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on China's export structure upgrade——Analysis of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digital trade

Yang Hongyue

Since 2017, the United States has started a new round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s, and the target is directed at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to curb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This round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is long-term and complex, but for China, it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forcing Chinese enterprises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their exports.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6 to 2021, us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export structure, and examin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t is empirically found that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technology, country and product structure of China's ex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that is,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 forc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in the re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has beneficially improved the technical content of export commodities and reduced the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by boosting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export structure;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has a significant reverse regulation effect between Sino-US trade friction and export structure upgrade.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ongoing Sino-US trade frictions, which provides a strategic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as a breakthrough to stabilize foreign trade and promote export upgrad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going Sino-US trade frictions.

(6) Research on the business model of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overseas warehouse" —— Technical path based on core capability building

Wang Lihe , Song Lini , Han Yuanyuan

With the deepening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overseas warehous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and new engin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The COVID-19 has objectively accelerated the strong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trad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overseas warehouse" business model has made some progress, but it also faces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overseas warehouse" enterprises should carry out full-link core capacity building and optimize the technical path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irst, improve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supply resources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ly resources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improving product selection capabilities, and building high value-added product platforms; secon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cision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grasp the increase in traffic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control prices, strengthen brand building and other measures to improve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capabilities; the third is to improve the logistic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by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logistics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intelligent level of warehouse management; fourth, improve customer comprehensive service capabilities by improving customer experience feeling and optimizing

after-sales service processes; fifth, expand the new ecology of foreign trade in cross-border payment, customs clearance, taxation, financial services, etc.; sixth, establish a smart operation ecosystem through digital management, data mining, and data sharing.

(7)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residents’ income o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onsumption

Liu Hui , Xia Jiecha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onsump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the research finds: (1) For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incom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ir cultural consumption, but there ar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among them,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post-90s” is less affected by income. The increase in property income has a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impact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2) Life pressur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l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post-60s”;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restricts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post-70s” and “post-90s”; satisfaction with cultural activitie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the “post-80s” cultur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cultur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y adju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3) Cultural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necessity for “post-90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of “post-50s”, only the satisfaction of cultural activities affects their cultur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mong the moderator variables, and most of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the “post-50s” is the consumption of public cultural product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In order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esident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precise policies on the demand side, supply side and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8)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w-orbit satellite internet in China

Li Feng , Han Yanni , Ma Xiaoling , Wang Ting

Low-orbit satellite Internet has outstanding advantages such as wide coverage, low cost, and strong privacy, some of its performances are comparable to 4G networks, it can not only solve the bottleneck of difficult global coverage of terrestrial mobile Internet, but also meet the needs of special scenarios such as aviation and military, and it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value and has become the new focus of Internet competition in maj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low-orbit satellite Internet in China is relatively slow, the number of satellites in orbit is small, the business model is unclear, and a development pattern that supports each other with the ground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w-orbit satellite Internet on a large scale, China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launching low-orbit satellites, and seize satellite orbit and frequency resources in the near space,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ow-orbit satellite Internet and terrestrial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to ensure China’s international leading edge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rnet security.

(9) Policy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Qi Lum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basic, leading and strategic role of China’s circulation system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obvious, forming an important boost to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China’s circulation system does not meet the goals and requirements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and building a logistics powerhouse, and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commodity factors is still not in place,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is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s not high,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is insuffici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rculation service support system is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as well as outstanding issu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reform, market supervision, planning guidance, and policy support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urgently. To build a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serve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key gui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building a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here to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use the “chain” thinking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make overall use of the forc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focus 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market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logistics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modern circulation governance system to enhanc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crease reform and supervision effort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policies,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and provide solid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with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sta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10) Discussion on the counter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clothing industry——Taking Pany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Li Zhiwei , Hu Yu

As one of the industries with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and stro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 the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s fac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hina's garment industry is still at the low 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lack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break through foreign trade barriers. Taking Pany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summarize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deeply studies the bottleneck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that the clothing industry mainly has problems such as obvious rise in comprehensive cost, low degree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difficult and unstable recruitment,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policy support, insufficient warehousing and logistics support, difficulty in financing textile and garment enterprises, and insufficient brand promotion, and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the domestic clothing industr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lothing industry chain,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guiding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ing supply chain finance, optimizing warehousing and logistics facilities, and building regional clothing brands, and explore a new path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and provide idea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clothing industry.

(11) Accelerate the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to help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Interpretation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Central Document No. 1 in 2022

Li Yu , Han Yijun , Liu Naixi , Zheng Tianyue

The No.1 Central Document has focused on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for 19 consecutive years. In 2022, the No.1 Central Document mentioned issues related to digital development 6 times. Accelerating the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lleviating the more severe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land, and capital, ensuring agricultural security,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policies on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in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from 2004 to 2022, and analyzes the path of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rom six aspects: modernization of elements, modernization of production, modernization of organ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circulation, green moder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integration,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severe challeng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Overall, China's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already has a good foundation, but it also face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such as high degree of land fragmentation, lack of human capital,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digital agriculture, and deepening data gap.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policy suggestions: strengthening policy research and top-level planning, focusing on key projects and demonstration and promotion, increas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taking multipl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system.

(12) Research on the main modes and path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Xiao Yu , Shi Nan

The rapid and extensiv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ommercial banks. This paper find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customer behavior habits and industry competition patterns, as well a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practice of explo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have gradually explored three models of all-round financial aircraft carrier, professional service outsourcing and pure Internet gene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rend of digitalization of banking services, relaxes access to encourage market competition, increases investment to meet digital challenges, establishes an agile and flexible banking service system and innovates regulatory methods to deal with new forms of risk is standard actions for commercial bank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o respond to 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However, as a new thing, the curr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still has shortcomings such as the lack of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digital strategy and actual business, insufficient resource investment, the gap between the strength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mpared with the West, and the supervision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After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trengthening basic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building a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Editor: Yang Yuge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聚焦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力求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2023 年重点选题包括：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新形势下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研究；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开放型世界经济研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全球债务危机问题研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研究；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及政策研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研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及风险防范研究；数字平台治理及反垄断研究。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合作平台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等合作平台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稿件要求如下：

1. 来稿具有学术性和创新性，篇幅一般为 10000 ~ 12000 字，附有 300 ~ 400 字的摘要，3 ~ 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gh@cciee.org.cn

联系电话：010 - 83366113、83362183